毛泽东的思想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著
刘李胜 陈建涛 译

作者: 施拉姆

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副标题: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四）

译者: 刘李胜 / 陈建涛

出版年: 1992

页数: 307

定价: 4.50 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ISBN: 9787503505232

谨以此书献给四川大学哲学系郑禹老师。

——四川大学哲学本科 2013 级全体同学

2015 年 4 月 10 日

目录

绪　　言 4
导　　论 10

上　　篇 30

毛泽东的思想：从产生到 1949 年 30
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 32
（1917—1927 年） 32
第二章　　党、军队和民众 76
（1927——1937 年） 76
第三章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108
（1937——1940 年） 108
第四章　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 140
（1941——1949 年） 140
小结　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能吗? 149

下　篇 156

毛泽东的思想：从 1949 年—1976 年 156
第五章　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内部矛盾 160
第六章　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探索 197
第七章　中苏分裂的原因及后果非斯大林化和修正主义 228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259
小结　　寻找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282
结　论 296
后　记 313

绪　　言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毛泽东的思想从产生到1949年”和“毛泽东的思想从1949年到1976年”。前部分已经发表在《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中，而后部分将及时地刊登在《剑桥中国史》第十五卷中。本书在编辑上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要对原文尤其是本书的上篇作随意调整已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本书中，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各种观点作扼要分析。我尽可能地使这些观点与其形成背景紧密关联，尽管如此，要在原文中广泛地论及那些只有在更大篇幅的著作才能加以概括的历史事实，或许是不相适的，即使就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来说亦如此。

“导沦”和“结论”是专为本书而写的，其目的是弥补疏漏，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纳入一个更广阔的构架之中。“导论”首先论及毛泽东所力图驾驭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使他得以投演领袖角色的各种因素。接着，“导论”考察了毛泽东一生中各个阶段的关系和他思想上的几个转折点。至于“结论”，其目的不再是概括毛泽东的思想的主要原则，而是评价它在中国的深远意义，并预测它今后在一个有些人声称正在发生“非毛化”过程的社会和制度中的位置。

我不认为本书是足够充分的，也不认为它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作了完全确定的阐述，但它却是以我过去二十五年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的。本书是否把我的解释推进了一步，需待别人来评定。我从事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已多年，这无论如何意味着，我欠下许多人情，在这里对此表示谢意，是我愉快的使命。

为此，有必要作一回顾。我最早发表的这一领域的专题文章，是翻译并分析毛泽东 1917 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这篇专论曾得到艾特纳·巴尔兹的指教，我在六十年代初有幸参加他在巴黎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后，我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一年。这使我有机会初次尝试对毛泽东的思想作全面考察。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和研究所的帮助，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的出版致谢中曾详细作了说明。他们中有三人尤其应当提到。约翰·费尔邦克，当时中心的主任，他既严厉又热诚，主持中心工作人员的各项活动。施瓦茨与我在同一办公室共事一年，在这期间，他给了我非同寻常的启迪，并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公正评价。英格纳·吴，胡佛研究所东西收藏馆的馆长，她为我最初接触延安时期的资料提供了方便，从而使我有可能依据毛泽东 1949 年以前的著述文本探索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1962 年夏，我在胡佛图书馆翻阅《解放日报》时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与它的几位主要编辑于光远、廖盖腔、李浇、温齐

泽等人相识。这件事是此后发生的世界政治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变化的象征。到 1963 年，在资料方面和极有价值的思想交流方面，我就已经不仅得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是得益于日本的学者和图书馆。七十年代初，由竹内实主持编辑了十卷《毛泽东集》，这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人在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无论如何，许多材料在中国本土之外很难得到，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 1978 年以来，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形相比，我们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理解肯定会更显得零碎。80 年代初出版的东京版增补本由九卷正文和一卷索引组成，它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出版的内部文集。

我之所以能对毛泽东的一生和思想作一次全新的总体考察，除了查阅文献外，还得益于六次访问。自 1980 年以来，我曾得到特许六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 年 6 月至 7 月，1982 年 4 月至 5 月，1982 年 9 月，1984 年 3 月至 4 月，1986 年 3 月至 4 月，我先后五次受邀到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访问，1987 年 12 月至 1988 年 1 月，我再次受邀到哲学研究所访问。我与中国的许多学者和政界人物交谈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由于人数太多这里就不再提及。有关事实或理解的特殊细节已在本书的注释中作了某种说明。

特别要表示谢意的是，马列所前任所长于光远（1982 年 5 月离职），1982 年 5 月以前担任副所长的冯兰瑞和廖盖隆，哲学所所长邢贲思。他们及其同事牺牲了许多宝贵时间，与我就毛泽

东思想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交谈，对我的观点（包括本书各部分的草稿）作出评论，组织专题研讨会，安排各种会议和提供资料。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龚育之及其同事的多次交谈，也使我受益不少。不用说，这里提到的人中没有一个要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责，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我的理解也许就会更显得肤浅。

谈到这些机会，我自然也要感谢曾资助我访华的一些机构：英国科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会，该机构指派我参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交流项目；并提供路费；中国科学院，我在华期间，它给予了慷慨的款待和帮助，国家人类基金会，它赞助我参加1980年夏季的“北美中国革命问题考察团”，这是我接触中国学者的决定性的第一步；东方和非洲研究学会，它也赞助我到日本和美国图书馆作几次短期访问，以继续从事我本书的研究工作。

过去十年间的中国之行是有价值的，在那里，我受到热情接待，并颇有收获。但是，这些不会使我忘记，我在寻找原始资料时不断地得到在中国之外的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日积月累欠下不少人情。

说到资科，尤其要感谢来自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竹内实、中村公义以及与《毛泽东集》有关的日本学者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文献汇编的复印件，它们有关毛泽东 I949 年前、后的思想。另一方面，哈佛-燕京研究所最近收集到多册毛泽东的著作内部版本，它允许我查阅，并复制其中的一些关键文本。在这批原始

资料中，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未经修改的原稿和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谈话（后面将看到），对我理解毛泽东在 1957 年至 1958 年期间的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同样的原始资料中翻译成册，并附有解释条目的一书，以“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为题，将由哈佛大学出版。在目的的这本书付梓之际，我尚未看到达种对“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思想的集体评价。但是，我要再次感谢英格纳·吴，她现在是燕京研究所的馆员，为我提供了把上述重要资料结合到我的分析中的机会。

对于《剑桥中国史》的编辑们，我也欠下不少人情，因为本书中相当一部分章节最初是为《剑桥中国史》而写的。麦克法夸尔，十四卷和十五卷的责任编辑，他仔细审核了我的有关毛泽东 1949 年以来的思想的商讨文章，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总编辑约翰·费尔邦克在十三卷中的一章发表之前，写了十页机智、深刻且颇有见地的评论送给我，对本书前半部的形式和内容起了实质性作用。

最后，我想对许多专题讨论会和其他一些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理解就是在这些场合中经受批评的，批评常常是尖锐的，但作为还一步思考的鞭策总是有用的。多年来，在欧洲（从伦敦、爱丁堡阿伯里斯特威斯到巴黎、威尔士和那不勒斯）、亚洲（从德里、北京、长沙和湘潭到东京和京都）和北美许多地方（从伯

克莱、斯坦福和圣地亚哥到波士顿和纽约，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我曾多次获得这种机会。其间涉及到的机构和个人不胜枚举。同我交谈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我似乎没有从同他们的对话中学到本应学到的那么多东西。这种过失当然归咎于我，正如我一般地要为各种错误和欠缺负责一样。

导　　论

这是一部论述 20 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以及毛泽东在领导这场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书。毛泽东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施加他的影响的，既包括制定决定事件进程的决策，也包括编造以他本人为中心的神话，尤其是他晚年时的神话。无论如何，要就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最普遍、或许是最永久的表述，那么，这种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这部书中，我的主要意图是阐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通过这项工作把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加以说明。

我在最初试图对毛泽东的思想作一总体考察的时候，曾经在另一部书的开头写道：“思想发源于历史，思想也塑造历史”[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要用它来表达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的全部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了。这样的表述意味着（特别是象我在 20 年前对它详细阐述的那样），思想就是吸取和利用各种资料把它加以综合，并且系统地表达出来，然后运用它们以实现一定的目标。在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内容，还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功能，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当然，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具有连续性的，它既植根于毛泽东本人的天性，也植根于中国的困境。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和毛泽东的思想在各个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5 页。（1963 年第一版以同样的句子开头。）

发展阶段上的实质，以及它所引起意义深远的变革的巨大威力，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该书阐述的重点内容。在这篇“导论”中，对于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至此，我对所使用的“革命”一词，并没有在涵义上赋之予我个人的独特的理解。除非是以某种革命理论为基础，否则不可能对它作出精确严谨的定义，而且对已经提出的理沦，要再附加更多的解释和范例，也不符合我的本意。就我目前的考虑而言，我所论及的那种意义深远、发展迅速、包含与传统决裂或中断成分在内的改造活动，就足以能够界定“革命”，从而使它与其它形式的变化相区别开来。当然，所有这三个关于革命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模糊的，不仅事情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有一个如何度量的问题，而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界限也蕴含着一个判断问题，它涉及要确定现实的哪一个方面在决定所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和性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无论如何，把这三个特征综合起来．就将足以揭示所正在讨论的问题。

人们能够论及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吗？从本世纪开始，甚至从 19 世纪早期以来，这种持续发展的革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它的先前阶段都是合乎逻辑的和具有必然性的结局吗？或者说，所发生的这些一系列相互独立的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必要通过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链条而使其联结起来吗？

考察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区别那些连续性的革命发展阶段是

必要的，而且对于区分各种不同范围、方面的革命也是有用的，诸如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等等。毛泽东本人在其一生中，多次论及这样六种革命类型。毛泽东和列宁一样，他把政治看作“生命线”，把夺取革命政权看作实现其他方面变革的关键。同时，在政治革命将被开展而趋向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把民族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必要补充。

在毛泽东还未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之前，中国就发生了第一次政治革命。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事实确实如此，1911 年的这场革命是一次松散的、流产的革命。由于它缺乏由明确而固定政治力量所组织、控制和开展。孙中山、黄兴及其所领导的团体，致力于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而创造条件，但是他们既没有完成 1911 年 10 月 10 日举行的起义，也没有能够成功地控制这次起义的后果。然而，这场革命也彻底打破了皇权思想，从而不仅为进一步实行政治变革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寻找新的革命形式提供了经验。

无论 1911 年发生的这种政权变易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清王朝从 19 世纪早期就开始的崩溃，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清朝的衰败，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影响的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于其内部的，即 18 世纪末期和 19 世纪初期的人口激增，以及旧的社会秩序再无力压制其他新生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同时，当外国人对清王朝

支持时，他们的表演便为革命的方程式增加了新的成分，其实际作用是在加速这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中国从 1840 年以来，其民族主义的成分一直在明显地增加。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等外国人先后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渗透，其作用力很快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仅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对外国人的憎恨和畏惧的反应，而且几乎在中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中间也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 1850 年，马克思和思格斯曾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称为一个“强大的革命”[①]和“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②]（今天我们应当称之为“民族解放战争”）。总之，它对于一个将采取比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起义更为现代的形式的民族革命来说，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很自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之所以促进了 1911 年的政治革命，这是由于，除了人们对清王朝作为一个异族的满清统治者充满了敌意外，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极端腐败。因此，按照一种传统的说法，他们是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人们在“亡国灭种”——国家破碎、民族灭亡的前途面前所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感，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从改良阵营转向了革命阵营。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 年 5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 页。

[②]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1857 年 5 月 20 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 页。

以上引语可参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第 119-121、123-124 页。

人们对皇权思想的弃绝，促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革命，然而其本身又是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所发生的文化变迁的结果。最初，西方思想是片断地被引进的，之后便是大量地引进，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自身的传统发生了激变和重构，形成了一种唯一能被称为“革命的”新思想潮流，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相互促进的。

在继武昌起义之后的那次政治革命中，毛泽东作为革命军的一名士兵，当时所起的作用还是不明显的。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高潮中，民族主义日益具有号召力，并具有多种组织形式。从 1915 年“二十一条”的签定到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在 1926 年至 1927 年的事变中，毛泽东尽管当时还未成为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革命活动家，但他已经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农村所兴起的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形式的社会革命中，毛泽东即使不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这场运动发动者的荣誉属于彭湃），他也是这场运动的最成功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倡导采取游击战争方式开创农村根据地的最突出的典型。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只是一个像许多作者在几十年里一直称谓的“农民革命家”呢？有些人是抱有这种成见的，他们简单地利用毛泽东深知革命者都是天生地蕴藏于农民之中，并且他在农村发动了革命的情况，并把它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而且，更有甚者，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在 1927 年不仅仅是暂时地放弃了城市，而且是全然抛弃了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

城市知识分子精英的作用的思想，从而使自己献身于农民所固有的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曾经动员农民起来进行革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认为毛泽东是盲目地附和农民的理想而不去引导他们，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他信奉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这方面的根据是占居主导地位的。所以，那种认为在 1927 年以前，中国革命是由城市知识精英所主宰，而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后，城市知识精英便不再发挥作用，从而把这两个问题绝对分开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1976 年，关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意识，以及某些根深蒂固的以农为本的思想影响，则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持续了半个世纪，同他头脑中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成分，编织成了一幅相互混杂而又对称的图形，这一点倒是符合毛泽东本人的实际情况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革命观念不仅强调了他所依赖的那些受过专门教育、培养并已成为党的组织者和理论家的个别人，而且也强调了他所依赖的那些一般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一点确非同一般。1939 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起源于觉醒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动”[①]。这句话后来在他关于五四运动周年纪念的演讲中又被删去了。毛泽东还说，五四运动固然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然而，只有当知识分子同工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54-355 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332 页。

农群众形成的“主力”相结合时，才能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标。尽管如此，关于五四运动最初的动力是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具有肯定意义的说法，毕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于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视野的一个方面。

显然，这种看法自五四运动以来是始终一贯的。毛泽东在 1919 年 8 月曾经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这里暗含的意思，不仅是要求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而是是一种确信无疑的观点，表明了我一直在探讨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某种观点。对于后者，毛泽东在我刚才援引的他的 1939 年的那一著作中表述的更为清楚。在若干年以后，于 1956 年至 1960 年间，毛泽东在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则通过一种对历史因果联系理论的明确阐述，把他的各种见解综合起来。他说：

>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0 页。施拉姆译《民众的大联合》，载于《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84 页，1972 年 1——3 期。

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①]

这段话显然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才能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在政治革命之后，而政治革命又需要通过造成社会舆论才能做好准备和成为可能。这一见解与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意识的能动性、主观力量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然而，还应当指出，毛泽东的这段话所勾画的革命轮廓，既符合于毛泽东本人的处世模式，也符合于更加广阔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由于张之洞倡办的工业化（毛泽东多次把它称作整个中国革命的起点）[②]已经开始了一种变革的过程，毛泽东和其他当时更为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便能够开展这场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也最终打开了通向政治革命和 1949 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毛泽东是怎样来看待问题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的。然而，毛泽东要从这一经历中锻造一种一般的革命理论，他也要遵循一种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无论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还是在这个根据成文命令来进行统治的社会中，都曾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种环境要求必须有舞文弄墨的参加者来“制造舆论”，1919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毛泽东把这种情况视作当然之事。在这方面，他是否意识到了中国同其它不以成文命令传统作为基础的文化模式的差别，我们则不得而知。

[①]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笔记》，《学习文选》第 197、209 页。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莫斯·罗伯茨译），第 51、66—67 页。

[②] 见本书 197—198 页。

换句话说，与义说毛泽东是一位“农民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妥当。因为要不是处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他本来可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实践传统的治国之术的。

我在上面讲过，五四运动对 1949 年的胜利是有贡献的，人们已经广泛地接受了这一看法，认为事实的确如此。然而，要对这两个事件各自的重要地位进行比较，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直到最近，中国官方人士的观点仍然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这就含蓄地表明五四运动是比 1949 年的胜利更为根本的变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们才有了选择这种观点的机会，即 1 949 年夺取政权才是现代史的真正开端，因为正是它开辟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道路。

李新在一篇关于这一课题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章中指出，还是在 I 956 年，当时 1919 年五四运动已被正式定为现代史的开端，而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进行历史分期的正确标准的思想，更倾向于把 1949 年的胜利作为现代史的开端，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看法。[①]不妨假定，绝大多数人把五四运动看作现代史的开端，那是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的线故。

李新在文章中也认为，正如毛泽东在 1939 年所宣告的那样，1919 年的五四运动可以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

[①] 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于《历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3—6 页。

命阶段开始的标志，但他也着重具体地说明，那时仍没有发生政治制度的改变．仍然是被军阀势力所统治的。[①]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新生产方式的创造的重要性，自然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然而，他同时又明确地把他所亲自参加了的五四运动看作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无论认为1919年和1949年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象征着什么，在这 30 年的不同时期中，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和最终的胜利。人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入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他们适应了中国人民的深切需要，以及适应了中华民族和国际形势的结构上的要求，生气勃勃地发动和推进了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假定在中国社会里贫富悬殊加剧，以及旧的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被打破而不断为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所修复的情况下，从事革命的共产党人，最起码也一定是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战胜其对手的策略。

然而，无论这种客观形势多么有利，中国共产党人的 1949 年的胜利以及他们对这种胜利的利用，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革命”的简单现象。它们反映了这种夺取政权斗争的特殊环境，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伟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毛泽东已把自己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之上。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无条件地推行他的主张，只是在他逝世以后，他的许多观点才受到批评或有所保留，以及完全抛弃。这一事实表明，

[①]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于《历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3—6 页。

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领导所产生的威力是如此深远和广泛，以致于人们正当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刻画为“毛泽东的中国”。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尽管他留下的印记，已经在这里或那里被人忘却或被人消除，但这种印记仍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的。

在 4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毛泽东对中国局势的控制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其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他是他那个年代的中国最完满的代表，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才是例外。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因而深深了解（即使他在上学期间，对此淡忘了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引力中心是在农村。在毛泽东的幼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的父亲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贫农上升到富农兼米商，这使得他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贫富两极不平等的观点。从地理位置来看，他又是一个生长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入。他不是一个沿海大城市的人，无论这些城市多么重要，它们多少总是异于以农村为特征的中国的。但是，他也不是来自遥远的与外省影响和政治动荡相互隔绝的省份。从 1897 年潭嗣同建立南学社的时候开始，毛泽东的本土湖南省也觉醒了，顺应这个新知识和政治潮流。

然而，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年轻人中，有数以百万的同样来自于那样的国家地理环境和社会引力中心地区，那么，毛泽东区别于这些人的个性特征是什么呢？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领导才能充满了自信。他不仅在早年就非常钦佩东方和西方的那些强有力的统治者——从秦皇、汉武到彼得大

帝和拿破仑，而是直率地确信自己有能力超过他们。这种高度的自信心本身并不能保证毛泽东将一定担任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心，要想成为一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者则是很困难的。[①]

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毛泽东与中国及其命运休戚与共的强烈意识。他由此不仅生发了炽热的和坚强的民族主义，而且形成了使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理论适合于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需要的坚决主张。确实如此，在毛泽东的诸多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包含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中，达两篇文章现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发展了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即“实事求是”和古老的“阴阳”辩证法思想。

农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无疑毛泽东正是由于对这些成分协调和体现得如此之好，他才能够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起到他所已起的作用。这种秉性的自我表现形式，是在各种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包括在他自己累积的行为效果的影响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改变和发展着的。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各个阶段，以及毛泽东的新思想在特定时期出现的各种原因，在该书的正文部分都将逐一阐述。这里只是适当地考察一下其思想的整体轮廓。

从内因来考虑问题，也就是从毛泽东的个性和动机这一角度

[①] 读者如果要就毛泽东的领导品格和领导作用作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我的《是党的领导人，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意义》一文，见施拉姆著的《中国政权的基础和限度》一书，第 203—256 页。

出发来考虑问题，可以认为多年来他的姿态是趋于他的思想而变化的。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主要关心的是找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用他所作的正确分析来说服其他人。在毛泽东的中年时代，他继续探求真理，注重创建一种对他的追随者们具有约束力的理论。在毛泽东的晚年，随着这种趋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被人们变成了教条。然而，一直到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试图调动他过去的知识，以便描绘出未来的进程。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来说，在阐释毛泽东的思想时，革命斗争的背景自然是首先要思考的因素。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由于现实的多方面的差异，那些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不同的。例如，廖盖隆在 1985 年 5 月的一次谈话中建议，根据中国革命历史分期的整体背景，应分别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进行不同的分期。[①]其他的一些作者，不仅提议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分期有别于中共党史的分期，而且甚至提出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每一个特定的组成方面，诸如他的党建学说之类，都应有其独立的分期框架，同时也强调了所有的这些不同方而都是具有内在联系的。[②]

要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时期或者阶段，以及一个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的转折点作出区分，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和艰巨的政治任务。对我们来说，则不尽如此。

[①] 廖盖隆：《关于毛泽东功过评价和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对施拉姆教授论毛泽东的几篇文章的评述》，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 321 页。

[②] 郑志飙：《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分期》，载于《毛泽东的思想研究》（成都），1985 年第 2 期，第 72—76、93 页。

然而，这一解析图样也许被证明是有用的。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约十年时间。

1917——1927 年：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学习和实践锻炼，包括在学校的最后几年和参加各种革命组织，即从“新民学会”到工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以及从城市中心论向农村中心论的转变。这种思想于 1925 年至 1927 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 o

1927——1936 年：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原理为开端。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领导层的斗争小，其标志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大落大起，即从一条支流发展成为一种路线（或许可以叫做一种派别）。接着，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进入一个获得相当于党内最高的和公认的领导权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整个期间，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在这些岁月中，尽管“持久战”的思想只是到 1938 年才被明确提出，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在逐步形成。与此相类似，尽管“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只是在以后的十年中才得到系统阐述而成为公式，但是相当于它的观念和方法已经初具雏形。

1936——1947 年：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撰写了他的 1949 年以前时代所有主要的理论著作。在 1936 年后期，他首先写出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在 1937 年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实践沦》和《矛盾论》。同时，由于埃德加 •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得以出版，该书包含了毛泽东在 1936 年 7 月对斯诺所详细叙述的他的自传，毛泽东在国际舞台上也大大地获得了参与权。毛泽东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且把它贯彻到 1942 年至 1943 年的整风运动之中，整风运动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加固了他本人在党内的地位。在 1943 年 3 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正式确立了他高于其同僚们的领导地位。在 1945 年 4 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的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最后，在通过马歇尔等人进行调停的企图破灭之后，毛泽东把其注意力转向对付全面内战，转向掀起一个新的土地改革高潮。到 1947 年末，这两件事情都进展顺利，胜利在望。

1947——1957 年：在 1947 年至 1949 年间，毛泽东在引导内战走向胜利结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在全国胜利之初，他强调必须学习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把城市的作用和重工业的作用置于首位。同时，他也主张这种发展要循序渐进和有节有制，特别是在农村，仍不干涉富农经济，以便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然而，到了 1955 年，随着毛泽东于七月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他的经济政策突然变得比较激进起来。在 1956 年

初，毛泽东主张对知识分子实行极为宽和的政策。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来他看作这是对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第一次尝试性的系统阐述，1956 年 5 月 2 日，为向非党群众传达作了一些修改，其中特别包含了一个倡导性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其最初的版本中，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左倾错误，以及斯大林清算任何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的倾向，并且宣布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之后，通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气候中的一种新的左倾错误的抬头，这样一种颇为复杂的局面被延续下来，这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富有戏剧性的和决定性的转折点中的一个。

1957——1966 年：1957 年秋季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 196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非常激进的创造。当这一试验造成了混乱和群众饥饿的困境时，毛泽东退居“二线”，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同志率先制定紧缩政策和合理化政策，然而，他对于抛弃大跃进的乌托邦和平均主义幻想，则变得越来越怒不可遏。这种情绪促使他在 1962 年秋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而且从那时起，他就在为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些人准备条件。[①]

[①] 关于 1957—1958 年激进政策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因果关系，请参阅（除本书相关段落外）我的论文《巨大变化的顶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执发展中的地位》，载于《中国

1966——1976 年：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是以首先对准他的党内的对手，以及对准那些他认为是倒退的思想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发起声势浩大的剧烈运动作为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 1966 年到 1968 年，其显著的特征是人们怀有很大的特定的希望和热情，至少在青年人中间是如此。不久，红卫兵运动就蜕变为一种大规模的派别内战，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命令林彪和人民解放军加以干涉。其结果是，这种剧烈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未曾得到真正的恢复。在毛泽东的最后几年中，困惑和挫败连续不断，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尽管他仍然处在统帅地位，却又越来越无力做这件事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神志几乎不能再思考问题，更不要说讲话了，甚至确实象他在 1966 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的葬礼上或种种愿望的坟墓中的一个不中用的偶像。

如何刻划上面简述的以事件和倾向为标志的六个阶段的特征呢？沿着下述的思路也许多少能得出答案：

1．性格形成时期。1982 年 1 月我在香港作的演讲中，曾经把毛泽东的思想产生到 1927 年这一时期称作“一个革命家的学徒身份”时期。然而，当该演讲稿公开发表时，我又把它改为“性格形成时期”。我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廖盖隆的影响。廖盖隆认为到 20 世纪 20 年代，毛泽东绝不能被看作只是一个单

季刊》108 期（1986 年 12 月）第 613—624 页。

纯的学徒。[①]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此外不使用“学徒身份”一词，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充足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无论所使用的“学徒身份”一词多么不严谨，它总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一个初学者被一位师傅引进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专业，这种行业或专业具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资格和要求。然而事实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没有一位能使毛泽东作为其徒弟的“革命的师傅”。从孙中山到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他们是在年龄和资历方面部高于毛泽东的领导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进行革命。斯大林认为他了解中国革命，并从 1925 年前后起就认为自己有能力驾驭中国共产党，使之听从于自己的指挥，但很多事情证明，他同样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师傅。毛泽东在 1917 年至 1927 年期间，从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身上吸取了某些东西，但在许多根本性的方面，他是自学的。

2．锻造武器。在 1927 午，尽管毛泽东在学习革命艺术方面还未受到全面的培养，但他要生存下去的话，从那时起他也必须完全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必须去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 1927 年全 1936 年期间，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人创建了军队，制定了战略战术，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长征之前和长征期间，在国民党的围剿中九死一生，能够在通过抗日战争所创造更为有利环境的期间，壮大他们自己的力量。

3．确定和实行“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延安时期，

[①] 参见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初步再评》一书的序言，第 12—14 页，以及本书第 18 页注释 1 所引用的我们谈话的中文本。

毛泽东总结了前十年的经验教训，认为可以通过农村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且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思想，到 1947 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到达最后胜利的被岸。

4．从“中国式的今取政权的道路”向“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转变。从 1947 年到 1957 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获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果实，然后，便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 1957 年初，这项事业的胜利前景已在许多方而表现出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有目共睹的。

5．“大跃进”陷入困境。在 1958 年，毛泽东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当预期的“大跃进”的胜利未能实现时，他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向党内那些对其政策表现的热情不足，折台有余的人们宣战。接着，到 60 年代中期，他便向人性本身宣战了。

6．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毛泽东试图铲除利己主义及其根源。他终于认识到，利己主义的根源不是简单地存在于由等级工资结构造成的不平等的报酬分配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毛泽东还继续尽力去打倒那些与他对立的人。对于这后一个目标，尽管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但绝不是全部实现。至于改变人的本性这一目标，根据毛泽东逝世后这些年的情况发展，看起来似乎是，很多人认为十年前所发生的那种显著的改变是一场虚幻。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这场大动乱，并没有象毛泽东曾

经希望和打算的那样，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一种不可逆转的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 27 年的领导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阶段。正相反，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在 1949 年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实践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是意义深远的。对此，我将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试加以评论。

上　　篇

毛泽东的思想：从产生到1949年

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它既是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 l949 年这一时期革命经验的迅速开华，又是他后来许多政策得以产生的理论原型。在本篇中，我着重考证和阐释在毛泽东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前 30 年间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线索，同时也尽力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在夺取政权以后时期的继续发展做好准备。我在着重阐释毛泽东本人早年思想中的最重要的内容的同时，还要专门探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那些只有到20世纪50—60年代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东西。

毛泽东的思想在从 1912 年（当时毛泽东的年龄是 18 岁半，他参加革命军半年后又重新回校学习。）到 l949 年（这时毛泽东已经成为统一的中国既有名义又有实权的领导者）这一时期的发展线索，是持续而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动的一种反映。毛泽东在其一生的前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几个不同的时代，因此，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也经历了几个根本性的变化阶段，可以说，

这种变化不仅每十年都有不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每年也有差异。所以，我目前所作的努力，是要通过采取一种按年月顺序叙述和按专题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对毛泽东的复杂的思想和活动的记载加以有规律性的整理和阐明。我们首先把毛泽东从其步入青年，到 1927 年开始从事具有明显的农村特点的革命斗争阶段的政治思想发展，作为阐述的起点。

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

（1917—1927 年）

就毛泽东当时的年龄和经历来说，他是属于五四时代的人。从 1915 年的《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当时“新思想”浪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参加政治团体和研究政治理论而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在毛泽东身上，尽管有着他自己的非常显著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当时整个青年一代的群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之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任何一代人都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永恒运动着的。然而，毛泽东的一生和其同时代的人的一生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仅是阶段的不同，而且是时代的不同。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过程，早在 19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并且持续到 20 世纪中期以后，然而，只有五四时期才标志了这种空前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变化。总之，五四一代的成员们意识到了，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不能再同流合污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现这些思想竭尽了他们毕生的精力。

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持久的、沉重的和动荡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

毛泽东 20 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以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去了解。[1]毛泽东第一次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是他在大约 23 岁时，为 1917 年 5 月期的《新青年》撰写了《体育之研究》文章。

当时，尽管毛泽东所发表的这一处女作是在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以前的很早时间所写的，它仍然展示了毛泽东的许多个性特征和思想脉络，这些都可以通过其后来的发展而得到领会。贯穿全文的是一种忧患意识，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心灵的困扰，即唯恐中国人民遭受亡国之灾而沦为“丧国之奴”的焦虑。这一主题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是那样广为流传，它突出地表现在该文开头的几句话中：

> 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是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运？[2]

在此，毛泽东鲜明地揭示了贯穿于其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活动中的两个基本的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佩。如果毛泽东专注于这里所讲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目标，那么当时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性质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检验这一点的试金石，就在于看他是否把国家富强

（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目标与所理解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起来，把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看作增强国力的必要先决条件。在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虽然非常关心，当时他却几乎没有谈及改良，更不必说谈论革命了。

在毛泽东的这篇用古汉语写成的文章中，个别节包含了 20 多处出白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小有 12 条涉及儒学的经典：一条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的先驱人物荀子的，两处是宋朝儒学唯心主义解释者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晚明时代的朱熹的批判者颜元的。另有三处涉及毛泽东最喜爱的古代道家名著——《庄子》。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知识就已经相当广博了，因为他顺便提到了过去各个年代一些较不重要的作者的晦涩的传记体的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提供参考的十二处儒家经典中，有十一处则是《四书》的基本该心。

在该文中，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引证关于社会变革问题的材料，甚至也未提及任何社会变革必要性的问题，但其中包含了许多源于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不信奉国教者的思想踪迹。首先，它强调了尚武精神的价值，这在上面引用的该文开头的一段话中已得到了表述，同时，还体现在它的一句结论性的语句中：“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①]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毛泽东以赞赏的态度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事例，也援引了颜元批评朱熹“重文轻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一版，第 71 页。

武”，由此而造成了一种有悖于儒教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①]

在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还受到所谓世界存在着心物两个本源的二元论思想影响，这可以从他 1916 年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大约在那一段时间，毛泽东他也正在为《新青年》撰写研究体育的文章。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3]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理解了“身”作为物质基础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赞扬了古代中国人的“勇”的美德。当然，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这种特质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他同其他许多处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人一样，是适应社会环境的客观要求来锤炼自己的思想的，当时的客观环境与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衰弱而受到威胁。

如果说崇尚武力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恒定的特点，那么他 1917 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中的一个更为根本的主题，便是强调“自觉”和“自动”精神。这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受到了近代思想的影响。他在该文的第一段中强调指出：“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②]

毛泽东认为，思想指导行动，采取有效行为的关键在于人的

[①] 颜元：《存学》《四存编》的第二编，第 6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5 页。

精神面貌的改变。他的这一观念部分地来源于儒学传统。但这些段落中渗透着的主要灵感，无疑是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结果，其中最基本的西方观念是通过阅读《新青年》而得到的，以及通过其伦理学教师、未来的岳父杨昌济授课而得到的。

杨昌济是一位朱煮、康德，以及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他讲授的道德哲学实质是一种把强调个人自立、个人价值和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相结合的西方的自由主义。[①]后来，他从《论语》中摘录出若干精华的章句，并附加自己的释注，编成一部《论语类钞》，来阐明他本人的“自我修养”的人生观。该书的第一章就把“立志”概念作为其题目，共中包含了这样的陈述：“有不可夺之志，见无不成矣。”[②]

毛泽东同杨昌济先生一样，也特别推崇意志的许用。他在1917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体育”，“足以强意志……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③]这种对主观意志力量重要性的信念，是其世界观的核心和本质的成分。1917 年 3 月，值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之时，毛泽东给他写信，表明白己想邀请他到第一师范学校发表演讲的心愿，并在信中称自己是个“颇立志气”的学生。[④]

在那时，毛泽东也顺应当时中国的风气，认为只有通过启蒙教育和接受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立志。他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43 页。
[②]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30 页。
[③]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1、72 页。
[④] 毛泽东：《致白浪滔天信》（1917 年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3 页。

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同时他也认为，立志不只是一个主观态度问题，它同样要求有行动上的保证。他写道：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①]

当时，在毛泽东的全面的政治见解中，有一些观念是通过这样的事实被确立的，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有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三人懂得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当代只有一个人是真正值得佩服的，他就是曾国藩。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②]

尽管如此，毛泽东 l917 年的思想模式决不是纯粹的传统性的。他竭诚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新生。他在信中写道，中国“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必须首先改变人民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有“大本大源”。他认为，中国今日实行的变法，都是从枝节问题入手的，如从议会、宪法、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6-87 页。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具体问题入手。对于这种枝节性的改革价值，虽然不可以低估，但应看到枝节性的改革背后必有其共同的“本源”。如果改革者没有找到他们自己的“本源”，他们所有的这些枝节性的改革措施，最终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本源”囊括了整个宇宙的一切真理，而人则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各个部分，因此，真理便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毛泽东继续写道：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要从改造全体国民的思想入手。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积弊很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这二者都在必须加以改造之列。[①]

然而，尽管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僵化的传统思想模式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但他也并不把全部西方思想看作医治中国人的顽症的灵丹妙药。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泽东引用了杨昌济的话。杨昌济先生曾举例批评盲目崇拜西方思想现象，说：“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毛泽东对此评论说，“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

在此论述的基础广，毛泽东以出色的非传统的眼光提出要建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86 页。

立一项重要的事业，即以“小人”的思想道德为基础来统一和凝聚人们的思想。他说，“小人”和“君子”相比，无疑“君子”具有更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然而，“君子”的存在，主要是以“小人”为主体的普通人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从事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的职责不仅在于要对“小人”施以仁爱慈悲，而且要教育和改造他们，“开其智而蓄其德”，共同登上“大同”境域。而且，在那时，毛泽东已经打算建立一所“私塾”，兼取传统讲学和现代教学方法之长，为即将到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创造条件。[①]

关于“行”的思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整个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 1917 年的《体育之研究》文章中，谈到人们至今仍在津津乐道的体育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②]毛泽东强调把“知”与“行”结合起来，这一思想通常可以追溯到王阳明，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因为在任何已知的毛泽东的作品中，未发现任何提及王阳明的字句，也看不出受到其思想影响的痕迹。总而言之，与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发展关系最为直接的，还是他在 1917—1918 年间所吸取的西方观念。

1917 年至 1918 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最后两年中，其思想的转变是非常急速的。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写的《伦理学原理》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9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3 页。

时，在该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其中说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①]

毛泽东同当时诸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更年长、更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是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把个人的绝对价值观念作为冲决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组织对于个人主义实现的必要性，他对个人如何组成团体、团体如何组成社会、社会如何组成国家进行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第一位的。他认为，泡尔生主张国家是第一位的，这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②]

从那时开始，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也构成毛泽东的思想的一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把观念和实在、有限和无限、高与低、阳与阴，以及数十午后受到苏联批评的生和死、雄和雌等对子，都看作是同一的。他把人看作是肉体和灵魂的团聚，把道德看作是良心和欲望相互作用的产物。（他把道德律出于神的命令的观点蔑称为“奴隶之心理”。）此外，他还认为，由于物质不灭，尽管人和社会通过改革和革命不断变化、更新，它们同样是不灭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不再象以前那样担心中国将会灭

[①]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 年至 1918 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51-152、246-247 页。
[②]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 年至 1918 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42 页。

亡，而坚信中国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和改造国民本性而得到永存。他还认为，这种改革只有在新知识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成功，而新知识只有首先内化为人们的信念，然后加以应用，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他在《批注》中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凭借只能是“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入类之结合。”[①]

于是，毛泽东在更有力地重申他 1917 年 4 月文章中“重在实行”思想的同时，又形成了另一个关于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颖课题。这两个问既，都构成了毛泽东 1917 年 7—8 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中的主体内容。

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惊人之笔，是他对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对比描写的段落。

>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指贵族、资本家——译注）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

[①]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 年至 1918 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8、247 页。

金。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逐字地引用了这段话后，评论道，毛泽东发表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尽管他当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章的主要倾向已经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奠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①]19l9 年夏季，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两方面的学习，进步无疑是很快的，然而要从他这段时间的著作中找出精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诸如阶级斗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概念，作为特殊术语的“阶级”也只是使用了一次，而且完全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他把阶级区分为“智愚的阶级”、“贫富的阶级”、“强弱的阶级”。[②]如果能从这些文章中领悟到某种睿智的哲学见解，那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些中国文人引进和加工过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些中国文人包括严复、梁启超，以及戊戌变法的谋划者和殉难者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等，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了一种共识，即依靠那些敢于冲破上层统治集团压制的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形成全社会的整体力量。

在五四时期，胡适的思想也曾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过重要影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②]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19-440 页。

响。人们经常指出，毛泽东 1919 年的文章被《每周评论》杂志介绍之后，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一位评论者摘要介绍了毛泽东的《湘江评论》的最初几期内容后，评论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学。"[①]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在实际上正是胡适本人。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第一期时．这就不足为怪了。毛泽东在该期的《创刊宣言》中，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后指出：在思想方面，我们趋向于"实验主义"。[6]我说这些话，绝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即毛泽东是一个胡适或者约翰·杜威的信徒。然而，毛泽东在 1919 年对实用主义的赞同性的评价，确实反映了他几乎到其生命终结时仍在坚持的一种看法，其大意是，一个人不应当脱离具体实践，去凭空地杜撰理论。

如果说毛泽东在 1919 年时的思想，如同当时那些更年长、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各种思想的影响，那么，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却有着一个区别于他人的显著特点，即表现了毛泽东试图在总结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总的行动规划。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全社会各类的等级勾画的总体画面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最重要，其次是农民，没有提到工人。他特别对

[①] 《每周评论》（1919 年 8 月 24 日版），第 36 期，第 4 页。

妇女和中小学教师的境遇给予更大的关注。从总体上看，毛泽东一直努力实现的革命联合的见解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看法没有两样。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中国的新生活将首先来源于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造反活动，这种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在于基层群众中自发地形成各种民主组织。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他也自我表露了是严复的忠实信徒），整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目标，不仅是要把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也要通过个人的解放使整个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变的强盛起来。

在该文中，毛泽东用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结束语，向他的同胞们宣告：

>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狱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强调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

心是实现民族、国家复兴的关键，比他的 1917 年的文章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在从学校毕业到跨入社会的这两年中，毛泽东从书本上和实践中学到更多的开发和动员蕴藏于中国民众之中的巨大能量的方法。然而，在毛泽东能够着手制定一种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进行革命的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之前，但仍然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甚少，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了他的联想。在该文中，他首先列举了被称为“红旗军”的誉满全球的赫赫战功中的第一件大事，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接着谈到匈牙利革命，以及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还揭示了后来成为他的思想中的经典的主题，如政客需要“将脑子洗洗”和“和你们国度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以及千百万美国人面对“托刺斯的恶制”一起高呼“不许”之日才是“人类真正的解放”之时。此外，毛泽东还表示，坚决支持当时被协约国支配和压迫的德国人民。[7]

关于中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应当表现出与其它被压迫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人们通常认为，是由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共同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提出来的。很自然，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毛泽东后来的学徒生涯是参加次年（1920 年）湖南自治运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0 页。

动，这一阶段为他在 1919 年所作的基层群众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极有启发性的补充。到目前为止，这一鲜为人知的情节只是近几年出版了几个重要文献才得到了阐明。[8]这些文献为这一段插曲的记载，不仅为了解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忱提供了线索，而且也把他对政治工作的总体看法昭示于天下。毛泽东在 1920 年 9 月 2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还说，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运动，在现在和将来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任何一种有效的运动都必须是由“民”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①

1920 年 10 月 7 日，毛泽东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的建议，构成了上述观点的更加广阔的背景。在这项建议中，他们关于省政治发展程度和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 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

① 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7-518 页。

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①]

毛泽东在 1920 年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特定形势的反映，与他从 1917 年到逝世所一直强调的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国家统一、强盛的长期思想并不相符。然而，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其他一些思想，则全是贯穿于这位革命家后来全部生涯的典型的政治观点。一方面，他号召“入乎其中”来从事具休的建设活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注专于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立于外”而促进运动发展的必要性。换句话说，革命音的政治活动应该适应人民的客观要求，应该站在人民的中间，然而，为了动员他们、组织他们，革命者又需要站在人民之外，这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于 1921 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正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把自身混同于普通群众，而要求站在群众的前面。在毛泽东的全部政治生涯中，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勇敢地投身到实践中间，从事具体的实际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著作，还提出了另一个涉及“人民”的问题，即这场运动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运动的最初动力和精神鼓舞也来自“人民”。当毛泽东把“人民”一词加上引号时，他是在强调该词的多义性。这里的“人民”，是

[①]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920 年 10 月、6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92 页。

指他的 1919 年《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的“民众”吗？“人民”是指“中国人民”还足“中华民族”，它们谁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中心？也许，把这两个含义持久而稳定地联结起来，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独有特征。自从 1918 年和 1919 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是一个单纯关心或者首先关心中国“富强”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也不是从来不以国家名义考虑问题的 M·N·罗易[9]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在 1920 年期间，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标志是毛泽东于l 920 年 11 月 25 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改变了 1920 年 3 月 14 日给周世钊信中所持的出国留学“仍旧是糊涂”的看法。当初，他在给周世钊信中说，“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然而真正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实在很少，多数仍旧是“莫明其妙”。他还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占世界文明的半壁地位，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不过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那些人都到国外去学习。[①]

与此相反，毛泽东在半以后写给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的信，则抱怨“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她尽可能带领更多的女同志出国学习，并强调说：“多引一人，

[①]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 页。

即多救一人。”[①]

毛泽东对待来自于西方的思想的基本态度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并不像这些反差明显的段落所表示的那样，富有很强的戏剧性。根据他在 3 月份写给周世钊的信，可以看出，他宁原留在中国国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一个人通过阅读译著能更快地吸取国外的知识。总之，他这时的思想倾向仍保留着某种不确定性，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刺取中外古今学说的精华，使它们各自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按照他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生活”的计划，毛泽东说，个人方面的准备工夫是第一位的，应占大部分时间，而团体方面的准备工夫是第二位的。毛泽东还特意强调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为他打算在长沙成立的组织所起的“自修大学”这个新名字。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还宣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②]

到 1920 年 11 月末，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然主张，湖南应该把自己建设成一个“独立王国”，以便与落后的“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然而，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表现出某种极大的醒悟，即由于湖南号称有知识的人士缺乏理想、计划，也由于政治界腐败很深，使政治改革全部化为泡影。他说：“吾人惟有不理一切，

[①] 毛泽东：《致向警予信》（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9 页。
[②]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476 页。

另辟道路。”[①]

毛泽东在开辟这条新道路的过程中，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那个湖南学生小组，即后来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的成员，以及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他也是向警予的爱人）蔡和森。顺便说一句，他们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影响，不仅只表现在显然易见的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作为五四时代的显著特征和成果的打破传统观念、旧的习俗的态度方面。毛泽东在 1920 年 5 月收阅了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在来信中说，他和向警予实现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②]，毛泽东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并抨击凡生活在包办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而且发誓他是永远不会加入这个“强奸团”的。[③]

就毛泽东发动反对包办婚姻运动这一点而言，一年前，长沙一位年轻姑娘因其父违背其意愿强迫她嫁人而自杀的事件[10]发生后，毛泽东进一步号召改革婚姻制度，用“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取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早在 1919 年 11 月 25 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就断定，在人类的各种欲望中，如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誉欲、权势欲（又称支配欲）等，“食欲”和“性欲”是最根本的欲望。这时，他还写道，老年人和青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不同的，老年人不象青年人那样，把恋爱和性欲都看得重要，即“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他们关心的只是“吃饭”，因此，便把他们的

[①] 《致向警予信》（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8 页。
[②] 《蔡林彬给毛泽东》，《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2 月版，第 84 页。
[③] 《致罗学瓒信》（1920 年 11 月 26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67 页。

儿媳当作奴隶加以剥削。于是，“老头子”便天然地与资本主义制度深固地结合在一起，反对青年人的欲望的实现。[①]现在他已经认定，这种婚姻制度由于它禁止“最合理的事——自由恋爱”，是“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②]

在 1920 年，正像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李大钊经历了一个国际主义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兄弟”[③]那样，毛泽东也十分赞赏蔡和森的俄国人式的革命运见，并且接受了蔡和森的凡是社会主义都必须是国际的，都是不应当带有“爱国的色彩的”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那些生长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首先“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因为在这里做事更为便利，也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幼稚、腐败，首先从此着手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 1920 年 12 月 l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封信中，还是在 1921 年 1 月 1—3 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讨论会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新民学会的社会目标应该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他人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中国既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把中国和世界区分开来而加以提出。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作出这种区分则被认为是很重要的。[④]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蔡和森、肖旭

[①] 毛泽东：《恋爱问题——少年人和老年人》（1919 年 11 月 25 日），《改革婚制问题》（1919 年 11 月 19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35-437、420 页。

[②]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 年 11 月 26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6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 327-329 页。该摘录可参阅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第 208 页-210 页。

[④]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 月版，第 2-3 页。

东及其他会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以及其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们的争论意见，毛泽东收到信后，在 12 月 1 日给他们的复信中作了明确的回答。蔡和森、肖旭东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岁月里，关系甚为密切，形成了一个号称“三位豪杰”的三人小组，然而，他们在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之后，则对革命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分歧。蔡和森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肖旭东倾向于本质上属于含糊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更加温和的革命观点。毛泽东明确地赞同蔡和森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一时期，英国哲学家伯兰·罗素来到长沙讲学，坚持与肖旭东相同的路线，崇尚非暴力革命，不要农工专政。毛泽东在驳斥肖旭东的主张和罗素的言论过程中，也显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解是模糊的。例如，毛泽东在复信中，针对肖旭东和罗素的观点，把世界十五万万总人口划分为五万万“资本家”和十万万“无产阶级”[①]，以此说明进行俄国式革命的必要性。

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对“无产阶级”一词的用法，反映了他对该词的理解更接近于“无财产的阶级”的字义，而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或城乡产业无产阶级的概念还有差距。在后来的几年中，毛泽东终于对“无产阶级”概念有了更准确的理解。然而，出于毛泽东位革命者的本能反应，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人对无产

[①]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7 页。蔡和森和肖旭东 1920 年给毛泽东的信，参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出版，第 85-98 页。R·斯卡拉皮诺在《一个青年革命家的评价——毛泽东在 1919-1921 年》一文中，就蔡和森在那一时期对毛泽东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载于《亚洲研究杂志》，1982 年 11 月（42、1），第 29-61 页。

阶级的这种特定表达方式是否不再意指“地球上的穷苦人”之类的概念，这一点尚无法判定。

在 1920 年和 1921 年的冬季，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有某种不确定性，但他确实是朝着与列宁的政治思想更加一致的方向前进。最根本的标志，是他已经掌握了将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占居中心地位的列宁主义公理，即政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原理。蔡和森在 1920 年 9 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改选中国的唯一方法是“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①]，毛泽东于 1921 年 1 月 2l 日，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写道：

>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是悬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 192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历可以均匀地分为三个阶段。前两年，他从事组织湖南劳工运动工作，可以称之为他的“劳工”阶段。之后，从 1923 年到 1924 年，他在广东和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15 页。
[②] 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会委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他的这一阶段可以叫做“官员”阶段。最后两年，即 1925 年到 1927 年，众所周知，他主要投身于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这可以称为他的“农民”阶段。

从现有的有价值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来看，毛深东在这六年中的第一个阶段，其思想成果不如这以前和以后的时期中那样丰富多产。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他的“劳工”阶段的著述为数很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象他在其他阶段的著述中所表现的充满激情和雄辩的阐述能力。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这两年中，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任何一个领导者一样，从事着压倒一切的极为繁忙的组织工作，无暇动笔。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样的事实，他经历过农民、学生或城市底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从未真正经历过一个工人的生活。诚然，当他还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时，曾经举办过工人夜校，而且在许多场合与每个工人都交上了知心朋友。然而，他的知识分子的本能决定他对工人们的各种问题的理解，同工人本身对自己的问题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各个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无疑对他的知识的增长和政治上的成熟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那时，这种收获还是比较小的。

毛泽东在 1921 年中期至 1923 年中期所写的、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境外所获得其全文的那篇唯一的文章（多亏这样一个侥幸的情况：在 1923 年畅销的一本杂志中重印了这篇文章），在事实上毋宁是属于毛泽东五四运动末期理论活动的产物，这一情况是

富于启示性的。该文正是毛泽东在 1921 年 8 月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当时他最终建立了这个引起入们兴趣的大学。[①]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如同他自 l917 年以来一直主张的那样，着重强调了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重复了他在一年前写的关于湖南人的使命文章的内容。他在文中痛斥了“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酸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的现象。尽管如此，从该文中仍可看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涵义的理解，同上年（1920 年）12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所理解的那样，仍然带有一种模糊性。

毛泽东在其“劳工”阶段，所写的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作品也是很少的。李锐著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提供了毛泽东这一阶段著述的主要资料，最终只从中找到了一篇值得引用的文章。该文可以追溯到 1922 年 12 月，那时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而长沙《大公报》的总编辑撰文攻击工人受人驱策卷入政治斗争，并为他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毛泽东专门撰文对他的攻击进行驳斥。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句子，说道：

>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的朋友……先生，切莫再站在旁观地方……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

[①]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81-84 页。

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吧？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即那些试图改革社会的人们（就象这位《大公报》总编辑声称他愿意做的那样），应该“入乎其中”，而不应该是一个站在旁边的评论者，或者认为自己比普通群众高明。然而，该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也未提及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也许，当时的《大公报》不是阐述这些思想的地方，但李锐毕竟没有引用毛泽东在“劳工”阶段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

这种原因也许是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路线。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为了推动中国的同志们同民族主义者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一种通常被认为是“内部集团”的单一组织形式[11]。这一主张最初是由马林于 1922 年 3 月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其个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组织社会民主运动的经验，该地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以同样的方式同一个带有宗教色彩名为伊斯兰联盟的民族主义革命组织亲密合作。陈独秀和其他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最终否决了这个主张，马林便取道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述了这一情况，并得到共产国际认可他的主张的一个正式批件。马林由有了这一尚方宝剑，便于 1922 年 8 月返回中国，以便对中国的同志们强制推行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2 月版，第 428-430 页。英译本，第 251-252 页。关于毛泽东的工人运动的作品，尽管毛泽东著作（东京版）补卷的编辑们曾经广为收集，但是，除了本篇以外，他们也只是获得了二、三篇非常的原文。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建立“内部集团”这一政策。[12]

这样一种国共合作方式在其提出之始，就引起了强烈的争论，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就人们所知，无论是在设计这一策略方面，还是在促成它的被采用方面，毛泽东都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毛泽东却是最早积极参与贯彻这一政策的人中的一个。1922 年夏季，毛泽东在湖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并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支部书记的身份，结团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十五个月之后，即 1923 年 9 月，毛泽东已经积极地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并绘国民党中央机关写了一封信，要求正式任命他为这项工作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以便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①

从那时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当陈独秀和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一旦接受了建立“内部集团”的要求，便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倾向，断定这意味着接受民族主义者的领导，即“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至少在目前必须这样做。这就是陈独秀在 1923 年时所采取的立场。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在其“官员”阶段，沿着此方向走得更远。

1923 年 4 月，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表明他正式采纳了建“内部集团”的主张。他在该文中指出，在

① 毛泽东：《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林伯渠、彭素民》（1923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不外乎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他写道，关于革命的民主派，其“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而非革命的民主派则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部分是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直、奉、皖三个主要的军阀派。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社会总体力量划分为三派，这构成了其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很独特的方法，并且一直沿用下来。该文所阐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可以叫做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这是他在 1919 年《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专门强调过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各种军阀势力太大，在一个民主政府支配下的中国统一将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相矛盾的，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中，中国既不可能进入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实现统一。然而，政治状况愈是反动、混乱，就愈能激发起全体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比一天进步，中国的政治结局将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实现中国的民主和独立。[①]

毛泽东在 1923 年 7 月发表的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中，突出了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力量和不革命的民主派力量的胜利具有共同利益的商人的地位，它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容易引起论战的课题，这是更为引人注目和更具特色的。毛泽东在该文中说道：

[①]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原载《新时代》（1924 年 4 月 10 日）。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个简单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刀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①]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根本不是论述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阐明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的本质。[②]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现有的毛泽东的思想资料，而且也完全忽视了毛泽东的世界现在 1923 年至 1925 年之间所发生的划时代的转变，即从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的飞跃。在这篇文章的另一段，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的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该文中认为商人和更广大的城市居民更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原载《向导周报》第 31、32 期合刊，1923 年 7 月 11 日出版。

[②] 林达·谢弗：《毛泽东和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载于《现代中国》（1978 年 10 月出版），第 4 卷，第 4 期，第 416-471 页。林达·谢弗在《毛泽东和工人们：湖南劳工运动（1920 年-1923 年）》的第 1-2、222-223 页，重新提出来这一论断。

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受害最深，所以最有能力在中国民族革命中充当领导力量。过了三年，在毛泽东发现了农民是天然的、潜在的革命力量之后，他对整个社会问题所作的分析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在我们着重探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变化发展之前，该文中反映出的毛泽东的另一个持久的思想特征也是使得注意的。毛泽东把他的结论叙述如下：

>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的唯一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定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晰地看到、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国民或公民），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民 （民众或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密切地联系着的。

从 1923 年 7 月毛泽东的这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和另外两篇更为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到毛泽东于 1925 年 12 月取得了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主编地位，中间经历了两年半的时间，毛泽东在这一期间所写的在中国境外很有影响和真正有价值的文章也不多见。他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过简短的发言，并于 1924 年 2 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起草了几份提交批准的议案。即使在这样一些正式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词也显示了他的工作作风和政治谋略方面的永久性特

征。例如，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曾经反对过一项关于设立“研究部”的提议，他所依据的理由是：“本案根本意思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①]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工作近一年后，于 1924 年底回到湖南休养，在这期间，他开始了组织和发动农民运动的学徒实践。1925 年秋季，毛泽东返回广州，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实际从事主管工作，主编《政治周报》，并开始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他主持了 1926 年 5 月——10 月的讲习所工作），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为止，他的思想中终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引力重心在于农村中的广大农民。此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其提交给 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多缺点，指出：我们的工作“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②]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了当时革命斗争方式的转换，即农民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本人发动农民的工作得到了开展。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通过开发农民这一潜在的革命力量，本革命党（或几个革命党）才能够造成一种实现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其 1925 年至 1927 年“农民”阶段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地说

[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 57 页。

[②] 毛泽东：《宣传报告》，原载于《政治周报》六七期合刊，广州政治周报社，1926 年 4 月 10 日。

明了这一点。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党内的部分核心成员，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就都实现了自己的注意力向农民身上的转移，然而，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作为则是卓然超群的，他不仅应运而起卓有成效地承担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重任，而且他早在 1926 年初就从理论上阐明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预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进程。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是何时形成的？这和其它任何单一的问题相比，也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更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随着学术争论的不断进行，其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都逐步得到了澄清，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现在仍有一些问题保留着疑点。1936 年，毛泽东在和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说过，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去寻找革命的潜力，那只是在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全国城乡爱国情结高涨的时期。现有的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证据，也有助于肯定毛泽东的这一说法，确实表明了他只是到 1925 年底才真正把其注意力转移到农村革命问题上来。然而，为了阐明贯穿于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这一中心问题，不管这种注意力转变的焦点如何，我仍然乐意在分析毛泽东于 1926——1927 年间提出这些主张之前，先谈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对农民的态度问题。

1919 年的下半年，毛泽东曾经效仿日本青年早年在日本倡导的“新村运动”，并起草了一个广泛的建立“新村”的“计划

书”，其中第一章《学生之工作》于 12 月在长沙发表。在这个计划书中，除了提出建设“新村”口号本身外，还号召中国的青年要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农村去传播社会主义思想。[①]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反映出他是受了李大钊思想的影响。[②]然而，他的另外一些议论，诸如“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以及“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国则有‘工读会’”等等，似乎是来自于杜威和胡适的观点。

然而，比这些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 20 年代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22 年 9 月，毛泽东在给湖南“自修大学”讲课过程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的看法，这些内容包含在一篇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文章中。[③]尽管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参加这篇文章的撰写工作，但他默认了文中关于农村阶级结构的分析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文章。在这篇文室中，毛泽东为了驳斥那些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是如此艰难，土地兼并不是如此不公平的人为观点，把“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级”分为四种类型。

1、占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一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55 页。
[②] 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渊源》，第 55-56、80-89 页。
[③] 《告中国的农民》，最初发表于《共产党》（1920 年 12 月 23 日出版）第 3 期。后载于《一大前后》一书。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指出毛泽东在讲课中使用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资料选编》第 24 页，把该文作者归为毛泽东，似乎有误。

2、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3、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4、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上述这四种人里面，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况且第三种人也不得不经常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或典当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沦为第四种农民了。[①]

尽管该文对农民所作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是很不成熟的，然而，人们仍然可以从它和毛泽东于 1926 年 1 月和 2 月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中，看到它们暗含着的某种相似性，它们各自都是从总体出发，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乃至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农村的阶级关系，论述了佃农所遭受的敲榨勒索性质的租赁的剥削，以及地主对土地的集中倾向，他接着从中引申出了一个政治结论，提出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他说：“我们人类，从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

[①] 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月刊第 3 期，1920 年 12 月；后收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李锐的书第 455 页指出了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作过讲演的事实。《资料选编》第 24 页把毛泽东作为该文的作者，显然有误。

[②] 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原载《中国农民》第 1 期，1926 年 1 月 1 日。）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中国农民》第 2 期，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先前，世界本来是一大块土地，大家都可以共用的。后来出现了私人财产，允许少数人游手好闲、吃肉穿绸，这是他们从农民手底下抢走的，现在农民应该赶快起来抢回他们被抢走的东西，农民一起来，自然共产主义（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有食物和工作）会来帮他们的忙的。[①]无疑，这样的言词无非是表明要诉诸农民的武装，同时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到了 1922 年，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对于农村革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和切合实际的战略。在以后的四年中，毛泽东为了精心设计这种战略，经历了长期而又艰苦的探索过程。

到 1925 年和 1926 年，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毛泽东在其 1926 年 2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指出：“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②]在这种总的阶级结构中，他把大地主划归为大资产阶级的部分，把小地主划归为中产阶级的部分，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其他阶级，如同依据其生产方式进行划分一样，而依据其财产多寡和生活贫富程度，把它们划分为下等的阶级集团。在这里，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强调的是看农户能否达到“收支相抵”，而不是采用以拥有土地和雇佣劳动力的数量这一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所以，毛泽东所采用的阶级划分理论框架与陈独秀在 1923 年使用的框架是大不

[①] 《一大前后》（1），第 212-214 页。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中国农民》第 2 号，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相同的。[①]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类型和陈独秀的划分类型基本一样的观点[②]，是完全错误的。实在地讲，他们两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毛泽东具有内在的独创性，即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农村革命的问题，是按照他自己的主见来解释甚至制定符合于战略目标的模式构想的。

毛泽东对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分析和他们对中国革命态度的见解，在实际上，是于 1925 年底形成的。他以“子任”为笔名，曾为《政治周报》最初的五期撰写了五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这篇文章基本上勾画出了 1926 年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轮廓，但没有说明自耕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哪些是属于有余钱剩米的，哪些是收支基本相抵的，哪些是不够维持生活的。[13]这篇文章发表于 l926 年 2 月，可能是为了同他的一个将递交 1925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的发言的主旨相吻合，在行文中基本上采用了他在 1926 年 3 月发表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相同的用语，暗合了要以政治行为，尤其是要以国民党内部的派别进行社会力量划分的意向。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社会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所采用的非正统的方式，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信誉，因为它把上等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

[①] 我在《毛泽东与各阶级在 1923 年-1927 年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中，已经把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与陈独秀的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作了比较。我的这篇文章载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纪念已故教授村松祐次纪念卷》，第 227-239 页。

[②] 正如菲力浦·黄在他的文章《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论断的那样。这篇文章载于《现在中国》（1975 年 7 月出版）第 1 卷，第 3 期，第 279-280 页。

主阶级）划归入顽固的反革命阵营，把下等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划归入革命阵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开始思考，在西方列强不断地入侵，无产阶级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的形势下，如何促进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加速分化，迫使他们在两个阵营之间进行选择。正如毛泽东在 1926 年初的几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他以后也是坚持这样做的，他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到四万万）置于革命的一边，仅仅把一百万人口算作死硬的反动派，与“上等”阶级的划分范围相适应，而把四百万人口看作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他们也正在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猛进。[14]

至于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毛泽东在 1926 年初是强调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农村普遍存在着的贫困程度所决定的他们对革命的迫切要求，而把城市无产阶级规定为革命的“主力”。[①]由此看来，即使“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概念只是到 1951 年才被补写进这篇文章中，但毛泽东确实在 1926 年之初就已经领悟到了工人阶级是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了 1926 年 9 月间，毛泽东被农村中爆发出来的巨大革命能量和革命热情所左右，以致于他很轻易就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②]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也在这时发表。毛泽东在该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②]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6-179 页。对译文摘录更详细的讨论，参阅我的《毛泽东与各阶级的地位》一文。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陈述本身确无异乎寻常之处，因为从1925 年下半年以来，农村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即使是那些极端的“城市中心论者”也不能不加以注意，以致在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每个发言人的言词中，任何主张农民运动的倾向都不约而同地被看成是陈腐的东西。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是从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的，这确实又是非常杰出的思想。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正是这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外国帝国主义者才能够依赖这一基础对农民进行剥削，而中国军阀只是乡村封建地主阶级的首领。由此，正如海丰县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只有把农民动员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才能够被推翻。他还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旧中国农村社会反动力量的顽固性，肯定了农村革命力量推翻它的必要性，而且还批驳了“城市中心论”者的某些观点。他指出：

>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

[①]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1926 年），《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6 页。

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的，……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在我看来，这一段落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提及只是出于礼仪上的需要，它的真实含义是要清楚地表述：旧中国反动政权的真正核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由此革命者的真正的奋斗也应该在乡村中进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以非常明快直率的语言，在这篇文章的末段，作了总结性的说明：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

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

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在目前（“目前”——到底是指多久呢？）只不过是追求他们的有限利益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可以说，他们的积极性是被“工会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而农民则不同，他们不仅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以致不推翻这个旧制度的大厦，便不能实现其目标，而且他们对于形势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在审慎地开展一场包含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内的更加广泛的斗争。

此后，毛泽东再未象这样明确地把农民看作是有觉悟的革命先锋而把他们置于工人阶级的地位之上。他在 1927 年 2 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了贫农在乡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领导作用，透过文中生动形象的描述，仍然隐约可见毛泽东还未完全放弃上年九月所持的夸大农民地位的立场，但该文也没有低估城市斗争的重要性，也没有低估城市中各阶层斗争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该报告中指出，迄今所取得的 70％的革命成果都应归功于农民[②]，这一名句可以被解释为，它是用以说明农民的伟大力量，而不是用以说明农民的领导地位，而且只是为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来加以描述的。毛泽东在该报告的另一段以简洁的语言概述了上年九月文章中对革命任务所作的具体分析，其大意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

[①]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1926 年），《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集，第 211-212 页。

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毛泽东又说：“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尽管农民是一支极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它不能自发地发挥其政治作用，而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领导，这是一条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其提出者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在随之而来的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反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依赖于农村革命的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1926 年 9 月，毛泽东确实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曾经说过，农民不起来解放整个中国社会，最终农民也不能解放他们自己。在这里，毛泽东似乎是正在赋予农民一种使命，就如同马克思赋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无产阶级的使命一样。然而，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同时也提到了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对于毛泽东的这两种说法，如果我们把“农民只有解放整个中国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理解为论述当时阶段的革命斗争形式，而把“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理解为规定长期革命斗争结局的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当然，这种综合的解释仍然是把二者的统一归结于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高涨程度，而这与马克思的正统观点是几乎不相符合的。总之，如果毛泽东也是这样来看待问题的，那么他处理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5 页。

农民问题这一方法的另一面，即教育和改造农民，就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在确定社会革命转变形式的过程中才能付诸实施。然而，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注　　释

[1]关于毛泽东的早年活动和思想的最全面的叙述，见于李锐所著的青年毛泽东传记，该书于 1957 年首次出版，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本版已由安东尼·W·斯图尔特译成英文，由詹姆斯·C·熊编辑，由斯图尔特·R·施拉姆作序。李锐现在已经出版了作了很大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本，即《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该版本收入了相当数量的新资料，包括论述五四运动前后的毛泽东的思想的全章。这一章原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第 33—35 页。此后应该把该版本看作标准版本。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方便非汉学家读者，我也援引英文译本。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于《新青年》1917 年 4 月 1 日第 3 卷第 2 号，译文见《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53 页。该书仅仅包含了毛泽东在 1917 年所写的这篇文章的摘要。我已经在我的专题论文《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发表了全部的译文。1975 年，M·亨利·戴维在他的斯德哥尔摩的论文《毛泽东 1917—1927 年的学说》策 21—31 页中，把全文译成了英文。这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是对我们关于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所做的重要贡献。本书刊载了中文原文东京版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的第 1 卷所包括的所有毛泽东著作的译文，尽管有时不能令人信服，但附有一些启发性和创造性的评论。

[3]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191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9 页。黎锦熙原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移居北京。（参见李锐所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8 页）毛泽东提到的那些论述智、仁、勇的当代的教育家们，正如本杰明·施瓦茨所指出的，特别包括赫伯特·斯宾塞，毛泽东肯定通过严复的译文读过斯宾塞的书。

[4]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6 页。毛泽东关于中国也要对世界做出某种贡献的观点，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领向的。杨昌济在长期的国外留学期间，曾用“怀中”（其字义是“怀念中国”）一名，以表达他的爱国之情。对此，请参阅李锐的《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见《时代的报告》,（1983 年 12 月），第 12 页。《新华文摘》刊载此文，见

1984 年第 1 期，第 178 页。

[5]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41 页。李锐于 1957 年重新刊载的本文的摘录并未包括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段话几乎不能成为其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的论据。他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大意是：毛泽东于 1919 年 7 月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他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 年版第 106 页）正如下文所指出的，这一现点与他在 1980 年的修订本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

[6]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2—293 页。也可参阅《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3—54 页；M·亨利·戴维的译文，第 81 页。（读者如要了解把“实用主义”译作“Pragmatism”的原因，请参阅戴维所撰写的那部著作，第 83 页，注释 2）。当然，中国直到最近，人们未能提及胡适在那个时期对毛泽东的影响。（早些时候，毛泽东本人在向埃德加·斯诺口述的自传中，是承认这种影响的。）（读者如想了解一个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简明扼要的评论，请参阅戴维的那部书的第 47—48 页）。中国 198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不仅要人们注意胡适对毛泽东的称赞和毛泽东把实用主义看作那时的“指导思想”，而且公开宣称他们之间在 1919 年还没有出现原则分歧。这篇文章是 1978 年以来发生的引人注目的革命在思想研究气候中的反映。参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3 页。

[7]关于进工厂的说法，参见毛泽东：《炸弹暴举》（1919 年 7 月 14 日），载于《湘江评论》第 1 期，第 3 页。关于联合起来呼喊的说法，参见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同上杂志，第 1 期，第 3 页。关于德国的压迫的说法，参见毛泽东：《畏德如虎的波兰》（1919 年 7 月 28 日），同上杂志，第 3 期，第 2 页。（这篇文章是许多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有一些是其他作者所写的）。吉奥乔·曼蒂西已经出版了能收集到的《湘江评论》的几期全部意大利译文。刚才提到的那几篇文章见于该书第 76—78 页，以及 164—165 页。我要感谢吉奥乔·曼蒂西先生，因他好意地把这些材料的中国版本的一个副本送给我，所有这些本文现在均在《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中发表。现在，这三篇文章分别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20t、321、379 页。

[8]这些资科——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和与其他两位作者共同草拟的关于召开一次立宪会议的建议，都是安格斯·麦克唐纳在他为撰写博士论文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其论文的题目是《农村革命的诸城市起源》（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莱，1974 年）。这些资料还曾以相同的题目以书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已把中文本文在《法学研究》（1972 年出版）第 46 卷，第 2 期，第 99—107 页上发表，并附有一篇用日文写的评论，而且还在《浪人》（RÕnin）（东京）（1973

的 2 月出版）第 14 期，第 37—47 页和《中国季刊》（1976 年 12 月出版）第 68 期，第 751——777 页上用英文讨论了这些资料。

[9]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人，生于加尔各答。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早年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从 1907 年起参加反英的恐怖主义活动，1917 年在墨西哥定居。俄党十月革命后，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于 1919 年在墨西哥参加社会党，不久退出，参加墨西哥共产党。1920 年以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身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去塔什干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同年在塔什干成立最早的印度共产党组织。1927 年，他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 7 月去苏联。后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国际，1929 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1930 年底回到印度，1931 年 7 月在孟买被捕，1936 年 11 月获释。1940 年加入印度国大党。他在晚年竭力宣扬“新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泽注。

[10]毛泽东就这一问题共写了九篇文章。读者如要了解其概要，请参阅李锐所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等 218—221 页。《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翻译了这九篇文章的摘要。这九篇文章的全文，最初发表于 1919 年 11 月 16 日至 28 日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这九篇文章现已收入《毛泽东的早期文稿》——译注。）

[11]“内部集团”是施拉姆对马林所主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方式的一种概括性称谓。马林在 1922 年 7 月 11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与此相反，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还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blocof variousclasses）。国民党的松懈组织形式，使它很容易提倡群众运动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员必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利用它的松懈组织形式从里面去控制它。这种国共合作形式不会混淆阶级组织和限制共产党的独立政策。这种合作方式是直接从他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中取得的。参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4 月版第 11—16 页。——译注。

[12]马林曾经告诉哈罗德·艾萨克斯说，他只是根据他个人的权威去说服那些中国人接受那项建议，而其“手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文件”来支持他。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了假话。（见《中国季刊》1971 年第 1—3 月，第 45 期，第 10 6 页。）苏联和中国的学者都具有这个原文所概括的观点。参见 V·L·格鲁宁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 年）》，载于 R·A·乌里扬诺夫斯基主编的《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280—344 页，以及肖

牲和姜华宣合写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51—68 页)。托尼·塞奇所编辑的一部即将出版的著作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文献，该著作题为《中国国内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由来：斯内夫利特（又名马林）的作用》。本书记载了与中国有关的斯内夫利特的全部档案资料，并附有一篇长篇序言。

[13]约翰·菲茨杰拉德在其所写的论文《身着便服的毛泽东：最新发现的几篇毛泽东著作》中，第一次宣称这些文章是由毛泽东所写的。菲茨杰拉德的这篇论文载于《澳大利亚的中国情况杂志》(1983 年 1 月出版)，第 9 期，第 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断本身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 6 同我所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也肯定了上述著作确实是毛泽东所撰写的。读者如要阅读毛泽东的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1926 年 1 月 10 日出版，第 4 期，第 10—12 页。）的全部译文，请参阅菲茨杰拉德所写的上述著作的第 9—15 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 1910 年就使用过“子任”笔名，当时他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毛泽东用此笔名，是出于他对梁启超的敬仰。有人已经指出过，梁启超在那一时期对毛泽东的影响。梁启超的尊称是“梁任公”，“子任”具有“任之子”的意思。参见李锐所著的《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第 176 页。

[14]读者如要了解认为“子任”所写的那篇论文的大意与毛泽东于 10 月 1 日所作的讲演之间是一致的论断，请参阅约翰·菲茨杰拉德所著的论文《身着便服的毛泽东：最新发现的几篇毛泽东著作》第 5、9 页。菲茨杰拉德写的该文第 4 页所附的图表清楚地显示：子任的这篇文章所使用的人口各种类别的数字与 1926 年 2 月所使用的数字是相同的。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强调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人口都拥护革命的相对应的段落，都翻译载于菲茨杰拉德的论文第 14、15 页中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13—214 页中。

第二章 党、军队和民众

（1927——1937 年）

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毛泽东尽管在设计“内部集团”这种单一组织形式的工作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从 1923 年开始，他却通过强有力的工作来实现这一方针。显而易见，他之所以能够在这方面有效地开展工作，是因为他把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放到了首位，而且认识到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当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在 1925 年 10 月到 1926 年 5 月实际主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工作期间，为了把党内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同其他持有激进观点而又是非共产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他在为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驳斥所谓国民党正在被“共产化”的非难。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是实现人民的统治”，“是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一句话，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

[①]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原载《政治周报》第期，广州政治周报社，1925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毛泽东在其 1926 年 1 月发表的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中新右派的出现并不是国民党左派操纵的结果，而是革命的发展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他写道，“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那些曾经支持 1919 年“反对满清”的革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则不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和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①]

在当时，即 1926 年初，正如我在上面叙述毛泽东对于农民革命的看法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仍然坚信，在四万万中国人口中，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唯一能够与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中的农民取得联系的媒介。

1927 年初，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他在这个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27 年 2 月 16 日，他在单独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对他的新见解的阐述要比这一著名的报告公开发表时直率得多。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把湖南农民运动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即组织农民协会时期、农民革命时期和建立联合战线时期。他特别强调地指出，在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要经历一个真正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过程，这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经过一个猛烈

[①]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于《政治周报》第 4 期，广州政治周报社，1926 年 1 月 10 日。

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时期，农村联合战线的建立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诚然，他也说，农村中产生的各种冲突，要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加以解决，而不要直接打者共产党的旗号去处理，然而，他非常明确地把这看作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毛泽东还说，现在群众是向左的方向发展，迫切要求进入另一种革命，共产党在循此方向领导他们的过程中决不能退缩。[①]不管怎样，到 1927 年下半年，毛泽东丢掉了对蒋介石以及所谓“国民党左派”的所有幻想，即丢掉了以为他们会支持农民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的行动的幻想，因而，他成为最早站出来号召同以前的同盟者实行彻底决裂，并在农村举起革命红旗的入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花费的 22 年时间，毛泽东几乎是全部在农村环境中度过的，他亲自经历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早期思想的继续和付诸实施。然而，这些年又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年代，并且以此构成了同过去的根本决裂。当然，毛泽东早就通晓和习惯那断断续续地贯穿了其大半生的战争，当他还是 18 岁的青年时，就成了一名革命军的兵士。在 1925 年至 1927 年间，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北方军阀进行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机会，也显示出极其敏锐的眼光。然而，对于共产党人组织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并把它们作为从事革命斗争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工具，那就是另外一个新的问

[①] 《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1927 年 2 月 16 日），载于《农民运动》第八其，中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55-257 页。

题了。

毛泽东的革命经历对他的理论贡献所产生的影响，从 1927 年起，就开始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他总结了当时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形成了更为严密的革命战略和游击战争策略的理论，这应看作他的完整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江西和延安时期所开展的游击战争，作为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母型，不仅推动了毛泽东对军事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他组织革命领导工作的方式以及渗透于他的世界观的哲学精神，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后一点无疑非常重要，但不应把它加以夸大。毛泽东高度重视军事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象威特福格尔等人所论证的那样，变成一个嗜好为军事而军事的战争狂或者法西斯分子。然而，这也确实强化了他对于勇气、意志和尚武精神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他最初发表的文章中就能够看出来，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未发生变化。

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所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政治工作方式，即使当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之后，这些传统仍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共产党所保留下来。总的说来，游击武装部队发动农民群众，是一件与中国共产党发动城市无产阶级很不相同的事情，它反映的既不是革命的杰出人物与他们的支持者的关系，也不与用于规定和证明整个革命事业本质的意识形态完全相符合。

当然，中国革命和先于它发生的俄国、欧洲革命等先辈的差

别，也不是象刚才总结的那样刻板。即使是在江西，而不是在井冈山，这里仍有某些小规模的工业和它的工人队伍，在整个 1927 年到 1949 年期间，这里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在理论上隶属于它的红军。因此，它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一个党和军队领导城市和乡村“民众”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贯穿于这 22 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党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这支军队机体的灵魂和寄生物而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军队的作用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的充分权利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幸存则应归功于军队这一“防护盾牌”的保卫，而不是归功于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巩固。当然，毋庸置疑，无论是党还是军队，如果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它们也是不能持久地存在的，这种共产主义运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与所知道的以前任何一种联系情况都是不相同的。

正如毛泽东本人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模式和苏联革命模式的区别，不只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的是武装斗争，而且是在乡村进行的武装斗争。同时，这种差别也是在于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实际夺取政权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虽然变化不定但规模却经常是相当可观的地区和人口实施有效的政治控制的实践中形成的。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事业，是置身于它同人民群众的三重联系之中：一是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支军队力求从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源源不断地吸取对其作战行为的必要支持；二是作为先锋队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这个党力求引导无产阶级去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三是政府或作为“国中之国”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政府在它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与其所控制下的人口建立起复杂的多层次的相互关系的网络。

毛泽东是那些注重从中国革命这一独特的现实出发，来协调领导和群众关系各个不同方面的人物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这些在他的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原则上说，统摄所有这些关系和反映这些关系实质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群众路线”。

对于领导者来说，群众路线的方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思想遗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它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区别于苏维埃所具有的不同特色。尽管毛泽东对这一方法只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作了充分的阐述，但是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和方法早在 15 年前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绝对必要性要求自己同工作于其中的民众建立起最密切的联系。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把自己置身于群众，同群众一道工作，这决不意味着沉溺于群众，崇尚某种民粹派的放荡的自发性。人们不应该把“延安精神”加以浪漫化或情感化，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大民主”的信奉者。194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在其《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经典著作中，首次对他的群众路线思想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表述。从

该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所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应该深入到基层组织中去，倾听下面的呼声，学习群众的经验。其中，关于“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的指示，具有十分严肃的含义，然而它也表明，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是，使人民群众对自己本身无力阐明的思想能够加以接受，深入其心，这句话和列宁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然而，在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列宁的领导方法之间，以及在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毛泽东从 1927 年开始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及其发展。首先从他关于军队的作用的思想谈起。

1927 年 8 月，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批评了毛泽东的秋收起义计划，指责他过分看重军事力量，缺乏对民众力量的信任，而且把他的起义行动说成是“单纯军事冒险”。毛泽东在其答复中，直率地提出，中央委员会是在实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②][1]在实际上，毛泽东在 8 月 7 日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就已经对这种批评作出了回答。毛泽东说：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54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16-317 页。

[②] 参见《湖南省委来信》，原载《中央通信五期》，1927 年 9 月 20 日。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在这里，毛泽东似乎是第一次使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并补充说，在现时的情况下，党应该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②]毛泽东确信，只有军队，或者是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的游击部队，才能同军队作战，单凭群众赤手空拳是不能打败白军的。

1927 年秋季，在一段时期内，担任党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的翟秋白，推行一种齐里亚主义[2]式的“无间断的革命”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似乎可以赤手空拳地战胜敌人，但这些希望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对于毛泽东来说，自从秋收起义之后，他对于红军是保持革命的必要条件的观念更是深信不疑，从未发生过动摇。

到 1930 年夏末，李立三的路线也遭到了破产。在这之前，毛泽东倾向于认为，把军队置于中心地位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此后，他终于认识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随后还要论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方面）。尽管毛泽东关于革命的时间尺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革

[①] 《毛泽东通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的一部分》,《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3-4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 页，第 299-300 页。

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还是军事斗争，他头脑中的关于军队和民众的关系的思想，就将保持稳定性。大体说来，毛泽东把这种军队和民众的关系精辟地概括和比喻为鱼水关系，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显然，这一比喻并没有降低民众的重要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群众这个“水”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军队这条“鱼”便会毫无希望地死去。所以，共产主义者必须精心维护和开掘群众支持这一源泉，以便使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海洋不致于涸竭。同时，毛泽东的这一比喻也清楚地表明，军事斗争是由代表群众利益的红军来进行的，并不是直接通过群众本身来承担的。

要对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将涉及到许多变化着的情况的广泛的争论。下面将对毛泽东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思想的主要特征，通过若干阶段情况的考察，加以简要的概括和说明。

早在 1928 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已经看到建立正规的游击武装组织的重要性（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同时，也看到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认为，在革命根据地，红军能够得到休养和补给，能够发展同群众的联系，而避免他们进行的战役可能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当然，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他在这个偏僻的井冈山地区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与李立三以及毛泽东本人满怀信心所盼望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内在联系。1928 年 11 月 25 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中指出，他的军事力量的活动

还算不上是暴动，而只是“打江山”[①]，而且只要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他们只能如此。但是，毛泽东很快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主张，即迅速扩大红军所占领的割据区域，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9 年 4 月 5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委员会的来信作了答复。中央委员会在来信中，要求毛泽东和朱德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到农村，朱德和毛泽东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毛泽东在复信中指出，从该项要求中可以看出，对于形势的判断是过于悲观了。他认为，利用蒋介石和桂系集团之间的战争，在一年之内，占领整个江西，以及闽西和浙西，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他也为他进行的农村斗争的正统性质进行辩护，断言这种农村斗争也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生的，而且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据地同样可以在上海和其它城市建立起来。[②]

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尽管它经常不能预先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如何迅速地到来，相对地也不能及时定下是否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或者巩固他们的阵地的决心。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它是有着十分明确的或者连贯的理论主张的。莫斯科的观点在实质上是，在农村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活动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当这些活动与有力的城市革命斗争相互配合得到开展时，使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真正重新得到认真对待时，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①] 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对该词的注释是：“‘打江山’这个词的意思是用老式方法征服全国，以前争夺皇位的人是从很小的地盘出发的。”

[②] 读者如要阅读毛泽东从 1928 年 11 月的报告中的相关段落，参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的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现在发表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还请参阅《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59-260 页。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

> 党指导着各省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要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临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在 1929 年 12 月[②]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告诉中国共产党，目前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开始兴起，一旦革命高潮高涨到一定程度，就应该采取建立工农专政的步骤，这对李立三制定全国中心城市立即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的全国危机以及革命高潮的另外一个特异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尽管农村中兴起的革命运动（在这里，共产国际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这种农村苏维埃运动同"红枪会"之类的民间传统组织的活动混为一谈），"成为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将要生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高潮"，然而，"日益增长的高潮的象征"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 1927 年严重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28 年 2 月 25 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5 册，第 293 页。黑体字是俄文原文就有的。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1929 年）所注明的日期是"1929 年 10 月 26 日"。——译注。

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①]

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承认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情况下，是革命成果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又强调，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则是更正规、更地道的革命活动，它不仅是最基本的，而且最终对于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至于李立三，他则是一个比共产国际对农村所发生的任何意义重大的事情持有更大怀疑态度的人。然而，在 1930 年初，当他着手拟定来年夏季发起巨大攻势的计划时，突然又心血来潮，决定让红军充当一支极有用的辅助力量，攻打大城市，以分散国民党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使城市和农村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双尖头的叉状攻击态势，最后夺取胜利。

关于城市和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权衡问题，在当时莫斯科持中间立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李立三是各执一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即在中国革命的时间尺度问题和中国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问题上，毛泽东、李立三两人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比较接近的，而与莫斯科的观点则大为不同。

李立三和莫斯科之间在革命高潮的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分歧，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难解的疑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的通讯联系极为缺乏，双方的信件来往通常要花费数月才能到达对方手里。这样一来，这两方领导者经常是响应或者答复早已为对方所抛弃了的主张。这里仅举一例，共产国际的一封 1930 年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 年 10 月 26 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795 页。

6 月的信件（通常按照中国的资料出处，其注明的日期为 7 月 23 日，因为它当时是在该日于上海坡收到的。）是于该年 5 月在莫斯科起草的，它答复的却是早已为人们所知的中国共产党在 2 月份所采取的决定。[3]尽管这种正面的主张和相反的主张之间的先后次序是如此模糊，它使得历史学家断定谁该对特定的决策负责（特别是对 1930 年前半年间发生的代价昂贵的失策负责）的工作变得复杂化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地把握斯大林和李立三之间存在着的广泛的意见分歧。

到 1930 年 6 月，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注意到了，此刻全中国仍然没有出现客观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但是，事态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①]诚然，共产国际也很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决战，但他们并不同意李立三的总攻时刻已经到来的观点。由此，莫斯科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攻打武汉、长沙等城市以及在这些城市进行双坐标暴动的决定，而主张红军和工人运动首先应该使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加强。[②]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最初是极不情愿把自己的力量投入进攻国民党的大本营的，认为那样做将招致丧失自己力量的基础和革命的未来的双重危险。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同意了莫斯科的意见。但到了 1930 年初，他在实际上又变得非常乐观，认为胜利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 年 6 月）。
[②] 见《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 年 10 月）。

已为期不远了。他在 1930 年 1 月结林彪的一封信中，批评了林彪对于革命高潮的到来所抱的过分悲观主义的态度，并说：他本人在 1929 年 4 月把争取江西的计划仅仅限定一年为期，这是“机械的”，但取得这样的战果也并不是迢迢无期的。[①]

毛泽东的态度在 1930 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的问题，近来在那些占有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中，成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课题。在这些作者中，有些仍然坚持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肯定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始终没有赞成过李立三的那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只是一度出于组织纪律的要求，服从命令执行它；另一些人则认为，毛泽东到了 1930 年春季时，便已经被说服并接受了李立三的这一战略，只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认清了它的错误和危害，才限制和反对它；此外，更有甚者，竟然提出了毛泽东从 1930 年初就盲目地、狂热地追随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尽管这些看法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毛泽东在 1930 年 10 月时，仍然继续公开承认这一激进的路线。1930 年 10 月 7 日，当毛泽东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吉安城时，曾经在这里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提到存在着“全世界、全国、各省的革命形势”，并且得出结论说，“在革命高潮的进程中，……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突起于全国和全世界。”毛泽东还在另外一封注明日期为 10 月 19 日的信中，要求他的同志们在革命“高潮”高涨的环境中，克服悲观主义，立即进攻南昌和九江，消灭盘踞

[①]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编》（6），第 562 页。《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在那里的敌人。[4]

假如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可以被解释为是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他认为中央委员会愿意听到的话，从而对于那种认为毛泽东在1930 年秋对即刻兴起和席卷一切的革命高潮抱有齐里亚主义式的期待的观点，仍有余地表达某种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决定性因素所持的信念问题，人们则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分歧性的看法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是与李立三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莫斯科的观点的。[①]

特别是在看待共产国际当局对中回革命是否了解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李立三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外国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革命。1930 年至 1931 年间的冬季，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共产国际的一个审查人员曾援引李立三的话，指出他说过：“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够在实际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由此，李立三被曼努伊斯基指责为一个“极端的地方主义者”。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在 30 年后也同样指出：

>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

[①] 关于李立三对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的某些说法的摘要，参见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书，第 148-149 页。

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毛泽东没有采取与李立三同样的路线。李立三曾经非常明确地宣布，要设法利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东北部的干涉，在此发动一场“世界革命战争”，不论苏联是否愿意，部要把它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②]对于这样一个战略观点，毛泽东是不可能赞成的，因为这一战略仍然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还是由外国来决定，而不是由中国人本身来主宰。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因的巨大势力，也看到了国际因素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毛泽东在1923年初和1926年之间，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某些重要的思想成果。他认为，旧的反动制度的主要基础是在于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在于帝国主义者及其城市联盟的势力，所以，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把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全部动员起夹，打碎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的“封控权力”，才能凑效。

无论毛泽东在 1930 年夏季时的主张是什么，他命令部队于 1930 年 9 月从攻打长沙的战斗中撤退，标志了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即制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这一长期战略。在这种背景下，自从毛泽东于 1927 年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并于 1928 年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后，军事战略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6 页。
[②] 李立三要把苏联卷入一场为了中国革命的战争的计划，自然引起了苏联某些作者的愤怒。例如，见 A·M·格利高里叶夫的著作，第 365-367 页。

思想也发展起来，从而成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一个确定的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说法．那是在 1931 年，等到战胜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才形成了。[①]现在已经知道，最早阐明这些原则的是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里面注明的写作日期是 1934 年。尽管该书中有毛泽东的名字和其画像，但事实上，这本书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人所写的。[②]也许这样说更为恰当，这本书是对毛泽东在后来遵义会议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战略思想首次作了系统的阐述，而遵义会议则标志着毛泽东新的军事路线形成这一决定性阶段的开始，也标志着毛泽东八年后通向党的最高权力之路的开辟。[③]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其所作的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路问题》的系列演讲报告中，详细地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重新陈述了反对他的批评家们的具体理由。最后，在 1938 年，他撰写了两部关于在抗日战争特定环境中游击战争策略的著作，即《抗日游击战争的战赂问题》和《论持久战》。而第三部著作，即《基础战术》，某些版本署的是毛泽东的名字。[5]

我对军事策略这一特殊领域并不擅长。这里，我只从战争与

[①] 详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89 页。

[②] 读者如要看这部著作的部分摘要，参阅陈伯群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载于《解放》（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28 期，第 14-19 页。上述关于该书作者的信息，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鲍世修。

[③] 关于遵义会议。参阅本杰明·扬所写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掌权的一步》，载于《中国季刊》（1986 年 6 月出版）第 106 期，第 235-271 页。同时参阅本罗姆·陈的答复，载于《中国季刊》（1987 年 9 月），第 111 期。

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和论述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概括了他提出的全部问题后写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一相反而相成的原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

毛泽东所概括的这一格言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该章最后剩余部分所解释的那样，就当时整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红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大大劣于国民党和其他的白军力量，因此，在作为每一个分离的局部战场的“手术室”中，我们只有造成压倒敌人的绝对优势，才能进行战斗。而这样一种战术优势，只有通过集结我们自己力量的绝大部分，来反对分散孤立之敌，一个一个地吃掉敌人，才能够得到。反过来讲，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部分地是依赖于指挥员的用兵技能外，更主要地还是依靠准确及时的情报。由于红军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报。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发动农民群众这一方法，不仅使自己得到了有关敌方运动情况的信息，而且还获得了计多其它的有利条件，诸如群众充当弹药给养运输队或配合大部队作战的辅助部队等项自愿服务，这一切，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同的。然而，就毛泽东的精辞而严谨的战术原则而论，它与孙子的战术原则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孙子曾经写道：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09 页。

敌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故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毛泽东在其晚年，则对他本人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所吸取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总的来说，在他的言论中经常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1968 年，他在其所进行的一次最和谐的谈话中，说：他在 1927 年开展斗争以前，曾经阅读过《三国演义》；在 1936 年至 l 938 年期间撰写有关军事战略著作之前，还曾看了一下《孙子》。[②]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撰写他的这些著作时，是非常频繁地从《孙子》和许多其他历史著作，以及诸如《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中，援引他所需要的思想资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它的组织内部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成分，又主要是通过军队这一工具来开展工作的，但却能够把自身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是如何试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认主观因素在决定人的阶级本性中的重要作用，承认通过改造人的思想来改变人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强调主观态度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7 年。在他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最令人注目的成果还是他 1928 年 11 月 28 日写的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

[①] 《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39 页。
[②] 《毛泽东与红卫兵的谈话》（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694 页。

告。[①]当时，为数很少的红军，其很大部分却不是由工人成分，甚至不是由正当的农民成分所组成的，而是由游民无产阶级成分所组成的，客观形势就提出了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并且要求加以回答。毛泽东说：

> 此游民部分，函(还)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争中，游氏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形下，但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②]

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其写给林彪的信中，批评了林彪“过高估计客观力量和过低估计主观力量”。[③]这里，毛泽东所讲的“客观力量”，主要是指那些属于共产党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白军，而“主观力量”则是指其本身能够理解自己的战略，并能激发巨大热情的红军。显然，毛泽东在这里也是从客观历史环境的广义上来谈论客观因素的，而对主观力量，则是从人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对这些客观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意义上来论述的。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从 1927 年以来，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这些成分是在当时军事斗争极为激烈的背景下，通过其本人艰苦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活动，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的。毛泽东把战争看作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高显示，看作是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所收入的《井冈山的斗争》，其注明日期为 1928 年 11 月 25 日。——译注。

[②] 原文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2 月 25 日）参见《毛泽东集》合订本，第 62 页。《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6-37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68-269 页。

[③]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 562 页。《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0 页。

人类精神力量的最高检验。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观点极为欣赏，以致于在 1936 年和 1938 年的有关文章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进行了重复叙述。

>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分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入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
>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

这些段落雄辩地表达了我所称谓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思想，这是他多年来艰苦的生存斗争经验的结晶。当然，仅仅从他的浪漫主义秉性或者他个人的战斗生涯来解释毛泽东对人的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力的信任，这似乎显得过于粗糙和简单化了。事实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对主观力量的强调，也是适应了在一个由许多根本对立的势力所构成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进行革命的要求的。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66 页。参见《中国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66 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98-99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84-285 页。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决定了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的思想和经历中的联系。毛泽东曾经在上面所授引的段落中强调指出，战争的结果很难预先加以确定性的预料，它只是部分地依赖于主观因素，如士兵的勇敢精神、指挥员的战术技能，等等，同样，政治斗争的结局也似乎是很难清楚地加以规定的，在中国比起在西欧甚至原先的沙俄帝国，更是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分别被大致地看作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然而，农民阶级的社会经济比重在前者中要比工人阶级更大，地主阶级的社会经济比重在后者也比资产阶级更大，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况且，这幅社会画面是明显地受当时外国势力的冲击而得到修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波兰问题时以及列宁在论及 20 世纪的殖民地问题时，都建立了自己的原理，认为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由于各个不同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国压迫者，因而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行为也相对得到缓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不只是把这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而且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他就确信建立一个追求共同民族目标的联盟是可以有效地实现的，而且这种联盟的建立，除了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直接联盟者农民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态度。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还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即民族统一是民族自救的前提条件，尽管这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或多或少地达到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程度，但从始到终，这绝不意味着毛泽

东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他决定并实行同蒋介石建立一种新的联盟时，他也极其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丝毫也没有放弃其最高纲领的意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社会革命问题成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主要焦点，尽管他相信通过提高人的觉悟也可以使客观的社会现实得到改造，但他并没有仅仅从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他仍然把参加革命活动作为提高人的觉悟的最有效的途径。确实，一个对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敏锐认识，一个对主观和客观辩证法的巧妙运用，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构成了他的政治成功的奥秘之一。

关于社会革命是推动文化革命的工具的观点，毛泽东早在 1927 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了。毛泽东在该报告中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①]

在此后的整个 20 年中，农村始终是毛泽东进行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试验场。当然，毛泽东在这个领域活动的重点是土地改革。至于对待各种社会成员种类，特别是对待富农所采取的路线变化的详细情况，此处不再赘述（作为这一问题的简要总结，参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第 191—193 页）。

1933 年至 1934 年间所开展的"查田运动"，构成了这一历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3 页。《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37-238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59 页。

史阶段的一个重要插曲，它提供了一个毛泽东对通过革命斗争改变人们思想的方法所表现出的信任的尤为突出的例证。毛泽东也许没有亲自发动这场运动，但在 1933 年，他确实为这场运动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场运动公开表示的经济目标是检查业已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否完全确当，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为追求基本的政治目标提供了一个框架。毛泽东确信，由于地主和富农拥有世袭的势力和名望，具备识字善言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财产结构在形式上造成了怎样的变化，那些先前享有特权的分子总会成功地通过各种方式慢慢地在农民协会中窃取到权力地位。防止这类隐蔽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复辟旧秩序的事情发生的唯一办法，是把基层组织的农民发动起来，鼓动贫苦农民同先前的剥削者展开斗争，以便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巩固他们的今后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

这场运动也提供了许多与后来在 1946 年到 1948 年间，以及 1950 年以后搞土地改革的方法相类似的东西。例如，召开全体群众大会，鼓励农民在大会上“诉苦”，以控告地主以往对他们的压迫，在某些场合，接着便处决恶贯满盈的罪犯，等等。这些做法，不仅是欲图挫败那些贵族绅士的锐气，而首要的还是为了使农民摆脱他们的自卑情结，从而最终作为一个人而站起来。于是，毛泽东致力于开展改变人们对权威的态度的文化革命，并把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来加以使用。尽管数年后他运用这些手段的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自始至终在他的路线中都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当时战略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军事斗争和政治职责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和朱德为了得到人民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在开始几年里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诱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加以歼灭。因为在这些地方，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群众对红军的慰问极为热烈。然而，实行这一战术又意味着，那些真心支持共产党力量的群众要不断遭受严重的危险和作战的伤亡，这无形中又损害了要在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信誉，因为这个国家不能保护它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前沿进攻战略”是这种困境的一种对策，然而，这一对策的实质是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威望和其领土完整的政治职责放在首位，而置对军事上的符合实际的可行性的估量于不顾。1934 年，这一战略以惨遭失败而告终，但这也并不表明，那时采用毛泽东的最初几年的战术就一定能挽回局面。无论如何，当时只是由于日本人日益加速地进逼中国，严重地威胁到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生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有效地摆脱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况且，正是在 1935 年至 1937 年间所造成的这种新的环境中，毛泽东在几年内无心从事理论著述的情况结束以后，才再次用他那充满信心的语调开始发表言论。无疑，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在于这样的事实，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纠正了 1933 年至 1934 年间被排挤为一个无实权的挂名领导的情况，他自然有许多新的

见解需要阐述。同时，也在于这样的事实，当时民族解放战争问题更加突出，他对这一问题有许多重要思想需要公布发表。即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毛泽东对革命的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相互关系的论述也是具有预见性的。

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方面的老对手，再次结成抗日联盟，这一变化是在极不符合两党的本来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毛泽东对他自己所提出的建立第二次抗日统一战线所作的理论证明是什么呢？

1931 年 9 月，日本驻中国沈阳的军队的活动，第一次把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主张，同共产国际的主张基本是相似的，可以用“阶级对立”这一口号来加以概括。尽管这一见解在原则上包含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意味，但毛泽东对具体进行斗争的社会学观念仍然保留了他在 1926 年所持有的立场。1931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签发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在号召白军士兵首先把他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的鸟政府”的同时，还继续指出：

>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

①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所在地。在该文中，如同毛泽东的 20 年代的文章那样，仍然把“国民党军阀”指斥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地主阶级的奴才”，揭露他们在“剥削民众与屠杀民众”方面，却表现了“很大的坚决与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把他的抨击矛头集中在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他的主张仍然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镜像。②因为，他认为，“只有红军”才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保护工农兵士的利益”，为了使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动成为可能，首先对付国内的敌人是必要的。

1932 年 4 月，在日本侵略者于当年 1 月攻占上海之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由此便产生了接近于它的政治战略核心的外交问题。毛泽东的关于同其它政治力量合作思想的转变，是以 1933 年 1 月 17 日《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作为信号的。该《宣言》提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以反对日本）下，中国工农红军将同“任何武装部队”，即将同任何因政见不同原准备对付共产党的指挥官，签订作战协议。③尽管这一主张仍然保留在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所制定的“同下层建立统一战线”

①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4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19 页。

② 据《英汉辞海》解释，“镜像”是其各部分的排列与另一个作为模型的基本相似的东西的排列正相反；相对一根与之交错的轴或一个与之交错的平面为颠倒的东西。本书此处意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要先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和红军，而毛泽东所主张的相对应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要首先消灭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译注。

③ 见《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83-185 页。

的方案中，这也就是说，只同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建立联盟，而不同它的领导者建立联盟。但是，这样处理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关系（尽管不是处理同蒋介石本人的关系）的意愿，毕竟标志着向 1937 年所采取的“同上层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34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呼吁同那些愿意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们联合起来，为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而奋斗。[①]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政治力量，给它以很高的地位，然而在关于 1935 年 8 月 1 日的宣言所要求同第二种统一战线（即同上层建立的统一战线）保持完全一致的问题上，毛泽东明显地比苏联领导人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在事实上，号召建立这种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是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的。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来说，他们早已把蒋介石看作革命的叛徒和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现在要再次拥戴蒋介石，他们比斯大林对这事更加感到厌恶。到 1935 年末，当毛泽东的部队于 12 月聚集于瓦窑堡时，毛泽东已准备不仅要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合，而且要同资产阶级中与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因而“可

[①] 见《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363-367 页。也见《六大以来》（上），第 659-661 页。

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进行联合。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作为“国家卖国贼营垒的头子”，以及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的代表，他是专门被排除在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之外的。[①]

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间就已经同“卖国贼”建立了间接的联系。1936 年 4 月，张学良同周恩来会晤，敦促共产党人停止同蒋介石作战，以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并且答应用他的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劝告他接受这种停战建议。1936 年 6 月 5 日，共产党便随之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毛泽东后来说，他在 5 月 5 日发出的通电，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就正式地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进行通信联系，磋商合作抗日的可能性问题[③]，特别是他在 1936 年 l0 月 5 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达成“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愿望。1936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和其他 18 位共产党的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共同签名，给蒋介石本人发去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蒋介石的希望，即希望他能及时改过自新，使子孙后代记住他不是“亡中国者”，而是“救国救民之豪杰。”[④]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这些姿态，都是出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需要，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0、142 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33 页。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 1935 年和 1936 年的秘密协定，以及毛泽东持续不断地不愿意同蒋介石妥协，参见约翰·加弗的文章：《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来源：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载于《中国季刊》（1988 年 3 月）第 113 期。
[③]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 月版，第 36-97 页。
[④] 毛泽东：《致张学良》（1936 年 10 月 5 日）、《致蒋介石》（1936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78-79、87-90 页。

并不是表明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12 月 12 日，当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监禁起来以后，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中间，引起了本能的反响，当时，也许把转介石推向法庭，公审他的反革命罪行，更能顺乎人心。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和其他最高层的领导人曾严肃地思考过这样的对策。相反，1936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向他保证我们“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据说，毛泽东收到来自莫斯科的一封命令他不许杀掉蒋介石的语气十分武断的电报时，他勃然大怒，这倒不是由于他的阶下囚被斯大林夺走而失意，而是针对斯大林对他的忠诚和常识的怀疑。[②]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一旦他们着手建立同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就表现出一种要把他们的全部心身投入到该项事业中去的巨大热情。原因很明显，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将社会革命暂时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且相应地采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政策，虽然同列宁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但它还有着更加特殊的地位，即拯救中华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灵活的策略问题，而它本身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无论是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他的战友，只有按照中国革命目前所达到的阶段，以及中国革命那时相应地所要完成的任务，并对这种转折的重要性加以理论证明，才能发出实现这种转

[①] 毛泽东：《致阎锡山》（1936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5-97 页。
[②] 关于事件的细节和进一步的介绍，参见莱曼·冯·斯莱克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第 12 章。上面的阐述分别以 1982 年 9 月 10 日和 23 日同胡华和李新在北京的两次谈话作为基础的。

折的号召。于是，毛泽东在我刚才所提到的 1935 年 12 月 27 日的报告中，开始就这一主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只是到了 1939 年和 1940 年间，他的这些思想才得到详尽的阐述和确定性的解释。在延安时期，他的思想则明显地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表现为一种成熟和完满的理论形态。然而，在我们继续探讨毛泽东的这些政治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他在 1937 年间萌发的即将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占居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进行某些叙述。

注　　释

[1]读者如要阅读毛泽东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信的原文，请参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策 11—14 页。有人假定这些信为毛泽东所写。我的论文《关于毛泽东的 1927 年的“偏向”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964 年 4—6 月，第 27 期，第 55——66 页），发表了这两封信的摘要的译文，并附有对这两封信含义的分析。

[2]齐里亚主义（Chiliasm）又称千僖年主义（Millenarianism），是一种基督教神学教义。根据《新约圣经·启示录》所记，认为基督符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立起一个神权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它的意思经常被引伸来表示，对于即将到来的理想社会的信仰，并通过革命行动创造的未来的太平盛世的思想。该词在本书中表达的正是这种引义。——译注。

[3]苏联最近的出版物已经把这些问题澄清了，这些出版物虽然在解释方面具有严重的偏见，但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许多细节却可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的细节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档案。也许这些出版物中，最容易获得的是，A·N·格利高里叶夫所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的论文，载于乌里扬诺夫斯基所编辑的书中，第 345—388 页。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出版物发表的那项指示的正确日期是 1930 年 6 月，没有任何借口要继续说这项指示是“7 月 23 日的指示”。

[4]具有权威性的党内刊物《党史研究》，所发表的数篇文章，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参见林蕴晖：《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第 51—59 页）；田园：《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65—71 页）；凌宇：《毛泽东同志

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78—80 页)。1930 年 10 月 7 日的决议引自一篇翟秋白在上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实话》(上海）第 2 期（1930 年 12 月 9 日出版)，第 3—4 页上。毛泽东 10 月 19 日的信，参见《给湘东特委信》，载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157—158 页。

[5]该书有些版本在书名页上有毛泽东的名字,而另一些版本则没有,因此，作者是谁还有疑问。尽管该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编的《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献目录》(北京)，1961 年 2 月，第 28 页。）出版的一部毛泽东著作的书目中出现过，但有许多证据表明，该书不是毛泽东写的。我在我翻译的该书英文本序言中，曾经简略地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战术形成的各个阶段。

第三章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1937——1940 年）

毛泽东在其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著述中偶而触及哲学问题，直到 1936—1937 年冬他才第一次着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埃迪加·斯诺曾经记述道，毛泽东如何中断了与他的会见（这为毛泽东的自传提供了依据），以便消化一大批则运抵共产党的首都——保安的中译本的苏联哲学著作。毛泽东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立即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列演讲。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著称的著作就是当初系列演讲的结论部分。[1]

诚然，《实践论》和《矛盾论》只是在 l949 年以后才在中国正式出版，《实践论》出版于 1950 年，《矛盾论》出版于 1952 年。然而，毛泽东在 1937 年曾经发表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列演讲，这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2]因此，当 1965 年埃迪加·斯诺问及此事时，毛泽东否认他是《辩证唯物论》一书的作者，[3]这就耐人寻味了。的确，毛泽东一般宁愿人们阅读他的仅仅经过修订和经他本人同意的著作，但却不必公开否认他认为不再适宜的那些文章。

毛泽东对此敏感是事出有因。自列宁时代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经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之一。无疑，毛泽东当初发表演讲，其目的就是为了

确立自己在这方面的地位（在他之前斯大林已努力为之）。在以后的五、六年间，毛泽东不停地与党内的对手进行较量，这些对手全是来自莫斯科的学院派，因而他感到自己最容易遭到的指责就是，说他不过是一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完全不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对付抽象的范畴。但是，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列演讲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它们（尤其在最初的几部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抄苏联的资料，在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是相当粗糙。[4]这一点不久就显而易见。

在这里，我不打算分析毛泽东的整个演讲，而只关注确实构成毛泽东的思想内在组成部分的“两论”。1936—1937 年间，在毛泽东所接触到的苏联著作译本以及其他著述中，经常被详细论述的就是认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差不多从头至尾都在讲认识论（象《实践论》那样）。同时，毛泽东也把矛盾课题置于显著的地位，这在他接触到的各种材料中极为罕见。这类材料中的绝大部分都有一节论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及相关论题，但一般说来篇幅较短，且绝不象在毛泽东的演讲中那样被放置于最后，从而使之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无疑，毛泽东把矛盾问题置于显著地位，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我们在理解本书已作了概述的毛泽东的思想时，有两个方面必然要涉及到。一方面，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受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家学说及其他倾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

我一直所强调的那样，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换言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并力图把这些见识溶进他的革命策略中去。有人也许把第一方面看成是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的短处，而把第二方面看成是其长处。

那种认为毛泽东重视矛盾的某种看法，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他的演讲笔记涉及矛盾论题的部分几近一半，约为 25000 字，相比之下，选集文本约为 22000 字。阿瑟·科恩和其他人曾经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认为毛泽东在 1937 年根本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尽管这两个文本有重大的差异，但是，相似之处之多，足以证明科恩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然而，毛泽东在 50 年代初也确实感到要赋予《矛盾论》原稿以令人满意的形式，是一件棘手的事。他在 1951 年 3 月 8 日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信中提到，他再次对《矛盾论》作了改动，然而最后部分仍需要进一步加工，因此这部分就不拟收入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5] 演讲笔记中的《矛盾论》部分为什么比前几部分好得多呢？我认为，答案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不仅要论述那些引起他关注的思想观点，而且要设法把它们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环境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章大部分只是概述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古希腊和西方哲学史。在这里，毛泽东只能复述他的原始资料，根本不能加上他自己的东西。[6]

人们通常认为，苏联刊物（曾在 1950 年称赞《实践论》）不理会《矛盾论》，是由于它暗含着对斯大林的首要理论地位的挑

战。这的确是一个因素，勿庸置疑。但是，苏联人发现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很奇特，很怪异，这是完全可能的。在 50 年代，毛泽东在许多场合报怨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专门批评他的矛盾观点。有一次，他在谈到该书第四版（1953 年莫斯科出版）时说，这部书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①]苏联人所持的不满意的理由是，生转化为死是“形而上学”，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

1964 年，毛泽东抛弃了马克思、思格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原理中的两个，其中包括否定之否定原理。这件事可能与他晚年的辩证法的反传统特征有关。1937 年，他的世界观更多地是舶来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大休上是更加正统。然而，他已经朝他以后 25 年所遵循的方向倾斜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②]这句话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似乎把对立统一原则置于比其他两个为毛泽东后来抛弃的原则（否定之否定和量转化为质）更高的范畴之中。[7]

毛泽东的演讲笔记的原稿曾经间接地提到，列宁把对立统一视为“辩证法的核心”，1957 年，毛泽东明确地引用了相关语句：“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③]然而，列宁的这一论述出现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读书笔记中，而概括黑格尔思想的那一整段同时提到了否定之否定和量转化为质原理

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远离有关《矛盾论》的主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10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8 页。

的政治牵涉，转而思索严肃的哲学问题。同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及从中引出的理论思考，是我们关注的中心，这样易于我们从其哲学思想过渡到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即使是科恩也加接受的一种常见之说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所作出的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我首先要指出，毛泽东使用这些范畴可能直接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有关。马克思本人所考察的社会形态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极化不断扩大的社会，对于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来说，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是清清楚楚的。一般说来，直到这种冲突被革命解决，这个模式或多或少是保持不变的。另一方面，在中国，无论是国内情况还是与外国各种势力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或者变幻莫测的，要在既定阶段确定哪些因素或矛盾是决定性的、居支配地位的，这不只是一个智力谋划问题，而且是一个紧迫的策略需要问题。

中国最早翻译的苏联于 1933 年出版的哲学著作，用部分篇幅论述了矛盾的“主导”方面，但指出主导方面一般总是不变的。例如，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由此，科恩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发现了最有意义的东西，他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以下一段论述：

有人觉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其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8]

科恩之所以重视这段论述，目的是要以此为根据，说明毛泽东在 1937 年没有写作《矛盾论》。他说，除非斯大林对毛泽东已有某种表示，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是直接从研究列宁思想中引伸出来的（这个术语毕竟首先是针对列宁而被使用的），也是从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引伸出来的。《矛盾论》的原稿确确实实是更加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改动是，用“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表述代替了“有时候”的表述。在选集中使用“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表述，意指必要的前提条件将只是在限定的阶段——危机时刻或革命时刻——才出现。而在原稿中使用“有时候”的表述，可以是更不确定的，暗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在一个重要阶段上延续。这一点在紧接上述引文的另一语句中看得更为清楚：

“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一原理适用于无产阶级策划、组织和实施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它很可能被这样理解：虽然一般来说，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不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上层建筑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那些“时候”事实上会在中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出现。

关于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点涉及到他受益于斯大林的情况。《矛盾论》的现行文本有一段冗长的话，认为斯大林对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分桥，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模范”。[②]这段话在《矛盾论》原稿中是完全没有的，在相应的地方，毛泽东通过解释苏东坡的一句话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据说，苏东坡深知普通性与相对性的关系。[9]

《辩证唯物沦》的第二章有这样一段陈述：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③]因此，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④]这一说法显然是毛泽东在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受到震慑时的一时感受。它完全被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⑤]这一号召代替了。即使在1937年，这一说法也不代表一种一贯性的主张。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133页。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
[⑤] 《毛泽东选集》1948年晋冀鲁豫版，第511页。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考察毛泽东在 30 年代后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那么一个基本的论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参谋”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绝对清楚的。1936 年，埃迪加·斯诺曾问毛泽东，如果共产党获胜，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会不会出现“某种实际上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对此作了简略答复，宣称：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决不是要让莫斯科来接管，并详细地说明了其理由：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政党，它在胜利的时候将代表全民族说话，而不可能代表俄国人民说话，或者替第三国际进行统治，而只能按照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只有在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俄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地方，才能说到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象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共同利益的基础就会极大地扩大。[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1936 年就意识到了把世界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的牢固纽带，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对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服从。某些事情是平等的，“解放了的中国”——即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较之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但是，假如事情是不平等的——假如莫斯科不尊重在毛泽东看来是正当的中国利益——那么中国的政策在

[①] 埃迪加·斯诺手稿，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

毛泽东的指导下就可能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与莫斯科的交往中，其内部在 30 年代就有一些人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象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准备采取比毛泽东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样。从 1935 年到 1945 年，毛泽东与党内的所谓“国际主义者”派（即亲苏派）展开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已在别处被谈到（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十二章）。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权力关系或其变化不定的派别，而是毛泽东为自己摆脱苏俄的监护作辩护所凭借的理论的性质及意义。在毛泽东于 30 年代后期所提出的各种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最无畏和最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信念，表达了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必要性。

实际上，这个口号被中国共产党使用只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它最初由毛泽东在 1938 年提出，到 1945 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之际被受到极大的推崇。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的最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①]的理论。虽然“中国化”这一术语本身的使用比较短暂，但是它所表达的实际情况早在 1938 年以前就存在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它的重要意义不仅没变，而且日益突出了。

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面对共产国际盛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334 页。

气凌人、专横跋扈的态度，“中国化”概念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在于它在民族危机关头是一个诉诸非共产主义观点的口号。但是，“中国化”概念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真实信念，即来自西方的思想观点归根到底只有适应了中国人的心智和环境后，才会对中国发生作用。

在 1938 年，对毛泽东来说，“中国化”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非欧洲的国家，号召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1945 年提出的），[①]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方面地切合民族的实际，包括从语言、文化到庞大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被“中国化”的将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要素。

这个问题涉及不同的范围，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所作的有关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中已经部分地谈到了：

>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只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

[①] 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第 260 页。

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极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涉及毛泽东的“中国化”概念中层浅显且争议最少的一个方面。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对一个非欧洲国家发生影响，那就必须用该国人民易于理解的、并是按照他们的心智和传统是有意义的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而不能用从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种文化直译过来的怪癖难懂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形式，虽然在毛泽东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却只是一项更为根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其目的还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环境。

为了阐明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毛泽东关于“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的含义。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其他著述，或许能揭示这一命

[①] 《毛泽东选集》1948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511 页。

题所暗含的一些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是由马克思阐明的，马克思著作的某些内容，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分析，阶级斗争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普通有效的，但是，这个理论作为整体，既反映了19 世纪的思想来源，又反映了马克思特有的欧洲人的心智和经验。因此，当我们（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任何其他人一样）谈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的环境中时，这些理论的永恒的精神实质正是我们所应当掌握的，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

永恒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毛泽东本人在1938 年10 月的报告中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在 1942 年 2 月，毛泽东号召党内的同志“应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作出理论性的创造”。[②]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提出了两个问题：他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究竟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态度或原则同毛泽东所讲的从吸收中国历史的珍贵遗产中形成的“方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通行的解释是，毛泽东所讲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然而，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78 页。

如果毛泽东确实是象这类一般解释那样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那不就由此推论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象 20 世纪初列宁的批评者把列宁的思想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吗？换言之，毛泽东所谓“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间内都无条件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他说这种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时，他的意思是说，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只是对他所揭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具体表述，未必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同样原则的具体运用更高明。无论如何，理论只有在其具体表现形式中才有意义，并且获得其现实性。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问题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他还提出要用中国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所涉及到的“中国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不只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共有的经济特征，也包含许多“珍贵品”。毛泽东在 1938 年指出，这类“珍贵品”是“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之展示，它既是历史经验的产物，又是中国人的天赋的体现。[①]

今日之中国带有其历史印迹的观点并不耸人听闻。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列宁主义信徒始终认为，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形式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可变量，虽然它们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并作为这种变动导致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变化的。但是在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1948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511 页。

东看来，文化的现实基本上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呢？还是他所强调的“民族特征”对他而言构成一个独立的或部分独立的可变量呢？依我之见，对毛泽东来说，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部分自主的领域，这是不成问题的。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看法中，文化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他在 1938 年 l0 月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了继承中国的遗产本身“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先于这句话的另一句话则指出了要对过去“给以批判的总结”。[①]这里，前后两句话的涵义迥然不同。在前句话中，能动的指导作用似乎归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借以从中国的历史遗产中去粗取精。在后句话中，更深刻地了解过去不只是扩大革命者对自己社会的认识，实际上提供了指导革命的一种工具。这样的见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在直至 l938 年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绝无仅有。对于“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这句话，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是半信半疑，因为他在为选集出版修订这篇文稿时亲自删掉了它。[10]

毛泽东声称可以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吸取的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性质？在形成这种方法时应从历史中吸取什么东西？毛泽东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著述中却有暗示：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可以不严格地规定为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 页。

治国之才的艺术。[①]于是，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的报告中，在首次提出“中国化”观念的同时，也论及合理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的说法就是“用人行政”。在下面一段话里，他接着讨论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

>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相互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善怒为爱憎，阿谀奉承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②]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他的心目中有一个政治品行的标准，它虽然最初是从前资本主义的官场中提出来的，目前仍然适用共产主义革命者。

更令人吃惊的是，毛泽东也从儒家哲学中发现了积极的因素。毛泽东在 1939 年曾对陈伯达的一篇关于儒家哲学的文章作了评论，他基本上同意陈的观点，但指出，陈伯达在把儒家的“正名”学说当作唯心主义批判时没能说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一学说包含了重要的真理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他还认为，朱熹对儒家中庸理论的解释类似于共产主义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既反左倾又反右倾的原则。他说，“不及”的即是“右”

[①] 关于这个传统，参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45 页—1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48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504 页。

的东西，“过”的即是“左”的东西。[①]

诚然，这类诉诸民族历史是特别顺应时势的，当时，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是使自己的言论适合于尽可能广泛的各种意见，以便促成新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也必须把它们当作毛泽东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达，认真地加以对待。在具体地分析毛泽东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的观点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索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史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有助于把握现阶段中国革命并制定相应策略的，正是这一背景。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作过总体性的考察，最系统的阐述见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严格地说，本章不是毛泽东本人起草的，他只写了该书的第二章，但毛泽东决定把它收入其选集，因而就对该章的内容负责）本书限于篇幅不作广泛深入地讨论，但有几点应特别指出来。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认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开始于周朝初年或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相关的论述如下：

>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
>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0 页。

据的状态。[①]

这样，秦朝的出现仅仅被看作是国家形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变化。[11]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一概念在西方读者看来也许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但它却是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经过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争论所达到的认识；这些争论是围绕传统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的，目的是同时确定中国社会的“封建”特征及其独特性。与此同时，在本文 1939 年的原版中依然保留着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看法的痕迹，这种看法原则上已被否定了。这样，毛泽东就断言，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在许多世纪中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西方的撞击下才被推动起来。[12]

毛泽东观察中国历史的另外两个视点值得特别强调。早在 1919 年毛泽东就无所畏惧地疾呼：“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②]20 年以后，对同胞们具有非凡能力的同样信念在下述语句中得到表达：“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中国也诞生了许多革命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③]

其次，毛泽东自 1926 年以来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农民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数百次农民起义，不仅是每次改朝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7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87 年版）第 63—6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6 页。

换代的决定性原因，而且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它们才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但是，毛泽东同时指出，就农民推进生产力发展或变革生产关系的能力而言，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这类行动是有局限的。他写道：“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13]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得以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何时出现，以何种方式出现。按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延续到 19 世纪的“封建”的生产关系部分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在西方的撞击下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壮大而不断受到削弱，在这个阶段上，地主阶级由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已经是对现存秩序进行革命性挑战的当然领导者。接着，进入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革命领导权的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8 页。

已经成熟了。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阶段性转变大致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把资产阶级领导的时期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时期分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规定的时代是重要的，而且与中国日后的问题始终有联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想要成为一种马列主义的分析范畴，因而简要回顾这个理论的背景就是必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理所当然地由资产阶级统治，正如封建主义阶段过去由贵族统治一样。同样地，构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决定性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将支持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同时力争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直接要求，推进民主革命，直到时机来临时再发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思格斯关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在成为西方殖民地的社会中进行革命的著述颇有启发性，但同时又显得零碎和自相矛盾。想要从中引出一条可以指导亚洲革命的明确的策略路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无论作出何种尝试）。在 1905 年革命发生时，先是托洛茨基，然后是列宁，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在这类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自此

以后，按照苏联人及其信徒的解释，这一随后由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进一步给予阐发的观点，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

这样，既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质就与该阶段的主要角色的阶级特性无关了。七十五年来一直有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它的早期形式还是它的后来变体都可以支配一场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起着相似作用的“资产阶级”革命。

现在回过头来考察毛泽东有关这一阶段的观点的性质及意义。他把这一阶段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的兴趣不只是注意他怎样规定这一阶段的内容，也注意他在什么时候假设这一阶段已经开始。因为毛泽东正是以此为背景从形成力量平衡的角度论证了同国民党人的新联盟以及当时的革命目标。

在一些地方，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间精确地规定在 1919 年，而为了方便起见，从延安时代起，“现代的”与“近代的”中国历史之分界线就以五四运动为界。但是，毛泽东自然懂得，这类决定性变化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生，因而他大体上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更不确定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段时期（即人们通常广泛定义的五四时期）。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

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

这里为论证中国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而提出的理由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之衰落与失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新模式——苏维埃之出现；得到苏维埃物质和道义授助之可能性。部分因为这最后一个理由，毛泽东依照斯大林（而斯大林本人又依照列宁）宣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个主题，他写道：

>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②]
>
>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③]

这一论段提到的“联合专政”和“参加领导”（毛泽东在 1952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2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2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1948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620 页。

年把它删掉了）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执政的各方中可以不享有优先权。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稿中，毛泽东甚至明确指出：如果中国资产阶级表明自己能够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那么他们（国民党）就会取得人民的信任。[①]当然，显而易见，这只是对蒋介石的一种姿态，毛泽东一心想使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领导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毛泽东直接向党员而不是非党知识分子发表的演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则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讲的），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②]1949 年 6 月，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胜利，原因就在此”。[③]

总之，毛泽东从 1939 年最初开始使用“新民主主义”术语起，就以程度不同的直率语气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大约在 1919 年以后革命的领导权就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无产阶级了。对于一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才起步的阶级，对于一个直到 1923 年——1927 年与民族主义者联盟时还只有少数党员的政党，毛泽东怎么宣称它具有如此地位呢？除了上面已提及的事实，即共产党人得到苏联的外部援助和同情外，毛泽东作了如下论证：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

[①] 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第 25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0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9 页。

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这是一个巧妙的论证，且不无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对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自1917年至1921年以后就拥有领导权的论断，仍然应作如下理解，即它不是一个关于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实力的事实陈述，而是一种断言，认为从这时开始，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革命领导权而进行的奋斗是完全现实的和正当的。

如果这确实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信念，即使他并不总是公开明言，那末，谈论“统一战线”是不是没有意义或言不由衷呢？或者换言之，这种联盟是不是不必具有“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特征，即企图动员国民党下层反对其领导层呢？未必如此。按照毛泽东的分期理论来理解，在 30 年代后期，共产党人维护其领导权的努力始终是合法的。因为合法的东西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在政治上并不“正确”，并不方便。如果来自日本的外部威胁危及中国的主权，因而在国内造成政治变动的可能性，以致于抵抗日本的斗争代替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而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策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90 页。

略目标；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更加强大，而且愿意抗击日本；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居优先地位也许是正当的。

毛泽东到1935年12月才认识到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之必要，而到 1936 年末他已承认蒋介石是这个联盟的名义上的领导者。1938 年 10 月，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方面走得最远，他不仅承认它在抗日战争阶段中的地位，而且承认它在继抗战之后的民族重建阶段中的地位。毛泽东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的一段论述中宣称：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①]
>
>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这一报告表达了毛泽东有史以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所采取的最温和路线，尽管如此，它绝不是象初看上去那样是张空头支

[①] 影印件《解放》第三集第五十七期第 16 页。
[②] 影印件《解放》第三集第五十七期第 17 页。

票。上述引文最后一句所讲的“大前提”本身就严格限制了毛泽东对蒋介石作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识到，转介石和国民党按其本性最终不可能坚定地坚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鉴于此，毛泽东预见到他承认蒋介石领导的时机必将会过去。此外，尽管 1938 年该报告的原件没有象选集中改写部分那样提到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它确实提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的问题”。[①]这些责任被毛泽东简要地归结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②]很显然，如果国民党在领导抗战中摇摆不定，它的地位就将被已经起着“先锋的模范的作用”的那些人取而代之。

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提议，两党应当重新合作，共产党员应当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项提议有双重意义，但模糊不清。虽然毛泽东预先将向蒋介石提交一份具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全体名单，以满足蒋介石曾在 1926 年 5 月进行“改组”时所定条件，但是，毛泽东也力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民族联盟”。该提议的第二个目标如此明显，丝毫没有弱化列宁主义的暗中控制策略。暗中控制策略曾使共产党在 1926—1927 年间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归于无效。因此，蒋介石把毛泽东的这项提议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计谋”而拒不接受也就不足为怪了。[③]

仅仅相隔一年多，毛泽东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从承认国民

[①] 影印件《解放》第三集第五十七期第 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87 页。
[③] 关于毛泽东的提议的内容，看《毛泽东选集》第 6 卷第 228—229 页。

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优先地位转变到断言共产党的领导是既成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中，对于直言不讳地要求承认其领导权尚有所掩饰，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1939 年 12 月）则是一目了然。[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为党员听众而写，但却是公开发行的。在为党内期刊《共产党员》而写的发刊词中（1939 年 l0 月），毛泽东甚至不必提及谁应当行使领导权的问题，在他看来，领导权属于共产党是无可非议的，进一步要讨论的只是共产党应当如何行使领导权的问题。

除了领导权的问题外，还有两个直接有关的观点值得在此讨论：毛泽东关于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将体现各种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社会组织的性质的观点。

实质上，毛泽东关于抗战期间支持革命的各种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单且一贯的。在他看来，这种力量由 20 年代斯大林所讲的“四个阶级的集团”所组成，包括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所依附的外国势力与日本也有利害冲突。可以理解，包括各种可能的同盟者的阵线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最为严紧，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最为松散。在前一篇中，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有时也会“动摇变节”。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使在

[①] 《毛泽东集》第七卷第 129 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30—231 页。

参加统一战线、反对敌人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打算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14]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稿展示了一个异例：它只讲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提四个阶级的集团。这种差异不是实质性的差异而是形式上的差异，但却利害攸关。讲三个阶级的联盟是由于把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揉在一起，划归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而不把农民算作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样，在毛泽东的原稿中就见到如此陈述：在 1927 年——1936 年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就只剩下两个：“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15]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又来了一次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①]

很显然，把农民整个地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用意在于淡化对中国革命之独特性的强调，尤其淡化对中国革命之最初特征——农村游击战的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使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成为其分析的主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

[①] 《毛泽东选集》1948 晋冀鲁豫版本，第 647 页。

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①]

最后结论为什么可以从毛泽东所依据的事实中推导出来，这一点不是完全清楚的，但它本身显然是有充分根据的。毛泽东续续写道："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②]这里引证斯大林的话是断章取义的典型例子；1926年 12 月斯大林讲这句话时所谓"武装的革命"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在忠实于这一事业时仍然得到充分的信任。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一再强调："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联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③]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概括成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前面，我曾以一定篇幅谈到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策略中的地位。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的实质性论断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6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6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68 页。

对于联合应采取的确定形式，毛泽东没作论述，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他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两篇论著中规定了联合的形式应当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初中国共产党》令，他也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实行革命民主专政”。[①]“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脱胎于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最初在 1905 年革命时期被提出，而后就被经常重申。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比起列宁的专政者来为数更多，对于这种差异毛泽东是用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环境加以解释的。

毛泽东的“法宝”之三，是党的建设，其含义远比初看上去要广泛得多，重要得多。它意味着，详细阐明正确的学说，并在该学说基础上统一和整顿全党。选集中稍有改动的一段论述指出，过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成功地使党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是因为党员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

这显然意味着，党员们还没有从毛泽东在这些我们正在讨论的著作中系统阐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受益。换句话说，毛泽东在 1939 年 10 月号召“党的建设”，其意图就是，采用大整顿的形式明确地确立他的思想在党内的统治地位。1942 年——1943 年的整风运动目的就在于此。

注释

[1]“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辩证唯物论——演讲笔记）载《抗战大学》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10 页。

第六期至第八期（1938 年 4 月至 6 月）。原文的这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其余部分是否在《抗战大学》连载不得而知。文革期间发行的文本（《毛主席万岁》）包括第二章的七节到十节。除了第二章的十一节（即实践论部分）外，整个前两章在《毛泽东集》（东京版本）第六卷中再版，见第 265 页——第 305 页。包括实践论原稿的两个版本已经面世，其中一个版本也包括了第三章的矛盾论原稿。完整的原文见于《毛泽东集》补充卷第五册第 187 页——第 280 页。有关各选段的翻译和矛盾论原稿的内容与形式的详细分析，看尼克·奈特的文章：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载《中国季刊》第 84 期。奈特先生还出版了一个完整的译本：《毛泽东的“矛盾论”》载《解放前文本译注集》。

[2]提到三点就足够充分了，其中每一点本身都是充分的。第一点已经提到，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原稿当时就在《抗战大学》上发表了。第二点是，张如心，延安时期最积极地推崇毛泽东为理论家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在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18 日版和 19 日版）上撰文，介绍这部著作，认为它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重要来源。最后一点是，这部著作的几乎整个原文，按主题划分成片断，在一本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编纂：《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中再版，见第 11—14 页，第 19—21 页，第 49—51 页，第 53—55 页，第 64—69 页，第 97—99 页及其他各处。

[3]斯诺有关这次会见的陈述最初在《新共和》中发表时，这个否认声明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小心翼翼地避开断然地说他从未发表过这样的演讲，以后作为《漫长的革命》一书的附录再版时，有所“改进”，使之变成一个断然的否定。斯诺的说明（《漫长的革命》第 194—195 页）暗示，这也许是应中国权威人士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作出的。

[4]关于毛泽东借用他人观点，看我的“毛泽东和永远革命论：1958 年——1959 年”一文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 46 期（1971 年 4 至 6 月）第 223—224 页，也看威特福格尔的文章：“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某些评论”，载《苏联思想研究》第 3—4 期（1963 年）第 251 页——第 277 页。在毛泽东不是一个完人的思想背景下（这在 1981 年才明确提出来，但从 1978 年或 1979 年以来已有暗示），毛泽东在 1937 年确实就辩证唯物主义发表过演讲，并利用了其他作者，尤其是艾思奇的思想资料，这两个事实现在在中国已正式记录在案。看《中国哲学》第 1 期第 1 页——第 44 页中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毛泽东在 1937 年 9 月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所作的广泛批注；毛泽东在 1938 年初致艾思奇的一封有关这部著作中的一个论点的信；一篇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稿与毛泽东选集的文本之间差异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期间光辉的哲学活动”）。毛泽东一定读过的艾思奇的其他文章包括：艾思奇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翻译的米

丁的文章;《新哲学大纲》(图书新华出版社，1936 年)，毛泽东从中直接引用了许多段论述;《大众哲学》，抗战大学的一位读者总是把它同毛泽东的演讲混淆起来(《中国哲学》第 8 期第 187 页)。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更充分的材料，包含在他读过的一本 550 页的中国人和苏联人的论文集中，这本附有他的页边注解的论文集最近在中国出版，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简称哲学批注集。至于该书的内容概要，看石仲泉的书评，载《哲学研究》1987 年第 10 期。

[5]的确，在中国之外可以获得的这部著作的最早文本差不多十年后才出版(详见毛泽东著作目录)。另一方面，1946 年——1947 年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通常没作大的改动。此外，延安时期，苏联学者曾引用过这个译本，他们一定不会因为理论成熟而抬高毛泽东的声望。如果这个译本被改写了，那么按照科恩的看法，苏联专家出于对斯大林 30 年代后期著作的考虑，一定会指出这一点的。有关科恩的论点(现已无效)，看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 14—28 页。1988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代理主任龚育之在同我交谈时，曾把毛泽东 1951 年 3 月 8 日的信读给我听。龚教授也曾撰文，肯定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笔记系毛泽东所作，肯定 1946 年的大连版本只是 1937 年的延安油印本的再版，并未作编纂上的改动。看龚育之《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实践论’三点”一文，第 66—86 页，尤其是第 66—72 页。

[6]这一点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加强：根据这些资料，毛泽东曾在矛盾论的原稿中把形式逻辑当作与辩证法不相容的东西加以否定(看奈特的译文集第 15—17 页)。按照龚育之的看法，毛泽东在 1951 年把这部分删掉，是因为他在阅读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并注意到随之发生的苏联哲学界讨论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7]1982 年 5 月 7 日，我在北京与王若水交谈时，他也注意到这一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泽东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了传统的影响。史蒂夫·金把毛泽东强调对立面的统一理解为一种新的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发展(史蒂夫·金《毛泽东的思想》第 60 页一第 64 页)。系列演讲的 1946 年版本序言指出，有关其他两个规律的部分“省略”了，看《毛泽东集》补卷本第五册第 279 页。还要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认为单纯的差异(例如钢笔、墨水和桌子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构成矛盾的观点，看《中国哲学》第 1 期第 29 页。

[8]《毛泽东选典》(合订本)第 300 页。在这一段中有某些变化，但是除了用“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在我这里实际引用的那些部分中并没有作系统的改动(译文摘自《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99 页，也看尼克·奈特的译文集第 28 页和注释)。哲学批注集中的材料表明，毛泽东在 1936 年和 1937 年 4 月间曾读过在他以前的笔记中所引用过的一本书，并对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段写了 1200 字左右的评论。尽管他批评这本书，毛泽东还是把西洛可夫的

书推荐给干部学习。

[9]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共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10]这个信息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在 1988 年 1 月提供的。雷·怀利已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及意义，其视角稍有不同。他更强调普遍与特殊的相互关系这一哲学问题，更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含义。看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形成-毛泽东、陈伯达及中国理论之探索 1993 年——1945 年》第 55 页，第 88 页——第 95 页及其他各处。

[11]虽然关于这点开展过学术争论，但是直到 1973 年—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热点问题，那时提出的观点完全同毛泽东在 1939 年主张的观点相悖。

[12]1952 年，毛泽东出于民族自豪感，在选集中插入了一个命题，认为即使没有外国的干预，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种种变化已经在起作用。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9 页—第 590 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8 页，在这里和毛选别处，毛泽东用起义的术语来代替他最初使用的"暴动"一词，这个细微差异自然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暴动暗示某种偶发事件，与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农村革命没有直接联系。

[14]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为乐观的看法的一段（第三句）是加进选集中的（《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 570 页），在 1939 年的文本中根本没有。关于斯大林和四个阶级集团，看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第 227—229 页。

[15]《毛泽东选集》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646 页。这种三个阶级的分析在毛泽东 1925 年 11 月对青年中国协会的调查作答复中就有预示(《毛泽东集》补卷本第 2 册第 127 页)。他在答复中宣称，虽然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在中国，单独的阶级是不能推翻内、外反动势力的，因此"民族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左翼来完成。

第四章　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

（1941——1949 年）

我已指出，当毛泽东最初提出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口号时，他主要关心的是探索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途径。在 1941 年至 1943 年，他的这一主题思想在发展中又出现另一个主要方面，那就是它更为直接地与毛泽东同党内对手们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他所阐发的观点明确地被用来为他在这场斗争中的利益服务。

毛泽东思想的其它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核心早在 1937 年就已经以矛盾学说成型了，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从经济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遗产的阐释等别的广泛领域也早在 1949 年以前，即于 40 年代初就已定型。在所有这些领域，意识形态与内部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明显而又直接。

本书当然主要关注观念而非历史事实。但是，下列简明的年代表清楚地说明了某些理论陈述的具体合义。

1941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讲，批评“马列主义学者”只能死记硬背马、恩、列、斯的语录，而谈到他们的祖先，不得不道歉说忘记了。

1941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各级干部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1941 年 7 月 13 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给刘少奇写信，指出两种对立的倾向——轻视理论研究和经院哲学，并要求在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要有某种“中国作风”。刘少奇当日作了答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种困难，并把至今进展迟缓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少数中共党员能够阅读马克思的原著。

1942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学习他在 1929 年 12 月写的《古田会议决议》，直到他们完全精通为止。

1942 年 2 月 1 日和 2 月 8 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整风的两个纲领性演说，在第二个演说中，毛泽东报怨说自己在 1938 年号召“中国化”直今没得到重视。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两次讲话，但是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也未发表。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作了一次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三人组成，毛泽东拥有超过另外两人的表决权。

1943 年 4 月。审干运动迅猛推进——事实上，它由康生控制，是一次残酷肃清党内的意见不同者或反毛泽东分子的运动。

1943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宣称：自 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就没有干

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194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草拟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

1943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称赞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指责“国际路线”是伪装的孟什维主义。

1943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 年 4 月。神圣化——毛泽东的思想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南被写进党章，刘少奇称赞毛泽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

上述史料的选择和排列表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从一开始就是 1942 年—1943 年的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选择的史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画面过于简单化，但我相信它们不会使粗略的轮廓变形。

的确，毛泽东在 1943 年 4 月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的时候，曾带着或真或假的自谦写道：他（即毛泽东——译注）的思想只是马列主义的一种形式，依他之见，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完全成熟，没有形成体系。他甚至说，他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被传播或被提倡（鼓吹）的地步，也许整风期间的学习文件所包含的几条除外[①]。但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从 1943 年以来，

[①] 参见毛泽东 1943 年 4 月 22 日致何凯丰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 页。

尤其从 1945 年以来，毛泽东的思想明显地被推崇为使马列主义适合于中国环境的典型范例，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高度综合的集大成者。[2]

毛泽东在 1932 年—1934 年间曾遭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刁难，为了确立自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他从 1935 年到 1943 年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整风运动中达到目的。那么，毛泽东在延安根据地的这一时期究竟确立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原则是什么？人们不断重申：延安遗产的实质在于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无可非议，但事情不应看得过于片面。

在前面第二部分，我曾探讨过毛泽东在 1943 年 6 月 1 日关于“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并指出这是一个意义含糊的概念，既可以从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去理解，又可以从民众真正地处理他们自身的事务去理解。

普通民众是正确的政策得以形成的思想来源，他们反过来又能够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运用它们。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按照论语“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正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打破的一种儒家偏见。但是，毛泽东在这样做时丝毫不怀疑列宁主义的一个原则，即工人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广而言之，共产党必须为整个社会提供思想上的指导。

毛泽东既坚持来自下层的初步尝试，又坚持来自上层的集中

领导，这就在较大范围内给不同形式的表述和不同程度的强调留下充分的余地。从延安时期以来，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侧重不一，但是，至少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贯认为集中领导归根到底是比民主更加重要的。

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经过十五年的农村军事和政治斗争，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的观点逐渐形成，到 40 年代初，这些经验得到概括和系统化，并被运用到经济工作和游击战术之中。

这一时期的中心口号是“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当时，主要的延安根据地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区中相对狭小的一部分，而经济的技术水平低下使得（供、产、销的严格集中计划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分散经营”的方法特别适宜。但是，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也决不强调责任和努力之持续的、绝对的分散。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在回答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时指出：

>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都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

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目前也已经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①]

在同一文章中毛泽东列举了 1943 年应当采取的几条措施，其中第二条措施就是（在增加资本之后立即）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取得结果，他要求由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制定一个“统一的计划”，但同时又指出整个边区的工农商不要由一个唯一的办事机构包揽，相反地，统一的计划应交给党政军各系统分别去实施。然而，毛泽东最终认定，统一领导的问题乃是 1943 年期间自给工业发展的中心问题。

上述引文明确地提出了党政军的关系问题，这在 1949 年以后仍然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中心论题。延安时期曾提出一个表达党的统一作用和指导作用之实质的核心概念，即“一元化”——按字义指“形成一个整体”（“to make one”）或“保持坚定的一致性”（“to make monolithic”）。这个术语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协调），这就减弱了它的本义。“to unify”（统一）也常被使用，这个英语术语至多只能在与统一的意义相近上使用，因而不能令人满意，“centralized”最好也不过译为集中，因而也不能令人满意。我建议，使用类似的英语术语“to integrate”（整

[①] 《毛泽东选集》1943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807 页。

体化）。但是，翻译问题较之 40 年代初采用的中文表述所包含的意蕴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由于“一元化”这一概念远不如“民主集中”或“群众路线”那样受到重视，我在概括性地解释它的意义之前先对它的使用作若干说明。

这个术语的最有权威的表述可以在 l942 年 9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找到。[3]

这个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与各地区的党政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第八条指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①]

以后，毛泽东在 1943 年 6 月 1 日起草的决定中（前面我从其中引用了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论段）对“一元化”术语作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和解释。他在该决定的第七段中宣称：

>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 129—130 页。

（例如书记、主席、主　　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见，一元化两度作为“分工而又统一领导”的同位语而被使用，其意义显然是指，不同机构之间的必要分工只有在整个系统被党的统一力量渗透和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存在，这样的分工不会危及运动的统一。为了表达这种功能，用类似的英文术语“to integrate”（整体化）看来最为贴切。

“一元化”术语措词强硬，其使用反映了中共领导者对 40 年代初根据地的局势之认识。当时的局势是零散的、分立的和易遭敌人攻击的，在此情况下，政治、经济和行政控制的各个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过度分散事实上已盛行，因此中共领导强调必须保持坚定的一致性（一元化）。

有人可能认为，既然中共已在全国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并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分散就不再构成一个威胁。事实上，由于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实践原因，分立和分权的问题并没有在 1949 年消失，因此“一元化领导”的概念就决不是无关宏旨的东西，即使整个环境由于夺取了政权而根本改观亦如此。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55 页。

注释

[1]这些事件大部分已尽人皆知，并且由于本书的主要素材是观念而不是事实，我没有必要详细地注解它们。刘少奇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和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央决议是博伊德·康普顿翻译的，看《毛译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 年—1944 年》。1943 年 6 月 1 日决议和毛泽东的各种讲话（除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外）可以在毛泽东选集和其他许多资料中找到。刘少奇的“答宋亮同志信”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存在，现在被再版。宋亮就是孙冶力，但孙的原信件没有包括进这个文本中。至于后者，看刘少奇论党，刘少奇 1945 年 4 月报告中的关键几段，最近已在中国再版。关于毛泽东从 1943 年 8 月以来在党内的正式地位，见《党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2]我认为，有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报告和党在七大所采纳的成文法之解释，雷·怀利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是错误的。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是否对“纯粹的”观念形态和“实践的”观念形态作了区别，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涉及。

[3]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学习文件。该决议不是由毛泽东正式起草的，但中文的文本却被收入东京版《毛泽东集》第 18 卷第 165 页—163 页中。

小结　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能吗?

正如上面第三章已提到的那样，毛泽东在 1939 年—1940 年就已把战后要建立的制度设定为“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并明确地指出这个专政将纳入无产阶级或它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中。毛泽东在 1944 年—1945 年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当 1946 年这一前途最终幻灭，被公开的内战所替代时，对党的直接的政治目标作丝毫掩饰就不再有任何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所写的论文中阐明了他三个月之后打算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性质。

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用同心圆的比喻来说明政权的构成。将要实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享有领导权，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是追随者，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他们中的作恶者不能再划入“人民”的范畴，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主体，必须接受专政。

毛泽东全然不隐瞒代表四个阶级的国体，他回击了那些报怨共产党是“独裁者”的空想批评家，宣称：

>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

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①]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保护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

在引导中国“由农业国转到工业国”的任务中，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③]

从上述简短引文中，可以引伸出 1949 年以后在中国贯彻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问题的几个主要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直接承袭了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的理论，毛泽东本人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因而特意强调中国革命与苏联经验的联系。的确，无论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在握，毛泽东就宣告从今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6 页。

后他要依照正统的方式开展工作。他在 1949 年 3 月宣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因此，毛泽东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论述，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源从城市带到乡村。因此，毛泽东在 1949 年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居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 50 年代初竭力吸收大批工人——真正的新鲜血液入党，以“改善”它的阶级构成。

然而，尽管这样，尽管毛泽东在 1962 年明确地说过：在建国初期，我们除了照搬苏联别无选择，《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上述引文本身已包含了一些表明重大差异的因素。这样，惯例上意指“独裁”的“autocracy”术语被当作“专政”的同位语加以使用；“Great Harmony”（“大同”）被当作与共产主义相似的东西加以使用；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被反复强调。

中国革命在 1949 年以后要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道路前进，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为何原故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下篇”作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必谈及了。在概括毛泽东 1949 年以前的理论发展时，思考一下，在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十年间显露的各种趋势中，哪些已经隐含在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17 页。

东夺取政权以前的思想探索中，这看起来似乎是恰当的，如果人们确有预见历史进程的智力的话。

在我看来，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有人主张“毛泽东的经济学”形成于延安时期。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作了概括）可以发现毛泽东未来经济思想的重要线索，然而，这些开端过于片面不足以证明这样的结论，即 1958 年大跃进的观念在各个方面已暗含在这些开端之中。实际上，延安经验只涉及农民的自助，而与公社特有的复杂、多样的组织无关；只强调精耕细作，而不讲高产、猛产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根本就不存在着大规模与小规模相结合、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也没有“两条路走路”的观念。毛泽东在 1949 年提出通过一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到工业国”。农村居民虽然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却完全说不上最终目标：接受再教育，以改变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如果一个人尚能在延安的自给经济和十五年以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用的新政策之间看出某种存在上的连续性，那么在政策的详细表述中就没有任何智力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探索中就没有任何不可中断的发展链条，因为毛泽东在 1949 年明确地抛弃了他在 40 年代初曾提出的许多初步的思想。即使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从 1937 年到 60 年代初确有其实质上的连续性，然而，如果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最终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

逻辑不相容，那么毛泽东本人也只是到了大跃进时期才发现这一点。

如果从毛泽东 1949 年以前的演讲和著述中识别许多即将发生的事态之征兆确有可能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几乎完全保持连续性的就是毛泽东行使政治权威的方式和方法。

毛泽东宣称他即将建立的新制度既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又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不应当过分强调术语使用上的差异，因为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不能全部从汉语中找到贴切的对等词时，“独裁”这个词在过去的年代里有时是作为“专政”的翻译词来使用的。

较之现代的任何领导人毛泽东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大众参与的民主。在这方面，他善待中国人民，为他们进入政治发展的下一阶段作了准备。同时，他认为民主的发展只有在“强国”的组织内才是可行的，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观念过分强调国家的集中，在这种体制下，他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国革命领袖，归根到底依然是决定什么政治选择是合法的，什么政治选择是不合法的仲裁者。

正如前面第三部分强调的那样，毛泽东从 1939 年以来就力图在中国推进与欧洲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相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创造社会主义最终得以确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致力于完

成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育阶段上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任务，把五四运动发起的对旧的儒学价值之冲击继续下去。他在 1944 年 8 月一封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中解放出来的信中写道：“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抑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有人一定会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整个看法相一致。

在我刚才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背后隐伏着一些基本的论题，它们自本世纪开始以来就在中国进行异质文化输入的过程中被提出来了，至今仍然没有引出任何明显的结果。五四时期整个地以推崇西方思想，拒斥中国传统价值为特征，此举曾在 30 年代获得成功。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中国文化的尊严重新得到肯定。就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钟摆实质上偏向对整个五四精神的否定，断言儒学对天下事提供了解答。毛泽东由于坚持最根本的西化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不可能走这样的极端，但是毛泽东的“中国化”要求仍然对中国文化持肯定态度。

40 年代后期，当全国的胜利临近之时，毛泽东开始象前面提到的那样更加强烈和更加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东西，诸如城市领导和工人领导的必要性；在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方面工业化的中心地位。但是，“封建的”文化真能被革除吗？党在他的领导下真能经受改革，获得更加民主的工作作风吗？毛泽东在 1949 年建立的“人民民主独裁”真能实现现代化，并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引起深刻变化吗？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 1949 年取得胜利之际，这些论题就向毛泽东的政治信仰逼近。

下　　篇

毛泽东的思想：从 1949 年—1976 年

象列宁一样，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以后面对与过去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新环境立刻着手发展他的思想，同时对他以住所采取的主张重新加以阐释和修正。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保持了实质上的连续性，但也有惊人的突破与扬弃。此外毛泽东在以往未曾有机会探索的领域展开了新的思路。

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一个重要的常数，这就是他一直关注于使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适合于一个落后农业国的经济与社会现实，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遗产。对毛泽东来说，历史遗产同样是现实的东西。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重大课题的首要方面就是，为主张农民的政治作用远比十月革命道路所显示的作用更大而作出理论论证，尤其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作出理论论证。在这方面，毛泽东在 1949 年本该想到，或许已经想到了中国人的实践和理论将更接近苏联人的实践和理论。由于掌握了城市和乡村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有效地发展现代工业，从而造就自己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跻身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发达国家之例。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样的趋势似乎正在到来，但是，事态迅速逆转，1949 年以后的十年，中国与苏联的裂痕比

过去加深了。这类事件在《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和其他许多著作中均有论述。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一方向性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变化部分归因于中国社会持续增长的农民比重，部分归因于农民意识对毛泽东的影响，但这还不完整。延安模式的影响，诸如强调奋斗与献身的道德价值，提倡分权和自力更生的经济工作方法也必须考虑到。另一个显然重要但却难以评估的因素是，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目标。他在 1938 年为推进这一过程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术语到 50 年代初已不再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不愿看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除了他本人外还有另一个理论权威存在。即使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意向仍然支配着毛泽东的思想探索。

中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历史成就，毛泽东的这一信念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要用民族遗产的精粹——观念和价值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更有效地指导革命变革，最终促进西化。他决不是要用某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传统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然而，要判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人的还是西方人的，则变得愈来愈困难，尤其在毛泽东的晚年。[1]

这特别表明毛泽东的理论包含不确定性的因素，虽然人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即毛泽东在他最后的十五年间究竟是象他过去那样对理论问题抱有浓厚兴趣，还是专心致力于实现

他自己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自始至终强调主观力量的作用，强调“自觉的能动性”和上层建筑。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所包含的另一种不确定性的因素。一方面，就勇于创造的冲动在中国的前现代文化中或在其他非欧洲型的文明中表现不显著而言，强调主观力量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种非传统的因素，另一方面，就统治者显示美德被视为幸福的首要保证而言，就提倡美德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手段而言，强调主观力量的作用显然是与大汉民族相匹配的。

毛泽东在其晚年与秦始皇有相似之处：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善于使用革命暴力。但同时，群众参与的观点，依靠群众的观点，这些延安遗产中的精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叫得更响，尽管它们常常被误解。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组织，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革命战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决定论与自发论，通过美德拯救与通过技术拯救，专制政治与群众民主——这些就是毛泽东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期间所苦苦思考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在讨论毛泽东致力于解决这些或其它一些问题的复杂经历时，我将采用一种主题性与编年学相统一的方法。1957 年下半年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构成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其间毛泽东在观点和个性上的变化对他最后的十九年整个地施加了影响。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加以阐述就分为两个部分：1957 年前期与 1957 年后期。但是，这种方法切勿机械地加以运

用，尤其因为毛泽东后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并不是在 1957 年以后才出现的。

第五章　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内部矛盾

管 理 模 式

管理模式这个主题在毛泽东 1957 年的思想中看不出什么决定性的变化，但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中的重要因素。从井冈山到延安到 60 年代初，毛泽东在思想上一直强调由政治精英实施强硬的领导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这一特点实际上是“群众路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群众路线”在文革中经常被浪漫化或情感化，以致表示一种听任人民以自发形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业。实际上，当毛泽东把参与过程部分看成是教育过程时，他没有任何史泡肯式的观念，即认为“学生”完全应当随心所欲地决定他们要学什么。相反，正确地加以理解，“群众路线”不是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否定或与之相对立的东西，而是一种互补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领导与被领导相互关系中的另一侧面。

同时，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概念概括了党的经验，它表明了中共的理论和领导方法中的一个实质方面。江西时期就开始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理由很清楚，脆弱的根据地如若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就无法保存下来。“群众路线”的术语并不是毛泽东首先加以使用的，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早已采用它。[①]然而，这类想法是毛泽东思考的中心，尤其在 1929 年 12 月的古田会议中他

[①] 见丁伟志和石仲泉的文章：《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文献与研究》1983 年汇编本。

作了专门阐述。正是毛泽东规定了这一概念的确定内涵。

毛泽东对这一概念的经典式定义是 1943 年在延安提出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第一次得到概括和系统阐述。这个定义大致如下：

>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①]

“化为群众的意见”一句表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虽然与人民心心相印，但最终还得让人民接受那些他们无能力加以系统阐述的思想，并使这些思想内化于他们的头脑中。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指出的那样，这里有着与列宁思想明显的一致性，因此，与提出“群众路线”公式几乎同时，毛泽东重申了由革命精英集中指导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他在 1942 年 2 月 1 日的演讲中抱怨“一部分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②]

上级的强硬领导与下级的自愿参与（如果不全是自发的话）之间的两极化是列宁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类概念包含一些尖锐的矛盾，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毛泽东一直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不断变化两极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5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79 页。

寻求平衡，但是至少直到文革，他总是强调集中对于民主的优先性。

较之列宁，更不用说斯大林了，毛泽东准备在更大程度上倾听人民的呼声，考虑他们的意见。然而，他决不是列宁轻蔑地称之为“尾巴主义”的那类人（“尾巴主义”更确切地翻译为“落后主义”），就是说，他不是尾随常人而是引导常人，这至少直到60 年代初是如此。必须注意到“群众路线”问题的另一方面，它不只是领导与按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党的成员和支持者的属性，尤其是社会构成。

虽然列宁扩大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给农民以较大地位，但是，对他来说，正如对马克思来说一样，共产党毕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毛泽东在重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同时，从1927 年以来一直从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收革命队伍的新成员：乡村流浪者或游民、店员、职员、小公务员、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绅士”。这些阶层大多社会地位低下，在此意义上他们属于“人民”，而不属于“社会名流”。相反，在苏联人的语境中，“群众”（或“劳动群众”）实质上指工人和农民中的可靠分子。苏联人没有使用更为精确的阶层标签来强调追随者的未展开的特性，从而强调他们对领导地位的需要。对毛泽东来说，“群众”意指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这些人最终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革命。[①]

[①] 为了从一种稍有不同的方法论视角讨论这些问题，详见唐弢的文章：《新中国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群众和公民》，施拉姆著《国家政权的基础》第 257—289 页。

在毛泽东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各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将在后一部分探讨。不过，毛泽东联系的“群众”由不同种类的人所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已蕴含着领导权在毛泽东所力图创造的政治制度中的性质和功能。

正如第一部分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在 1944 年—1945 年间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作为适应当时环境的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以极其坦率的口吻明确指出，他一旦掌握全国政权，就要在他打算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内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重新加以调整。

事实上，毛泽东早在 1939 午 5 月便开始使用“人民民主”这一术语。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讲话中，他指出：“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①]1949 年，毛泽东在描述新的人民民主政治时，提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国体和政体的区分。在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间，毛泽东以及其他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看待这类问题，因而他们主要是根据阶级属性来定义国体。这样，1952 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层干部使用的政治研究参考书就部分地提到：

国体是国家的阶级实质，国体的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27 页。

国家中的地位问题，　即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的国体一般分为三种类型：（1）以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国体；（2）以工人阶级专政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国体；（3）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国体。[①]

这种划分毛泽东在 1939 年—1940 年间就已经作了规定。1949 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不过是为适应从战后重建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过渡时期”的现状所采用的一种混合形式。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则主张，在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的社会中，政权只能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单独掌握，不能由任何中间阶级或几个阶级的联合体来掌握。列宁在 1905 年曾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用以表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俄国在纯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前可以实行某些改革。共产国际在二、三十年代曾把列宁的这一概念运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一概念的变体。

在 1949 年，毛泽东用同心圆的隐喻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构成。工人阶级是核心，它通过自己的政党行使领导权，农民紧靠中心处，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紧随其后，大多是追随者；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既是爱国者又是剥削者；因而他们处于“人民”的外层边缘，总是易于倒向敌

[①] 陈柏欧著《人民学习词典》，第 288—289 页。

视革命的“非人民”阵营。

这四个阶级（自然与斯大林 20 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相一致）将行使“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国体”的这种构成不仅体现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也体现了统治方式（专政），那么属于政体的有意义的领域是什么呢？建国初期，关于政体的各种定义[①]大部参照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如下表述：

>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　　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②]
>
>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③]

这段表述自然是 1940 年之作，那时中共的地位较弱，毛泽东仍在考虑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到 1949 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观点，不再强调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直接选举对于真实民主的重要性，而强调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新国家的基本组织原则的论断却

[①] 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 135 页，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 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37—63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38 页。

末作改动。

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样重要的列宁主义口号，以此表示对苏联示范的高度重视。但同时，他也使用中国特有的术语和概念。他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的文章中有意强调“独裁”这一过时的语词就是指专政。的确，当人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规范的中文表达式来翻译“dictatorship”一词的时候，“独裁”一词偶尔被使用。但是，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独裁”一词对于他的读者包含传统上的含义，正如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大同”这一古老术语的含义一样。康有为在五十年前曾赋予“大同”新含义，毛泽东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加以使用。

1953 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一首八行韵律诗概括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原则：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决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①]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73 页。

换句话说，公民们和基层干部应当参与政治，但其活动必须在坚定的集中指导之下进行。

1956 年 4 力 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无疑是他 1949 年以后六次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同时是他有关自己管理哲学所作的三次最权威的论述之一。虽然毛泽东在这种场合下所提出的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汇报材料中的东西（这一点下面要提到），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

讲话的第五部分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部分必须从整个讲话的语境去加以理解。整个讲话着重指出，片面的和不切实际的追求任何政策目标，结果是适得其反。这样，如果你真想发展重工业，你就不要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要在内地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就必须恰当地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工业。毛泽东按照类似的辩证方式思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①] 现在看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②]

归根到底，毛泽东优先考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效率，在这个限度内他也提倡分权，重视基层的创造性。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五部分中毛泽东作了如下概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9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06 页。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要强求统一。……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利，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①]

我上面摘引的是非正式文本，在正式文本中毛泽东更加强调集中，新加的原文写道："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②]

《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是在毛泽东逝世三个月后出版的，虽然上述强调程度上的差异在这时已显而易见，但由于缺乏资料，不了解新加的原文的编辑过程，要对这些差异的意义作出评估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一些观察者把那时新加的几段论述视为伪造品，随后发表的信息材料使我们能够澄清这类问题。

这篇讲话旨在阐述经济发展的总策略，最终也论及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管理模式的问题。1956 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成员的陪伴下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1956 年 4 月 25 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概述了几次讨论的结果，接着又在 5 月 2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活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正式文本就是这两次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07—308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0—731 页。

的拼接。[2]

尽管毛泽东坚持强调国家要严格集中，但在 1956 年他直接关心的还是扩大地方权限的问题，因为他认识到目前过分的集中有弊端。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另一次讲话中说：“下级对上级关系象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有很多话不敢说”。[①]

但是，有效的集中如何与“适当的”地方权利相结合呢？这个问题与双重垂直控制的问题有必然的联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五部分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必须纠正。[②]
>
> 希望中央各部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③]
>
>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④]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34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0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0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0 页。

最后这段论述提到了 1956 年—1957 年间所采取的一项政策，即只有大型企业或重点企业，尤其在重工业领域才直接由中央各部委控制，工业和商业的其他企业交给地方管理。由此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管理模式已成为许多研究的课题。20 年前，弗兰兹·舒尔曼作了一个迄今仍有用处的区分，他把决策权交给生产单位叫作“分权Ⅰ”，而把权力下放地方行政部门叫作“分权Ⅱ”。舒尔曼认为陈云是“分权Ⅰ”观点的倡导者，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则是“分枚Ⅱ”观点的推行者。但他发现，陈云的模式是一种包含集中、分权Ⅰ和分权Ⅱ三种成分的矛盾结合体。[①]

哈里·哈丁采用了六套标准来解释这类问题，最终也认为 1957 年秋季的三中全会所采取的政策（实际上由陈云起草）是将集中与分权相结合的“折衷的”产物。[②]这种包含矛盾的“折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当时领导层每一个人的共同特征，差异在于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舒尔曼还认为，在“真正对立面的统一”中把集中与民主结合起来的这种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就表现为，“总的政策刺激之集中”与“具体的政策刺激之分散”相结合。[③]显然，他这里称之为“总的政策刺激”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在 1953 年的韵律诗中所讲的“大权”;“具体的政策刺激”可以等同于“小权”。

1958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修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个指示实际上构成大跃进的蓝图，其中的第十八条首次引用了 53

[①] 弗兰兹·舒尔曼著：《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175—176 页，第 196—198 页。
[②] 哈里·哈丁著：《中国之组织：1949—1976 年官僚政治的问题》第 107—115 页，第 175—182 页。
[③] 舒尔曼著：《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86—87 页。

年的韵律诗，并对下列术语作了注解：

> “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①]

显而易见，这段文字论述了各级的关系和党的协调作用。毛泽东在这里有意强调“大权独揽”这一流行格言与“独揽”这一术语是一个意思，通常指个人的独断或专断。这再次表明他历来强调加强集中制的必要性，一贯坚持把集中制原则贯彻到实践中去。

严格的集中制如何才能与下级所具有的虽是从属的却有实际意义的“小权”结合起来呢？主要是通过党的协调作用，毛泽东对 1953 年的韵律诗作注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阐明这一点。在这里他没有使用在他延安时期的管理哲学中频繁出现的“一元化”术语，[3]“一元化”意指“整体化”或“保持坚定的一致性”。即使这样，“一元化”概念所表达的意向显然支配了毛泽东的思考。他在 1956 年 4 月的讲话中曾回忆说，在延安根据地时期，为了纠正当时出现的过度分散与地方闹独立，“中央作出了增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73 页。

党性的决定，有了一元化，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汉”。[4]

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对 1953 年的韵律诗作注解时提到一个事实，即个人说了算的体制是不受欢迎的。他把“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统一”等同于“党委与第一书记的统一”，[①]列入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中。显然，毛泽东仍然按过去的延安风格来理解一元化领导。在这点上高岗的看法却完全相反。对高岗来说，“一元化”的含义很接近它的字面意义，即指“保持坚定的一致性”。依他之见，组织方式中的坚定一致性意味着，每个实体如工厂只能对外边的唯一权威机构（实际指北京的相关部委）负责。厂长是这个机构的代理人或上情下达者，因而在厂内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按照毛泽东五十年代后期的一贯看法，一元化不仅国家要实行，地方也要实行，否则，甚至“小权”也可能分散引起混乱。而实行一元化只能由各级党委负责。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党的控制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表现为，无形成有关原则问题的决定，然后检查执行情况。

进一步讨论党的领导作用要到我们考察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策略时才是可能的。眼下，为了使管理模式的讨论圆满，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 1962 年 1 月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在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把集中和民主结合起来之后，再一次象他在延安时期那样强调集中比民主更重要。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集中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是可能的，主要理由有两点：

[①] 看 1958 年 1 月 1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一方面，如果不让群众讲话，他们就会“骂娘”、失望，从而就不愿意有效地参预政治和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

>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这里，“民主集中制”的术语概括了一个基本方面，即有效的“集中统一”与下级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创造相结合，同时涉及到“群众路线”口号所提出来的上下沟通问题。毛泽东对上下沟通的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总的看法，“加工厂”这一隐喻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总的看法。的确，这个厂如果不不断地吸收信息和建议，就不能生产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但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归根到底只能由中央核心部门形成。在“加工厂”前加上“只是”这一反义副词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领导机关拥有最终决策权。

一般地说，毛泽东关于民主和集中的观点从延安时期到 60 年代初一直是这样。另一方面，正如我在这部分开头所说的那样，虽然毛泽东在民主和集中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具有连续性，但是，在 1957 年—1958 年间无疑有某种强调程度上的变化。这种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72 页。

变化与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领域两方面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有密切关系，这将在随后的几部分中加以讨论。不过，它直接涉及到我们此刻正在思考的权力结构的问题。

我在前面曾提到，毛泽东终生追求“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为此他力图促进人民参与国家事务，但是，这种实践所涉及的政治选择机会却被忽略了。在建立一个政治制度时，如何使其在结构和机制方面实现更多的民主，毛泽东对此是没有多少思想贡献的。

这自然也是 1978 年以来在中国对毛泽东提出的各种批评之一，对此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再探讨。这里重要的是，注意毛泽东从大跃进时期开始愈来愈不重视制度建设。换言之，到 1956 年或 1957 年，毛泽东不是按照政治机制而是按照国家的阶级属性来解释民主，这样就不再把国家结构视为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东西。

例如，他在 1956 年 4 月谈到集中与分权时宣称：“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①]

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对议会民主和两党制这样的西方观念和实践表示轻蔑。对于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6 页。

漫不经心，不过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谈到对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大赦的问题，虽然根据宪法他们被认为是专政对象，毛泽东援引了一位批评者的话："宪法上规定了，那你当主席，你又不遵守宪法？"[①]对这一诘难毛泽东的答复很有特点，他一方面认为这些人虽然不能全部释放，但大部分应当释放，另一方面又指出大赦政策一定要秘而不宣。

的确，毛泽东到大跃进时已完全忽视这样的制度细节，但由于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断革命造成的激进主义气候的直接后果，所以在考察毛泽东晚年行使政治权力之前，让我们转而考察涉及制度问题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发 展 模 式

在理解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时，作为引言，值得强调一下毛泽东对现代化和工业化一贯持积极态度。近年来出现一种倾向，把毛泽东视为某种田园式乌托邦的信奉者，认为他要以一种稳固的国有经济来作为我们所谓的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在毛泽东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整个二十七年间，他不断地要求经济的迅速增长，要求以数量限定的进度：吨钢、吨粮等等。

"现代化"术语在近代常常被用来表征西方的文化独尊，好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201 页。

象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一旦进入“现代”世界，必然变成美国人和欧洲人。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从未有这样的顾忌，他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经常使用现代化术语来说明中国的经济目标。例如，他在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使中国的农民由旧式的落后水平进到现代化的水平，以便为工业提供市场，“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①]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工业在使国家富裕和强盛方面起决定作用。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身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真正的独立”。(这段论述在选集中被删去了)[②]

我在下篇引言中曾提到中国社会持续增长的农民比重和农民意识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响。这类因素无疑存在，且至关重要，而且从 1955 年以来，尤其从 1958 年以来表现得更甚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在 1949 年 3 月宣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③]

换言之，我们迄今一直按非正统的方式开展工作，因为这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75 页。
[②]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17 页。

我们能够获胜的唯一方式。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就要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正统方式开展工作，由城市指导农村，使落后的农民在工业环境中受到熏陶。毛泽东的这种见识在 1949 年 6 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他在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家权力不能废除，相反，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之后，继续说到：

> 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在引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过程中，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相对容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②]

毛泽东强调对农民的教育，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作用，亦即施行教育的作用，这就象他 1949 年 9 月宣告的那样再次肯定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优先地位的转换。

颇有启发性的是，毛泽东在 1951 年致函刘少奇，指出“半工人阶级”的提法不妥，建议不要再使用。[③]所谓“半工人阶级”是指农村中象城市工人阶级一样的革命领导阶级。虽然毛泽东本人早期曾认为“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他现在认为除了工人以外赋予任何阶级以领导地位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6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27 页。

都是错误的。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思想上正向着更正统的方向转化。

而且，五十年代初，观念上的这种转化已见诸于行动，一大批真正的新鲜血液——工人被吸收进党内，以“改善”党的阶级构成。

尽管毛泽东在 1962 年曾说过建国初期除了照抄苏联人别无选择，但是他并不象苏联人那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混淆起来。尽管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中居主导地位，但是人们仍然有理由提出疑问，中国革命的远景，即使毛泽东在 1949 年就规划仔了，最终是不是要达到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相一致。

最初，毛泽东明确提出来的经济政策是审慎的和渐进的。他在 50 年 6 月要求“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并对当时的总体目标作了如下概括：

> 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①]

即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实质上仍然持类似看法。1953 年 8 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263—264 页。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1954 年 9 月他指出：

>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

1954 年 11 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人民日报刚刊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提法，即“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③]在批驳这个观点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理论基础的。

然而，直到 1955 年 3 月，毛泽东仍然认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

>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89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15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84 页。

半世纪。[①]

接着，1955 年中期，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初衷，发动了一场在农村迅速推进合作化的运动，这场运动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个气氛。毛泽东当时的新的心境和新的分析构架鲜明地表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毛泽东的按语写于 1955 年底，其时合作化运动还在加速进行，其速度比毛泽东在 7 月 31 日提出号召时所预料的还快。

透过这些按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某些预示了大跃进甚或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题，例如毛泽东深信动员起来的群众蕴藏着改造环境，从而也改造自己的无限潜力。在一段按语中，毛泽东赞扬了王国藩合作社，戏称“穷棒子社”，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批的生产资料，并加以评论说：“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②]在另一段按语中，毛泽东提到 1955 年下半年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气氛，并对此评论道：“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③]

在农民的热情和战斗精神鼓舞下，毛泽东在 1955 年 12 月写道:

> 我国和苏联比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及其丰富，胜利前，各个方面均有经验，左右好几次，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新起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33 页。

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有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　　社会主义。[①]

这样，毛泽东早在 1955 年就暗示了，由于中共不是通过突然占领首都的政府，而是经过二十年的农村斗争取得政权，因此，他们在1949年时比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1917年时更懂得如何驾驭基层的民众，求得他们的支持。而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然而，毛泽东此时努力推进的革命决不是一种片面的“村社”革命。虽然，他在 1955 年 7 月 3 日关于合作化的讲话中明确要求中国的合作化应当先行于机械化，但是，机械化紧随其后，迫切需要拖拉机、抽水机及其他工业产品。显然，这意味着，必须让农村居民掌握来自城市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引导他们进入现代社会。更一般地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在 1949 年曾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 56 年 1 月确实承认这一点，他在谈到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时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要有干部，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96 页。

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科学技术专家”。[①]

所以，毛泽东在 56 年 1 月要求人们理解和善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指出，中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落后，自己不能生产关键产品，因而处于依赖地处，并加以评论说：

>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②]

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政治局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令人信服地概括了五十年代中期他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这篇著名讲话在许多方面都讲了一个相同的道理：要懂得事物的相互关系，不要顾此失彼。这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政治领域，毛泽东要求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领域，毛泽东认为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以发展重工业，结果是适得其反，他要求改变对重工业的过分倾斜政策，但同时，他强调要适当注意进一步巩固上海及其他沿海城市的现有工业基础，不要把可利用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工业的扩建中。

如前所述，在草拟这个讲话时，毛泽东曾仔细听取了陈云及其他经济专家的意见。《论十大关系》无疑在总体上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采取一种博得党内广泛同意的妥协立场。但是，毛泽东在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297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第 109 页。

具体问题上采取一种温和的调和态度，决不意味着他准备在各个方面都服从领导集团中多数派的意志。

毛泽东早在 1955 年自作主张号召迅速推进合作化时，就已表现出一种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性情。[①]1956 年初期，他已经听信他人，相信由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成功，所有经济工作都可以加速进行。1956 年 6 月 20 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反对冒进的重要社论，毛泽东预先看过这篇文章，但没作任何表态，同僚们以为毛泽东首肯了，而事实上他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虽然承认经济发展过快不好，但仍相信中国可以迅速获得发展。因此，他对这篇社论，耿耿于怀，一年半以后在大跃进前夕才把自己的感触渲泄出来。[5]

1956 年春、夏，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采取了一种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对待党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对待正确与错误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地论述，而在更早的一些文章中也经常提到它们。鉴于从 1957 年到 1976 年“阶级斗争”居首要地位，这个主题值得在单独的部分中详加讨论。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中的论述，第 110—117 页，第 167—169 页，也见我在《是党的领导还是真正的统治者》一书中所作的分析，第 214—216 页。

人民、阶级和矛盾

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以前考虑这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实质上早在 1937 年《矛盾论》中就已确定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始终，虽然所有矛盾都具有斗争性，但是，它们不一定是对抗性的，而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矛盾论》的原稿相当广泛地叙述了非对抗性矛盾的存在领域，从而限制了阶级斗争的范围。

>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先进与路后的矛盾，经济上城市与农村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各种技术分工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寒与暑、昼与夜等类的矛盾，都没有对抗形态的存在。

1952 年开始用正统的标准来指导意识形态，因而在 1952 年的修订本中，毛泽东更加强调路线的划分，他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①]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不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他还指出，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革命根据地里面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是“极其对抗的”。[②]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0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10 页。

上述重要差异反映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在整个五十年代都程度不同地强调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对待唯一的两个阶级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考察《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已提到），是新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1951 年制定的路线没作大的改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在 1937 年曾设想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加以解决，现在要求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方法加以解决，实际上二者是一回事，后者不过更具体罢了。

毛泽东在 1950 年 6 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反映了他那时的态度基本上是温和的。这个讲话在选集中题为《不要四面出击》——换句话说，不要同时与过多的阶级作斗争。毛泽东概述了党对态度暧昧的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现行对策，指出：

>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

到 1952 年 6 月，事情起了变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已成为“主要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3 页。

然而，毛泽东在 1952 年 9 月致信黄炎培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整个时期内，希望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放弃赚钱的念头，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①]

1955 年夏季，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在富农和贫农之间区分出一个中农，而把富农和贫农的划分视为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基本阶级划分。毛泽东在 1955 年 10 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性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他的农村政策，并指出共产党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是，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②]毛泽东强调了这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关系，写道：

> 一九五〇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和“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4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98 页。

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　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①]

毛泽东还指出，在三个五年计划的十五年期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②]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认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事上到 1956 年已在各个领域中完成了。1956 年初，由于意识到有利的前景，感到自己地位巩固，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上，尤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上采取了更能促进修好的温和路线，并强调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相同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吸收新党员时不再象先前那样对非无产阶级成员持歧视态度。前面曾提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共曾作出巨大努力以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而在 1956 年，新的党章废除了过去对非工人分子所采用的更为复杂的入党手续，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说明了其理由，这是因为“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③]这里值得回顾一下邓的主要观点，因为它们提供了毛在其最后 20 年中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9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97 页。
[③]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　　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把这些社会成员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①]

邓小平在这里不讲家庭出身，更看重主观态度和为革命工作的意愿，就此而言，邓小平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虽然不连贯）是一致的。但是，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将很快消弱，这显然与日后出现的使党陷入困境的思潮相抵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就与邓小平有分歧。1966 年文革高潮之际，江青曾指责八大的报告隐含阶级斗争熄灭论，即使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承认他在 1956 年是同意报告的观点的，“我读过那篇报告，那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我们不能只让刘、邓两人负责”。[②]

毛泽东为何、怎样戏剧性地改变了自己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以致刘少奇十年后突然成为“头号走资派”？总的背景尽人皆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的命运变化。这个变化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被 1957 年的种种事件加速了。建国初期，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些人到西方留过学，或者在欧、美、日留学回国人员充任教员

[①]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②] 施拉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2 卷，第 213—214 页。

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就此而言，他们在社会出身上属于“资产阶级”。毛泽东相信这些人可以被争取过来，相信他们可以又红又专。1956 年春季毛泽东提出“百花”方针，其主要意图就是吸引旧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逐渐改变他们的行为规范，最终重造他们。

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最初向党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党内在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同时他也强调了相互交流思想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与国内外人士交流思想的重要性。“百花”公式就是在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报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4 月 28 日毛泽东参加讨论，指出如果你的观点正确，那么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并进一步指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党的方针应该是“百花齐放”，在学术领域则应是“百家争鸣”。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 年 8 月，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不仅在报纸上对

李森科的思想展开了讨论，而且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对立的遗传学观点进行争论。[6]这次会议的一位参加者随后在《光明日报》撰文直抒胸臆，毛泽东阅后批复；此文应在《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上自己的新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7]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申了毛泽东 1937 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从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此相关，1956 年秋季首次提出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明确观点，这是对当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以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反应。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付反革命分子，反对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过渡的考茨基主义。

就我所知，毛泽东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是在 1956 年 12 月 4 日致黄炎培的信中，他指出，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相反）“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①

1956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首次披露了毛泽东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8]这篇社论旨在反击随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而出现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否定倾向，它措词强硬，指出“一个人只要

① 《毛泽东书信集》第 514 页。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宣称：“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仔研究”，要“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①]

一个月后，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从而奠定了这门科学的基础。在这篇讲话的原稿中，毛泽东对十二月的《人民日报》社论持某种保留态度（尽管这篇社论曾经他亲自审定），认为它没有明确论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不清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的确，在某些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人们不要把善意的批评误认为恶意的攻击，列宁没来得及分析这个问题，而斯大林根本就不愿意做这种区别：

> 你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座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
>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过去在肃反中也犯过类似错误。[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7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93—195 页。

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讲话原稿曾用很长篇幅论述了中国与苏联的分歧，论述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些重要论述在后面中苏分裂一章中将要讨论，就我们眼下论及的问题而言，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同时，他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

在 1957 年 2 月讲话的正式文本中，毛泽东同样强调人民内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①]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是运动、变化的动力，特殊矛盾，亦即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类矛盾逻辑上就应当是主要矛盾，因此他指出：

>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

这一论述看来支持中国的某些理论权威近年来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曾想过用人民内部矛盾来代替阶级斗争（一般地讲，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视为阶级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7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2—373 页。

争的一种形式），因为 1955 年至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与人民内部矛盾密切相关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对于消灭知识界的阶级差别持渐进的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在 1957 年 1 月的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大学生百分之八十还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①]但是，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原稿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改造，改变那种不关心政治的自我放纵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只想着赚薪水和讨老婆这两件事，其他概不过问。[②]

毛泽东轻视享乐和地位（他解放几年来一直对这些不屑一顾），他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讲话中谈到物质享受的消极后果时指出，中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活水平不高，一是文化水平不高，这两个特点也可以作别的解释：如果说中国富起来，象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点，其缺点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文盲。[③]

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倾向在大跃进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部分中看到。但是，整个来说，毛泽东在 1957 年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仍是抱着友善的态度。

1957 年 5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3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207 页。
[③]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225 页。

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观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诸如此类的矛盾。[①]据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专家说，这篇社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意见”。[②]

但是，五月中旬，毛泽东由于察觉到党内有一批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③]

1957 年 6 月毛泽东改写了 2 月的讲话，对“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原有结论作了限定，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④]这仍然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但是毛泽东愈来愈持强硬立场，这样，当 1957 年 7 月“百花齐放”演变为一场反右运动时，毛泽东断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的确，毛泽东也谈到“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⑤]但是，这个部队的主体显然是阶级背景好的青年人。

---

① 见 1957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为什么要整风？”
② 廖盖隆的文章：“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载《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5 页。
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38—339 页。

因此，毛泽东说：“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①]

对于现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正告他们：

>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②]

从这时起，毛泽东格外留心各地“反党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注　释

[1]要讨论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传统的”要素与“现代的”要素之间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关系、见施拉姆主编的《国家政权的基础》一书中我（指施拉姆的文章：“是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2]4 月 25 日的讲话文本当时只传达到党内的高级干部，1965 年 12 月《论十大关系》报告印发中层，它虽然时间上按 4 月 25 日算起，实际上是以 5 月 2 日的讲话文本编辑而成的。由于传达到非党人员，5 月 2 日的讲话文本只是轻描淡写第提到诸如与苏联关系这样的问题。(5 月 2 日的讲话在倡导“百花齐放”口号这点上，实际上已超越了毛泽东 4 月讲话的立场，但是，关于“百花齐放”口号的一段论述，下面我还要对它作探讨，却没有收进 1965 年 12 月印发的报告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再版并在 70 年代初在西方被翻译的，正是毛泽东 5 月 2 日讲话这个简缩文本。1975 年 7 月，在邓小平建议下，两次讲话才被综合整理为目前的正式文本。这一编辑工作是邓小平授权胡乔木主持的。当时，毛泽东只同意在党内传阅，直到 1976 年 12 月才公开发表。根据这些事实，我过去在正式文本发表后立刻撰写的专题文章(《华主席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遗产：<论十大关系>》)现在看来有些滑稽。

上面的所有材料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此书由专门负责出版毛泽东的所有著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著作的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本书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3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3 页。

公开发行的修订本比最初的 1983 年内部版本更加充实，因而也更可取。就“十大关系”来说，相关的一段实质上是同一的。

[3]为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概念的出现及意义，看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政权的范围》一书中我（指施拉姆本人）的文章：“一个统一国家中的集中：1940年—1984 年的理论和实践”。

[4]《学习文选》一九六七年版 135 页。1941 年 7 月政治局作出的 “关于加强党性的决议”，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一元化术语，但提到集中的重要性，提到“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显然，毛泽把这个决议视为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的第一个步骤，一元化领导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得到进一步表述。

[5]关于毛泽东持续的乐观主义和急躁情绪，见他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3—329 页。毛泽东对批评“冒进”的心理反应，其意义在中国人对这个时期的新近解释中被广泛强调。1986 年 4 月 24 日，龚育之在同我（指施拉姆本人）交谈时，认为这或许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中的第一步。有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这篇过去发表的社论耿耿于怀的证据概要，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第一章：人民内部矛盾：1956 年—1957 年。关于周恩来授意写作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社论，看胡华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 146 页。

[6]有关这次座谈会上正式讨论的完整记录差不多三十年后才发表，见《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 年 8 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要》。

[7]为了作更充分的说明，见龚育之的文章：“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介绍毛泽东同志为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写的信和按语”，载《光明日报》1983 年 12 月 28 日。

[8]这一新奇的明确表述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些思想通常是属于毛泽东的。毛泽东以前没有在任何未发表的文章中表达过同样的思想，这个事实被廖盖隆肯定了。见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第 245 页。

第六章　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探索

我在下篇引言中曾说过，1957 年秋季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毛泽东的理论兴趣和政治事务有广泛的影响，从经济学到哲学，从国内问题到中苏关系问题，但是，从实质来看，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新趋势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

决定论与乌托邦：“大跃进”的理论

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心理上和思想上所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1957 年初，学者们和作家们参加了“大鸣大放”，对毛泽东不顾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反对执意推行激进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认为这是恶毒攻击。因此，毛泽东除了培养新的家庭出身好的红色知识分子外，他宁愿依靠群众的热情与创造。

对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时期直抒己见的可怜的书呆子，谁需要他们呢？在毛泽东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此，他积极推行一种与他 1956 年所提出的科学是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左的政策。他在 1958 年 3 月宣称：

>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

们一眼就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的门都关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①]

不管我们觉得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歧视知识分子的论辞多么强硬，把这些论辞视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全部看法却是错误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仍然力图把群众创造与科学输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在经济发展中各得共所。

1958 年 12 月，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同意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物理系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错误的报告，并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所有大专院校。这个报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情绪，即“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更是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属于剥削阶级。即使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助教也被视为革命对象”。按照流行的看法，把知识分子置于运动的漩涡中的唯一理由就是要设置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改造，不愿减少薪水，那就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毛泽东（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完全不赞成这种看法，其理由是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服务。[②]但是，毛泽东的希望与兴趣无疑已转向群众和农村。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85 页。

② 1958 年 12 月 22 日“致陆定一”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4 页。

除了毛泽东对城市知识分子抱有成见外，致使毛泽东在思想上、党在政策上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适应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水利建设这类任务，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势在必行。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曾谈到大社的优越性，指出："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

从 1956 年春季到 1957 年秋季，反对冒进的运动及其他因素阻止了毛泽东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大社的倡议整个来说没有付诸实施。但是，1957 年至 1958 年冬季出现了现存高级社合并运动，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给予热情支持，1958 年 4 月 8 日，中央便发出了如下指示：

>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农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

这个指示是在报纸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四川红光"大社"后发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巧合。（视察是在三月中旬成都会议召开期间进行的）

创立大型组织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在农村建设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为了推进水利工程的发展。这样，在倡导大社的成都会议上以及在为此会作了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都用了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57 页。
[②] 《关于见你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312 页。

量时间听取关于长江水利枢纽工程——“三峡”计划的争论意见，并主持会议就这个问题作出决策，这就不足为奇了。[①]

成都会议初期，“大社”在形式上尚不具有行政的和军事的职能，而这种职能正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批准的“人民公社”的显著特征之一。团此，人们不能说大社只是公社的别名而已。然而，大社已开始具有某些行政的和军事的特点，这样，“大社”就作为一个发展阶段为迅速到来的公社化高潮作了准备。

公社兴起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对象，但是，上述一些事实关系到本章的主题，它们表明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直接促成了 1958 年秋季出台的体制革命，这场体制革命决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这一趋势的创发动因不仅在于毛泽东与农村世界打成一片，而且在于毛泽东从 1955 年合作化运动以来一直深信太平盛世会到来。他在 1956 年至 1958 年间反复地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人民可以从“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获得某些积极的优势。他在 1958 使 4 月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②]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与他在 1957 年 1 月 27 日的讲话中说中国的“文盲”比西方的富裕好同出一辙。而且，整个来说，农民较之其他中国人有更多的空白，就是说他们更少受到物质享乐的腐化，在精于算计的现代世界中更加真诚。因此，在毛泽东

[①] 参见李锐著：《关于三峡工程》。
[②]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第 1—2 页。

看来，农民明显地具有优秀的美德和良好的革命素质。

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人格倾向根深蒂固，渊源于长达二十二年的，使他胜利进军北京的农村艰苦斗争。我在第一篇结论中曾指出，对于五十年代后期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能赋予它“延安模式”的特征，因为具体环境有很大不同。但是，确实存在着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延续。

这种延续性在毛泽东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讲话中表现得特别鲜明。北戴河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会上再三要求废除工资制，恢复战时实行的供给制。毛泽东说：“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①]那不是养人与养狗一样了吗？他断言，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②]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而毛泽东认为“评级主义才出懒汉”。[③]

毛泽东明确地把奋斗与献身的整个价值取向与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宣称：“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④]现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作双重斗争，目标同样地明确，实行供给制决不会降低人民的革命热情或责任感。

毛泽东把公社与城市加以比较，认为公社包含“共产主义萌芽”，而城市要求“正规化”，充满着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毛泽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04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06 页。
[③]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18 页。
[④]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18 页。

东要求大家拼命干，以生产更多钢铁。对于有人批评大办钢铁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毛泽东认为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去掉了党的许多优良传统。

毛泽东在1958年9月29日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再一次公开指责了那些把动员群众参加工业生视为“不正规”或“农村作风”的人。仅仅过去不足一年时间，1959 年 7 月，毛泽东承认大办钢铁是指导上的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毛泽东被劝阻，不再打算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特有的供给制，仅仅是因为周恩来根据各部委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详细的预算，说明供给制与工资制相比较费用大得多。[1]顺便提一下，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向 1956 年“反冒进”的那些人发难，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极力为发难辩护，周恩来首当其冲，即使这样，他仍能在关键问题上说服毛泽东。这件事特别表明周恩来处事稳健，在党内很有威信。但是，尽管毛泽东承认供给制目前行不通，他仍做着这类村社乌托邦之梦。

不过，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承认农民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宣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①]在 1959 年 3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指出在现阶段，工人，不是农民，在工农关系中仍然起着“老大哥”的作用。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44 页。

或许，毛泽东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二重性问题：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兄弟”。

“永远”革命或“不断”革命论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所极力推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总体模式。他在 1958 年 1 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不断革命论作了如下表述：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①]

正如这段陈述所表明的那样，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多方面的改造同步送行，这就是大跃进的特征，一般地讲也是毛泽东指导革命的特征。另一方面，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戏剧性提高，也是毛泽东 1958 年所追求的目标。毛泽东要求“技术革命”，并在 1957 年 12 月提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些都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意向。

的确，毛泽东在大跃进高潮迭起之际曾两次把中国的变革和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67 页。

现代化过程之开端确定在 19 世纪末张之洞实施他的工业化方案之时。但是，1958 年 9 月，毛泽东用机器工具的数量来衡量进步；1959 年 2 月，他把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作为进步的尺度。在这两种情形下，毛泽东都把进步同中国在 1949 年前、后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把工业化，或者一般地把经济发展当作革命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在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告大跃进时说，他决心促使经济迅速增长，但指出革命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①]

这样，虽然中国要“电气化”，就是说，要象苏维埃一样迅速发展她的经济，但是毛泽东把这一过程与人的改造密切联系起来。

这样，大跃进就不仅仅是技术革命和政治动员，它包含多种性质不同的激励和强制相并列的因素，其矛盾特征最集中地表现为，一方面强调党的统一领导，提出“政治是统帅”的口号；另一方面经济的首创活动遍地开花，严重失控，以致于毛泽东后来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06 页。

也承认有效的计划管理大都不复存在。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因为1956年重新实行的“双重领导”制于1958年在利益关系上向党倾斜，致使不属于政府机构的党员干部实际上控制了每个层次，由他们作主核查经济决策中的长远后果。

毛泽东当时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不平衡作为进步的推动力是宇宙的客观法则。显然，毛泽东在思想上深信，动员整个民众，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必要的。毛泽东不仅强调群众的创造作用，这与专家的作用不同，而且赋予整个革命人民（包括专家，或者至少包括红色专家）以改造自己环境的无限能力。这样，在大跃进时期反映毛泽东的观点的理论文章中就出现了“只有不良的耕作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甚或“主观创造客观”这样的惊人语句。[①]

在1958年，想象而不是冷静再三成为真理与现实的界定标准。1958年9月，毛泽东宣称全国粮食产量大约翻了一番，1959年可望再翻一番，这样立刻就会有足够的饲料粮，并出现有关粮食处理的问题。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会前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讨论，再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对这个口号作了解释，指出在制定计划时，“头脑要热又要冷。……冲天的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②]毛泽东还具体地说到，他过去在预言中国到1962年将生产一千二百万吨钢的时候，

[①] 《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7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444页。

只想到中国需要钢，没有考虑这是否是可能的问题。事实上，这个目标既是不可能的，又是不现实的。中国人不要把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向共产主义过渡混淆起来，也不要力求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

在 1959 年的最初几月间，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泽东再次怀抱不切实际的希望。三月，他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如果钢铁生产达到 1959 年制定的目标，那么每年就可以拨出六百万吨钢材用以生产农业装备，农业机械化不久就会实现。[①]到 7 月，毛泽东已认识到大办钢铁是指导上的失误，并主动承担这个责任。虽然达到经济上的决定性突破的时间尺度及时得到了修正，指导路线具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但是迅速的和决定性的经济进展仍然是最终的目标。

为了达到达个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协调各种努力就成为必要。因此，毛泽东在 1959 年 7 月对于大跃进高潮期间出现的无计划状态也承担了责任，并采纳了 1959 年初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承认工业部门需要更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率先倡导在公社实行分散的所有权和经营权。1959 年 3 月，毛泽东对于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尖锐争论进行了干预，采纳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方案。（“生产队”在 1959 年时意指原高级社，生产大队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会晤》载《中国季刊》（1985 年 11 月）。

相当于一个管理区，以后被取消了。）

毛泽东相信人民公社的制度基本上是好的，通过 1959 年春夏的调整可以得到巩固。[①]他或许以为，靠自己采取措施纠正他所设计的、至少是他所推广的这种制度的缺陷，他就会消除党内的潜在批评。如果这确实是他所期望的，那么他将感到大失所望。在 1959 年七、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公开抨击大跃进的政策。[2]

人们难以充分估计庐山会议上的对抗对毛泽东对待同志的态度以及对毛泽东的思想实质所施加的影响。

综合与折衷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

毛泽东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必然引出一个二重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变得异常突出。1958 年 5 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就是一种要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竞赛的尝试，并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②]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是要应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泽东所承认的两个“父母”中，十月革命的意义勿需赘述。中国自 1917 年以来从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获得了许

[①] 斯特朗：《三次会晤》第 496 页—470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222 页。

多有关开展革命，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社会”却意味深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间甚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观念、态度和习惯也给共和国打下了印记。

的确，中国需要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改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为苏联的副本。毛泽东在1959年3月曾说：“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①]这里，我们可以再次体味到毛泽东在1938年所表达的一种信念，即吸取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制定正确路线不仅提供了原料，而且提供了“方法”。

毛泽东在1964年和1965年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历史经验，多次对党内同志讲“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②]

毛泽东自称是土生土长的或本国的哲学家，这决不意味着他抛弃了马克思而尊崇孔夫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根源对他的晚年生活影响很大。这样就提出如下问题：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要素与西方要素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怎样融合的？二者被整合为一个新的综合物了吗？“毛泽东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变体．因而最终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媒介？还是它在理论逻辑和思维模式上带有明显的中国风格抑或，在这个由根本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庞大系统中压根就没有明

[①] 《学习文选》1967年版第54页。
[②] 《学习文选》1967年版第37页。

确的体系和结构，而只有相互支撑的两个骨架，各得其所？

我在前面曾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这个性质的理解，随着月岁流逝而有所改变。建国初期，他在编织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把来自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视为经，而把中国文化视为纬。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演变，大跃进的政治气候和中国惯常的思维方式都施加了影响。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接受了马、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变为质、否定之否），但同时，他把“对立统一的法则”视为“思维的根本法则”，[①]这似乎把对立统一规律置于比其他两个规律更高的范畴中，这样毛泽东就暗示了他对辩证法有新的看法。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所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论述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毛泽东正是作了这种发挥，最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本身就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内容。

1938 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概括为四个“基本特征”：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发展是从渐进的量变到质变或“飞跃”的过程；事物的内在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1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8 页。

在 1957 年 1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斯大林对辩证法的看法有问题，认为他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基本特征在哲学上是不充分的？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

>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①]

这里明确提到斯大林从 1938 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而毛泽东在这个阶段还不想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接着论述了在辩证法的看法上他与斯大林的另一个差异：

>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
>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相互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
>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和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放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1957 年 2 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原稿中，毛泽东又以相似的措辞再次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观点。他说：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讲没有辩证法”，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②]。毛泽东的总评价是，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三十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政治教训讲得很清楚。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在三个月后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另一方面，哲学含义却讲得很含糊，至少是模棱两可。关于生和死相互关系的论述使人想到古代道家关于阴阳二气消长的辩证法。然而，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指出：“辩证法不是循环论。”[③]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上述论述反映了他对辨证过程的实质的基本理解。坚持这种理解，同时又不突破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何以可能？毛泽东对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竟简单得令人惊愕不已，以致于我初次接触到它时不能完全领悟其意义。

1958 年，中共以毛泽东的名义印发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212—213、220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104 页。

草案，毛泽东在其中写道：“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永远普遍地存在。”[①]过去，我在翻译这一语句时，把“肯定与否定的规律”当作在中国的政治术语和哲学语言中惯称为螺旋式上升的公式，以为“肯定与否定”的提法意在表达“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基于这种假设，我比较了毛泽东在 60 年代中期提出的辩证法观点，发现他在 1958 年“再次肯定”了恩格斯对辩证法规律所作的经典表述。[4]

现在看来我过去的理解不准确。“肯定与否定的规律”这一中文表述实际上应当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the law of the affirmation of the negation），这样才能理解“肯定与否定的规律”这一新表述是毛泽东当时在中国所作出的重大理论革新。[5]

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门研究者外，任何人对于这一新表述都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和索然无味。事实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内涵是相当重要的。首先，这有关毛泽东在哲学领域中的个人权威。一位在延安时代曾是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小组成员的学者在他的新著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证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6]

“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证”这句话的意义自不待言。“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是毛泽东插入六十条中的语句，随后他并未加以详细阐释，二十年来却一直作为一个新规律被中国哲学家们毫无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07 页。

疑问地加以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革新反映了毛泽东的某种思想倾向。1983 年 3 月，周扬明确指出，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没有纠正斯大林怀疑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偏颇，结果为文革所谓的“彻底决裂”开了方便之门。[7]周杨的中心论点是，毛泽东不相信“否定之否定”，反映了他思想上的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前后相继阶段的绝对对立和互相排斥性质，看不到“否定”在抛弃被否定事物的某些内容时保留了其积极因素，并把它们综合到新事物中去。如果毛泽东就是这样想的，那么新理论确实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文革观念有直接联系。

杨超认为，毛泽东不满意“否定之否定”的表述，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表述意味着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回复到初始的肯定阶段，没有用示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因此，毛泽东用“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来代替“否定之否定”，是“充实了它的内容”。他还指出，毛泽东相信肯定和否定是辩证统一的，正如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等是统一的一样。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矛盾统一体。

或许，上述两种看法可以综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在引进这个新概念时所要达到的意图。依我之见，“肯定与否定”亦即“否定之肯定”，这一新概念强调历史过程中新事物层出不穷，但也指出这类新事物不只是作为以前出现的东西之对立面而出现，它们也被历史的角色：阶级或自称代表阶级的领导者和政

党所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起不停顿的变化又引起意志的作用。而不停顿的变化正是永远革命的实质（因此，这两个术语在 1958 年 1 月的六十条中并列地加以使用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肯定与否定”的新表述是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变革相适应的。

就其具体的政治意义而言，“否定之肯定”概念最好不过地表达了前面论及过的“一穷二白”假设。从一穷二白的状况看，“否定之肯定”意味着，否定可以转化为建设，包含多种否定因素的现状经过转化过程重新得到“肯定”，变为充满希望的新状况。

因此，毛泽东在 60 年代提出新的表述，不只是改换名称，他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概念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否定之否定。1964 年 8 月 18 日在与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康生问主席“能不能讲一讲三个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毛泽东有新的观点要提出，而主席确实提出了新观点，毛泽东当时说：

>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

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

在1965年12月文革前夕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简要地概括了他的哲学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

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菲德瑞克·威克曼和我本人都把这种发展视为毛泽东向更传统的辩证看法接近。[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种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在60年代愈来愈广泛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个演变过程，其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夫子的评价。五四时期，毛泽东指责国文老师“那么顽固”，用“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④]到l938年，毛泽东认为古典遗产既有消极一面又有积极一面，因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对待。虽然，他不怀疑用儒学来解答二十世纪的问题是反动的和有害的，但他似乎赞同为儒学的经典语句所表达的各种态度，诸如孔子周游列国的实践、“每事问”、“不耻下问”的态度以及孟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关于儒家思想中

① 《学习文选》1967年版第3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593页。
③ 贝威克曼：《历史和意志》第323页—326页，施拉姆：《毛泽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页。
④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57页。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参阅本书策 73 页）。

到 1964 年，毛泽东竟然从中国典籍中寻求灵感，对孔夫子颇有好感。尽管他曾批评这位哲人轻视体力劳动，不分五谷，但他在 1964 年 2 月有关教育的春节座谈会上宣称：“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有上过大学，……从小就从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作了官。”[①]

1964 年 8 月，毛泽东与康生、陈伯达讨论哲学时引用了《诗经》的一首诗，赞许地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子也相当民主”。[②]

毛泽东的政治见解最显著地表达了中国的民族风格，他强调政治与道德价值的关系，更一般地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在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作为大跃进蓝图的六十条中明确提出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要求，指出：

>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四级，都要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③]

“秀才”这一术语通常指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中的最低学位。毛泽东有意使用这一俗名，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无疑，他想使类似的人胜任党的工作，但这也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观念，即人们要承担政治责任就必须接受教育。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53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0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77 页。

毛泽东在 1958 年 6 月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宣称:“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这一断言可以视为历史的另一种回声。毛泽东注意到前年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闹得天翻地覆。[①]因此，毛泽东提出“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式是要驳斥他在六十条中已驳斥过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的右派言论。除正规学校的毕业生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在 1957 年春天就曾批评过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的怨恨之外，不难看出，毛泽东在 1958 年 5 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的这一论点是对社会和政治的道德基础的肯定。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论及法治（由韩非倡导）和人治（由孔夫子倡导）的问题时宣称：

>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宪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②]

这段话除了指出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外，毛泽东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明了他对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12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10 页。

用的态度。

1964 年 4 月，毛泽东与公安部长谢富治讨论劳改问题，毛泽东问："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谢回答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读了双十条（当时的惯用语，意指 1963 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条），……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①]

我不至于说，在农村向政治犯宣读"社教"条例同历史上把臣民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皇上诏书相差无几，但是，这里肯定存在某种内在的连续性，那就是相信道德说教是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

至于下篇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权力结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或许在这一领域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整个来说，儒学与法学的融合物在封建主义时代是国家的正统思想，它主张集权制与等级制。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张集权制与等级制。就此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之间有一致之处。此外，如果说毛泽东把政治看作是先于经济并且最终决定社会变化模式的纲，那么他在政治上不仅信奉列宁，而且也信奉两千年来中国惯常的社会秩序一体化的国家中心观念。[②]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观念也有深刻的差异：对于能够运用正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72 页。

[②] 关于这一论题，见我的《国家政权的基础和范围》一书中的序言部分。

确思想来改造世界的人和组织认识不同；政治行动所采取的目标也不同。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在其 40 年代到 60 年代的所有著述中几乎都强调集中制原则。考虑到毛泽东的这种国家学说，他屡次以赞扬的口吻谈到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强硬统治者，就不足为奇了。1959 住，他称赞商朝的殷纣王“能文能武”，指出把秦始皇和曹操完全看成暴君“是不对的”。[①]1958 年 5 月，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说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下了命令“以古非今者诛”。

道家通常不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毛泽东甚至也能从这一末流吸取什么吗？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此起彼伏，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有间歇性，毛泽东本人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波浪式前进中的“苦战”与“休整”相交替。[②]

奥古斯·格雷厄姆注意到，老子“奉劝人们不要把无为看作统治的放弃，而要看作统治的手段”。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二十年间，他作为主席从第一次退居“二线”以来虽然大权在握，但除了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格雷厄姆认为，毛泽东的此举与《庄子》天道篇所主张的原则有某些惊人的类似：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地，不自虑也；并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37 页。
[②]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第 175 页（1967 年版）。

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①]

考察一下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尤其在 1949 年以后时期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归根到底，他受中国的主流传统影响大些，受末流传统影响小些。[②]

上述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传统观念对毛泽东的最后十年影响甚大，由于他在经济和政治的事务中日益采取左的态度而成为文革的根源之一。然而，在许多方面决定局势的是第三个因素，即个苏关系的演变以及毛泽东对此作出的反应。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苏联就对她的发展施加了多方面和深刻的影响。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乃至更久远，莫斯科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泽东对苏联作用的这两方面的反应有显著不同。很晚，他才逐渐地对苏联模式的有效性提出疑问；相反地，他从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中国只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小伙伴，它应当完全服从于世界范围的革命组织，并在革命过程中抹掉她自身的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 1936 年回答埃迪加·斯诺的一番话，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当时，斯诺问毛泽东，如果共产党获胜，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会不会出现某种事实上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瞪了他一眼断然地说：“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不是要让莫斯科来接管，”“或者为第三国际执政，

[①] 《庄子》，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91 页。

[②] 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见施拉姆：“是党的领导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而只代表中国民众的利益。”[①]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演变不属于第二篇讨论之列。然而，作为理解 1949 年以后的事态的引言，注意到毛泽东在 1945 年开始的内战关键时期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所采取的态度，是必要的。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说，中国自 1960 年来注意反对赫鲁晓夫而分散了对自身内部事务的关注，他加以评论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接着，他写道：

> 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一九五零年冬季抗美援朝起的，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内战胜利前夕仍然宣称，联合苏联将是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他概述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504 页。

一战线。[①]

有人说“你们一边倒”，毛泽东对此作了答复，详细地阐发了主张这一对外政策的理由：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虽然这是 1949 年明确提出的对外政策，斯大林的态度并不总是使毛泽东在贯彻这个政策时感到容易和愉快。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如他本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为了促使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在毛泽东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援助和支持，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来谈判，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之间民族利益的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大阵营中的地位的冲突。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的讲话中陈述了自己在 1950 年的莫斯科谈判中对这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2 页。

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①]

这些冲突一方面反映了斯大林对另一股共产主义强大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因为这个势力要求它自身的权利，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的竞争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过去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所进行的二十年争论。毛泽东在 1962 年 1 月 30 日的重要讲话中提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件：

>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同志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很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诚然，了解“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意味着，认识在一个幅员广阔是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环境，并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乡村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模式。但是，一旦政权斗争以胜利告终，这也意味着，要创造出适合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的新方法。中苏之间对中国现实的看法有分歧，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到 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虽然冲突尚未公开，但是分歧却日趋尖锐。

在这一时期内，国内的发展同国外的发展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两个方向上无疑都有作用和反作用。1956 年秋，波匈事变后，中国可能立刻意识到，从今以后莫斯科所能提供的经济援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83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79 页。正式出版的文本不那么强调外国同志更加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助将会减少，因为为了稳定东欧局势，莫斯科必须对东欧进行更大投资。因此，中国政策从 1958 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这不只是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决断，也是对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也出现“讨厌的俄国佬”的举止，他们显然同作为顾问和技术专家于同一时期在别的一些国家工作的“讨厌的美国佬”一样不受欢迎。但是，除了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中的这些外交的和心理的方面外，依靠外国专家指导实施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案，也引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民本身在塑造他们自己未来的事业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这一问题的诸多方面有一个总的看法，这一总看法鲜明地反映在他 1962 年 6 月 30 日的讲话中。他说在 l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那时候有这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①]

毛泽东这里提出的方针强调和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在毛泽东看来，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尽管对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不应当是中国人民的“长远之计”。1958 年，当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试验与社会试验首次被实施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苏联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84 页。

可能对我们不迷信他们感到不满，这不要紧。他在谈到必须破除对苏联的示范，尤其是军事领域的示范的“迷信”时说：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同志看我们不抄他们的（战斗条令），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①]

然而，毛泽东坚持要破除苏联模式，不只是出于自尊心的考虑，他在 1958 年以前的几年间已愈来愈怀疑俄国式道路的价值，不仅怀疑它适用于中国的价值，而且怀疑它本身在苏联的价值。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构想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他在讲话中宣称：

>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大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革。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②]

尽管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苏联经验存有疑虑，尽管他本人批评斯大林迷恋阶级斗争，批评斯大林缺乏辩证法，毛泽东对 1956 年赫鲁晓夫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在方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是更系统地考察毛泽东对这类事件所作反应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207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1—722、727、728 页。

的时候了。

注　释

[1]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一文，载《中共研究》（台北）1981 年 9 月第 123 页，这篇报告是廖在 1980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经过修改已在中国正式发表，但是有理由相信在台北转载的原文本是可信的，它在《问题与研究》1981 年 10 期、11 期、12 期上被翻译，这里引用的一段出现在 10 期第 84 页上。至于新的文本，见廖盖隆著《党史探索》308 页—365 页。对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历史回顾，在正式文本中只作了非常简要的叙述，因而没有包含有关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放弃供给制的详情。

[2]张闻天三个小时的发言实际上比彭德杯的“意见书”更系统、更有理论。可参见当时在场的李锐在他的“重读张闻天的“庐山的发言”文章中所作的分析。张闻天的发言稿现已在《张闻天选集》中发表。

[3]麦克法夸尔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充分和最准确地解释，见《文化革命的起源》第二章：1958 年—1960 年的大跃进，第 187—251 页。

[4]早在 1976 年，史蒂夫·金就领悟到，这个表述涉及一个新的重大转变，但是，遗憾的是他把它理解为“肯定之否定”。

[5]见 1960 年出版的两本供内部使用的毛泽东主要著作选编：《毛泽东哲学思想（选编）》第 195 页—第 220 页和《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选编）》第 150 页。这两本书都包含了以“否定之肯定规律”为标题的扩展部分，虽然其中的多数材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 50 年代中期有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著述。

[6]杨超著《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第 211 页。该书是杨超最初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本书《论毛主席的哲学体系》之修订本。有关杨超参加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小组，看温齐泽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一文，载《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 69 页。小组的其他成员，除毛泽东本人外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和陈伯达。

[7]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载《光明日报》1983 年 3 月 16 日第四版。这篇论文是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它在 1983 年—1984 年冬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期间曾遭到批判，因为它提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但是，从未有人提出，周扬对毛泽东辩证法之分析是错误的。

[8]即使在修订过的正式文本中，也没有提到苏联，这不足为奇。因为这是

1957 年 6 月首次发表的，那时任何这样的否定性评论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七章　中苏分裂的原因及后果非斯大林化和修正主义

关于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问题，过去长期以来依据零散的文本进行推测，因而众说纷纭。现在，依据虽尚不完整却更为丰富的文件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考察。早在 1956 年 4 月，中共中央就形成决议，认为斯大林终其一生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宣称，1956 年 4 月 5 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就是按照这个评价写的，尽管社论没有指名道姓。虽然斯大林对中国的指导是错误的，毛泽东仍然认为“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①]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二中全会上就“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作了著名演说。毛泽东认为，对待斯大林不能以反对所谓期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加以否定，在批评他的错误时也应当肯定他的成绩。至于“列宁这把刀子”，就是坚持十月革命模式，反对“议会道路”，毛泽东认为，这把刀子无论如何不能丢掉。

这种思想倾向在 1956 年 12 月 29 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中得到体现，这篇社论较之以前的四月社论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在 1957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1 页。

年 1 月 27 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对斯大林本人和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其精神稍有不同。

我在下篇第一章中曾引用毛泽东说斯大林欲置批评者于死地的一段话，由此，毛泽东谈到肃反问题，就革命暴力的使用和滥用对中国和苏联作了比较：

> 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①]

毛泽东承认中国有时也犯“左”的错误，但主要发生在江西根据地的时期，那是受苏联的影响；这些“左”的错误由于 1942 年中央发出了反对滥杀和滥捕的指示而得到纠正。即使从那以后也出现过某些失误，但不象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那么严重：

> 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这是一面对的；另一面杀错了许多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②]

毛泽东在 1 月 27 日的讲话中先暗示赫鲁晓夫在秘密讲话中透露的苏联镇压人数，接着承认中国从 1950 年至 1952 年镇压了 70 万人，并认为这个尺度基本上是正确的。[8]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敢于向党和政府直言的任何人送进集中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97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98 页。

营或加以处决的政策外，毛泽东象他 1957 年在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那样再次对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点提出批评。然而，这次与上次不同，毛泽东宣称自己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比较有哲学上的独创性：

> 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说一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未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①]

毛泽东把列宁没有发展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归因于革命早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为斯大林天生就缺乏辩证法。

谈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这件事有两重性：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撩开面纱，是“一个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地否定斯大林，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后果，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我们对此有意见，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94 页。

曾与苏联人交谈过，但他们是大国狂热者。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说我还有满肚子气，“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但他以自己性格特有的方式作了明确说明：“斯大林时代，没人敢说话。我两次到莫斯科，第一次就感到不痛快。尽管都讲‘兄弟党’，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的工作作风已有很大改变”。随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是我们的首领，联共（布）党是会议的召集者，其次，这样做现在没有任何损害”。[①]虽然，莫斯科会议的有关记录指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气氛热烈，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或在政治上的权威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否则一年内中苏冲突的迹象显露出来就会使人迷惑不解。中苏关系的恶化，其主要原因自然是莫斯科对大跃进的新经济政策所作的反应。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泽东的新方法中的某些非正统东西，而看不到他的许多政策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的基本一致性。他们对 1958 年夏季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看法尤其模糊，赫鲁晓夫首先在私下，随后在公开场合嘲笑人民公社。

无疑，他们也为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中过分的和自夸的宣称感到震惊和愤怒。在 1957 年 11 月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

[①] 毛泽东 1957 年 11 月 14 日的讲话由迈克尔·舍恩赫尔翻译，载《共产主义研究杂志》第二期 1986 年 6 月版。

当毛泽东在他们鼻子底下首次提出要在 15 年内在钢产量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超过英国时，这一最极端的宣称一定使苏联人大吃一惊。

毛泽东解决内部问题的新方法，本身就表明他很不情愿依靠苏联的援助，因而这也意味着中苏之间的联系正在减弱。然而，直到 1956 年 12 月，毛泽东还是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他最初在 1949 年所提出的“一边倒”政策：

> 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要成员。中国和苏联站在一起。这个政策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仍有人怀疑这个政策。他们说，‘不要站在一起’。他们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中间路线，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架桥。这是南斯拉夫道路，是从两边要钱的道路。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认为一点不好，对我们的人民没有好处。因为站在一边的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这个中国长久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如果中国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她看来处于有利的地位，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她不可能是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她会给你一点，但不多。帝国主义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食物呢？不会……[①]

可是，1958 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跃进政策所引起的争论范围。虽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征询他就搞非斯大林化这种方式持强硬的保留态度，但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不断扩大的疏远不只是甚或不主要是有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62—63 页。

关非斯大林化意见不和所致。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对中国指手划脚而深深地怨恨他，因此，对于赫鲁晓夫为降低斯大林形象所作的努力，毛泽东是赞同的。他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服从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①]

1958 年 4 月他又指出:“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②]

但是，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作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加以批评，但必须承认他有正确的一面，对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③]

尽管毛泽东在这点上持保留态度，他仍然支持赫鲁晓夫，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对那些来自地方组织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说：

>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

[①] 《学习资料》1967 年版第 169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62—195 页。
[③] 《学习资料》1967 年版第 470 页。

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①]

恰当地说，我认为 1958 年中期以后，毛泽东不再用这类基本上是肯定的语气谈到赫鲁晓夫。在这两个人的关系恶化中，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是 1958 年夏季的对外政策危机。赫鲁晓夫试图不要北京参加而解决 1958 年 7 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引起困扰的一个主要根源，甚至更加重要的或许是，毛泽东确信苏联领导人试图左右中国的对外政策。

1959年7月29日，因为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的冲突白热化，毛泽东为有关国外攻击公社的三个材料，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就这个主题发表讲话的新闻报道写了按语。三天后，他把这些材料和按语的复印件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段评论说：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②]

显然，对于那种认为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相容的观点，毛泽东既感到愤慨，又表示蔑视。一般地说是加重了他对赫鲁晓夫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的怨恨。

1959 年秋季，塔斯社发表声明，这个事件引发一系列与苏联的其他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简要概述：

1959 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

[①] 《学习资料》1967 年版第 181 页。
[②] 《学习资料》1967 年版第 387 页。

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①]

“围剿”是蒋介石在三十年代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表征他发动的毁灭性的反共战役。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围剿”一词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在他往昔的同志们中觉察到某种程度的敌视。但是，他虽然以愤怒来回敬这种敌视，却依然处之泰然。毛泽东在1960年3月的讲话中说明了他自信的理由：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五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如果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②]

[①] 《学习资料》1967年版第314页。
[②] 《学习资料》1967年版第411页。

毛泽东在 1960 年曾预言的中苏关系之改善在以后的十年间并没有实现。其间，中苏关系加速演变，更趋恶化。在毛泽东作出上述讲话以后一个月，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攻势，《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一系列其他文章相继出现，它们表面上针对毛泽东所提到的作为“反华大合唱”成员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拉夫，但实际上针对苏联的“半修正主义分子”。在毛泽东的著述中，“半修正主义分子”立刻成为主要的反派角色。1962 年 1 月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当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实际上是号召人们推翻苏联的现存制度。毛泽东说：

>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①]

虽然这个讲话在发表时未曾公开，但是苏联领导人一定会立刻看出，毛泽东视他们为异端。无论如何，在 1963 年至 1964 年的公开论战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裂痕充分显现出来。既然从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中共对苏共的九评是毛泽东授意写的，在此我就不再考察九评的内容了。同这个背景相关的是，毛泽东从九月初开始亲自为系列反苏文章在思想内容和政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86 页。

策内容上把关、润色，是多么的敏捷。

1963 年 9 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9 月 27 日对新疆反对修正主义作了几点指示。第一点指示是，做好经济工作，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仅要超过国民党时期的生活水平，而且要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的生活水平。粮食要少征购。为了加强与边界地区的有利接触，棉布、茶叶、食糖等等的供应应当比其他地区更丰富些。

第二点指示是：我们必须以政治为统帅，加强思想和政治教育，必须对各民族的干部和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汉族干部应当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注意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必须教育汉族的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坚持阶级观点，贯彻阶级路线，……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让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和民兵组织参加，以保卫反修的果实。

第三点指示是，教育汉族居民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和风俗。第四点指示是，要密切注意边界的形势，加强边界上反修的斗争。第五点指示是，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军事侵犯，最后一点指示是，加强反修斗争的“一元化领导”。

毛泽东实际上确信，中国在生活水平上不仅在中亚，而且在整个国家都会迅速超过苏联。1964 年 1 月，毛泽东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赫鲁晓夫过去说我们让每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坐在一起用同一个碗唱稀菜场。实际上，那时，他自己的经济形

势就不好，而他还说苏联人民生活多么好。现在，他们的裤子愈来愈短，汤愈来愈稀。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实际上现在并不比我们的人民好多少。”[①]

不管毛泽东实际上是否真的相信，他一定听信他人说苏联试图利用自己在让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谋求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 年，毛泽东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曾指责莫斯科在经互会中推行经济专门化的政策。按照这一政策，某些国家必须为更发达的邻国，尤其为苏联提供农业原材料。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 1964 年 1 月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仍愤愤不平，他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坚持片面的经济生产，以满足苏联的需要。……当一个家长制父亲的儿子难哩。”[②]

这样，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讲话中透露出日益浓厚的民族主义味道，这不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应。与这种倾向相联系，一般地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是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强调阶级斗争。正如我在第二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左的转向是大跃进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反感也进一步激化了它。此外，鉴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开始在中国内部寻找类似现象的存在。这样，另一个因素就被注入复杂的过程之中，最终导致“文化大

[①] 斯特朗：《三次会晤》第 504 页。
[②] 斯特朗：《三次会晤》第 504 页。

革命”。

内部敌人：毛泽东日益热衷于阶级斗争

正如我在本书下篇第五章末尾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于 1957 年夏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前面对作为这种思想变化的结果而产生的经济政策也已进行了探讨，对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进行了揭示。现在，我在考察了毛泽东 1957 年后的思想趋向和中苏论战之间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思考一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激进的解释，以及由怀恋以往英雄的丰功伟绩所产生的“左”的情绪，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引导毛泽东去从事一种前所未有的实验的，是时候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姿态中的激进倾向在滋长，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他以严肃告诫和反复灌输的方式，加紧强调阶级斗争在现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事实，以及认清阶级斗争存在的重要性。因此，我将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期间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的演变情况。

毛泽东在 1957 午 10 月 9 日所作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第一次对他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见解，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放弃了一年前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当然也抛弃了我们所熟知的他在 1957 年 2 月还重申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大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矛盾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毛泽东却断言：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①]

当然，这里所引用的这一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论述，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错误的。然而，暂不管它正确与否，针对资产阶级分子和“两条道路”而强调阶级斗争，则构成了毛泽东以后生涯中的思想的重要特征。在毛泽东此后的 19 年中，伴随着这一广泛的趋向，自然也存在着重大的曲折、变化和起伏，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以他的气魄和严厉推动阶级斗争的活动方面，也表现在他对现实的阶级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方面。

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对中国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就用相当令人费解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1）“帝国主义、封建主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75 页。

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2)“民族资产阶级”，即毛泽东所指的除右派以外的所有这个阶级的人，(3)“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①]

毛泽东在 1958 年 4 月 6 日汉口会议的讲话中，则纠正了一个反常的错误，即忽视了找出农民阶级的特殊作用，然而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分子”包括在中国现存的阶级结构中。这一次，毛泽东对该问题进一步作了如下的阐述：

> 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百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造，可以摘掉帽子。[②]

至于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毛泽东把它们说成是动摇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毛泽东对其评论说“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

[①]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76 年版）第 179 页。
[②] 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4 月)，参见《学习文选》第 134 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110—111 页。

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

在“大跃进”的余波中，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待阶级问题的角度，修正了其原先把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起来看待阶级问题的方法。这种新视角便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在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个胚胎状态的阶级。这一倾向是与上文提及的这一代人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那些比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特定的生活标准，而政府必须付给他们以高薪，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可。在 1956 年至 1957 年间，中国的报刊对这一问题曾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在 1957 年 1 月，毛泽东本人还为此进行辩护，他声称“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①]

显然，这一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来他们没有喜好挥霍的癖性，二来他们被认为应当具有更高水平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指出了毛泽东于 1958 年 8 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对“供给制”进行提倡和辩护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报告，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表，然而该报告的主要的精神实质，却在 1958 年 10 月《人民日报》所转载的张春桥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传达。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最初是于 9 月在上海发表的，然而，这并不表明张春桥的观点和毛泽东的观点之间发生了纯粹偶然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7 页。

的巧合，在实际上，它只是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政治策略的结果。当时，柯庆施这一“左派”人物担任上海市的市长，他在出席北戴河会议期间，通过电话把其所作的毛泽东的讲话的记录读给张春桥听，从而为张春桥的那篇文章提供了灵感。当毛泽东读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时，便决定在北京的报刊上重新发表。因此，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这种奉承。[1]

当时，毛泽东撰写了编者按语，连同张春桥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也断定该文“有一些片面性”，“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①]然而，尽管毛泽东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对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表现得过分仓促，该文所提出的问题却还是令人困惑地遗留在了毛泽东从那时以后的演讲和著作之中了。总的说来，毛泽东把那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按劳取酬所产生的不平等的事实，看作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或资产阶级法权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基础，进一步为他的新见解进行了论证：由于党内有一大批迷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思想化了的分子的庇护所。[2]

我也已经着重指出了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和其同盟者作为钻进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

[①]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参见 1958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①]进行了批判，并且宣布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且预言，这种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 20 年。”[②]（果然，毛泽东关注这场斗争几乎是持续了 20 年。）

邓力群在讨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这一阶段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时，还指出了毛泽东日趋严重的激进主义的另一种来源。邓力群说：“实际上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就基本上没有管经济工作了。这同他对国内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是有关系的。”[③]对于这段话，不应当望文生义，认为毛泽东从此以后就不再对与经济工作相关的任何事情抱有兴趣。在事实上，毛泽东毕竟在 1960 年还组织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研究，而且现在还听说他在 1961 年 3 月还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④]由此看来，邓力群的观点实际是指，毛泽东虽然还不断谈论与经济制度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而很少有兴趣来真正关心国家现实的经济状况。在这个意义上，邓力群的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 1958 年至 1960 年以后，毛泽东通过他对苏联情况的观察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官僚主义趋向的成见。他的成见甚至达

[①] 《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147—148 页。
[②]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95 页。
[③]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载于《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45 页。
[④] 姚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 121 页。（未查到中文版本——译注。）

到这样的程度，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刘少奇等人，长期以来所谴责的官僚主义倾向，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作风”的某种缺点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队伍的阶级本质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1960 年，他在《读书笔记》中，作了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之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评注，这明显地意味着是想把这些观点应用于中国情况的。

的确，现在中国有许多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所作的分析，其主要目的是锻造一种武器，以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那些不赞同他的意见的人。这种说法也许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无庸置疑，毛泽东确实对赫鲁晓夫的俄国极为反感，在他看来，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经止步不前了。实际上，毛泽东还找出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指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未能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结果人们认为沙皇时代的那种分层模式已经出现了。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则没有机会得到晋升。[①]他还指出，苏联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也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②]然而，毛泽东最为忧虑的则是这种腐败趋势的威胁会在中国扎下根来。在 1960 年，他已经把中国人中的这种病毒的感染者归因于两大特征，即：一方面，他们迷恋基于“按劳分配”原则所

[①] 毛泽东：《1958 年 8 月 21 日的讲话》（上午），《学习文选》，第 305 页。
[②] 毛泽东：《1958 年 8 月 21 日的讲话》（下午），《学习文选》，第 311 页。

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方式又象个霸王。正如毛泽东所说：“人这个动物就是怪，他有一点优越条件，就有架子。”[①]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在他以后的岁月中，终于占居了中心地位。

1962 年 1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继续同旧的反动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他说：这些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他还明确地论述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②]到 1962 年 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会议）的讲稿中，宣布：

>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亲自主编了该书）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③]

按照这段话本身的含义来理解，所谓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就留下了一些容许争论的问题，即毛泽东是在认为旧的资产阶级是可以死灰复燃呢，还是在论述资产阶级的本质或者灵魂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状况，以新的形式投胎转世呢？也许，毛泽东谈论的是这个问题的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斯等人称谓的“新阶级”。然而，据我所知，毛泽东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一术语。至于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仅仅是指由于以权谋私而受到腐

[①]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阅读笔记》，《学习文选》，第 177 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3 页。
[③]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0—31 页。

蚀的孤立的个人呢，还是指由于享有特殊待遇和权力而易于具有这种特性的所有干部呢？看来，毛泽东似乎无法定下决心，作出明确的回答。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似乎是倾向于上述的第一种回答，因为他特别强调钱本身以及用钱买来的好处的腐蚀作用。为此，他在继续承认中国社会的目前阶段仍然需要保留物质刺激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物质刺激应该辅助于“精神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集体利益。[3]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所作的报告中，把“黑五类”与这些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①

在 1962 年 9 月至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且亲自审阅修订了概括其思想的全会公报。②如同他在五年前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三年前所进行的庐山斗争的作用一样，这次会议也标志着毛泽东进一步转向了大搞阶级斗争的政策。然而，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120 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收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略去了原文的第三、五点。施拉姆引用的这段话，出于原文。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 359 页。

就这种阶级斗争所要斗争的对象来说，它的性质和来处基本上还是模糊的。毛泽东在 1962 年 l 月的报告中，曾经提到了“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说，尽管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的“坏分子”被毛泽东说成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是出身于这些阶级。在 1962 年夏季至 1963 年春季这一期间，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中，用两段文字特别强调了党内异端倾向的阶级根源，同时也强调了通过教育而持续进行改造的重要性。8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①]

1963 年 5 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公布的前夕，毛泽东对党内阶级成分的分析完全不同了，但他对“改造”问题所作的阐述是极为相似的。毛泽东说：

>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其中

[①]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2—33 页。

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予，还有相当数量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①]

以上两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的客观的社会出身固然重要，它构成了人的阶级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通过政治教育进行思想改造也同样是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二者应该被看作是人的完整的阶级本性的两个有机联系的方面。毛泽东在 1963 年 5 月 9 日的指示中，强调了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以及把人改造成“新人”的必要性，并且设想到，如若不然，地主和富农（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对共产党进行腐蚀侵袭，将引起中国改变颜色和党成为法西斯党的危险情景。[②]

1964 年 5 月，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四位副总理谈话中指出：

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

[①]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7 年版）第 72 页。

[②] 读者如要了解这项指示易于找到的全部译文，参阅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特韦斯：《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 57——71 页。该文第一次公开发表，鉴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也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①]

毛泽东另有一个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尽管上面没有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于 1964 年底发出的。这一指示清楚地叙述了划分阶级的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划阶级有必要……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么！[②]

可以指出，在毛泽东的晚年，某些曾经一直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张力状态中共处的对立面，此刻却处于一种二者互不相干的分解状态。从几个关键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来看，先前统一体的破裂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毛泽东的思想日趋偏激，他终于把那些拥有特权的领导者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毛泽东的这种对社会矛盾

[①] 毛泽东：《四位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1964 年 5 月），《学习资料》第 103 页。

[②] 毛泽东：《关于划阶级的指示》，《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602—603 页。读者如要了解本文的日期，参阅毛泽东 1949 年后的著作的索引的第 2 卷中的讨论，概述是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 1981 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年表词汇索引》第 47 页。

洞察的必然结果，便是中国共产党被看作一种在实际上包含了那些拥有特权地位的当权人物的实体，它决不可能简单地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得到锤炼和净化，而只能被打碎，至少是在很大部分上被打碎。

撇开中国共产党或者党内的特权分子同群众的关系这一问题外，开始发生于 60 年代初的毛泽东的思想结构解体的这一极为复杂的过程，还涉及其它一些倾向。我已经相当详细地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讨论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论战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它为“一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 年 10 月 26 日，周扬向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一报告在毛泽东 70 岁的诞辰之日（1963 年 12 月 26 日）公开发表，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出现则格外醒目，它清楚地表明该报告代表了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在该报告中，周扬运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回顾了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运动到当代的发展历程。[①]

在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使用“一分为二”这一表达方式是 1957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的事情。尽管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所分析的重点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差异，而是重点分析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是“充

[①] 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1963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 1963 年 12 月 27 日《人民日报》，《红旗》1953 你拿第 24 期。

满着矛盾”的事实，以及任何人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事实。毛泽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①]

在周扬 1963 年的那个报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本人对“一分为二”这一口号的使用，首先唤起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要求。换句话说，这一口号的含义是号召开展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466—467 页所论述的那样，这一口号也是号召批判和打击杨献珍及其同伙所坚持的“合二而一”这一相反口号的呼声。）

毛泽东指出，一分为二原则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他经过推理而得出结论说，原子是可分的，而电子同原子一样，最终仍然是可分的。[②]然而，毛泽东首先要告诉人们的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种类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化。

归根到底，毛泽东同其他领导成员之间所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当然，文化领域也是一个激烈的战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觉察到了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的某种发展，不仅是种种不健康倾向的表现，而且已经成为一些人通过上层建筑的作用来攻击社会主义基础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便合乎常理地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8 页。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如《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中国季刊》，1985 年 9 月第 103 期，第 499—500 页。如要详细讨论毛泽东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整体思想，以及特别是这一问题，参见龚育之的《毛泽东与自然科学》，载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83—114 页。

这一问题的忧虑，同时特别严肃地重申了阶级斗争问题。

>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如此。[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的明显含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十三年之后的中国，“反革命的阶级”仍然在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制止他们的活动，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革命。正是在这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成为庞然显赫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已经初具胚形。鉴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并非十分清晰的情况，可以明确地判定，这一理论的发展将是进一步表明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人的主观力量问题，而这些从一开始就成为规定毛泽东的思想特征的东西。

正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大搞阶级斗争而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一样，他的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的进行，而且也驱策江青发起了京剧革命的举动。在《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 460—463 页上，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泽东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 年 12 月，毛泽东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然是“死人”统治。他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①]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 年 9 月 24 日上午于怀仁堂），《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507 页。毛泽东在其 1960 年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作用和作为关键性的政治斗争领域的上层建筑表现了同样的关切。

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对中国作家协会所作出的判断是更为尖刻的。他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群众，而且做官当老爷，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菲俱乐部。[①]这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不改弦易辙，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分子，并将作为反革命分子受到处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63年至1964年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也强烈地表现出他的日趋增长着的怀疑。当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怀有疑虑，但还不致于象“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贬斥为“臭老九”，而是主张采取一种教育政策，只是这种政策比起“大跃进”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更加偏激罢了。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②]

毛泽东对那些领衔的知识分子的抨击，所涉及的对象是很广泛的，它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这些人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毛泽东也可以提出许多例证，来表明他们是特权分子），而是因为这些人

[①] 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富有战斗性的文件中，其中的两个批示于1967年5月发表。一个是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一个为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参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②] 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24—525页。另见《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没有能够接受毛泽东的斗争理想，不去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

1964 年夏季，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整个党内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一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①]

这里所提到的对基层干部的评论表明，那时，即在刘少奇提出他的"修改后的后十条"之前不久，毛泽东不仅同意在上层领导干部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也同意直接在基层开展这项运动。然而，当时他最为担忧的还是城市中享有特权的专家名流的态度和行为。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指出：

>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②]

人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最后一次争执发生于 1964 年 2 月。当时，毛泽东认为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战略被曲解和淡化，他对此很不满意。毛泽东后来说，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十三条"指示，而刘少奇也拒绝接受。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讲话，都是关于掌握了权力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而不是关于拥有金钱的"新生资产阶级分

[①]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 年 8 月 18 日），《学习文选》第 31 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4 你拿 6 月 8 日），《学习资料》第 315 页。

子”的，这已开始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而显示出来。

也许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尽管毛泽东对于地位和工资的差别问题，是明显地极为关注的，然而在那时，他对此仍然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人帮”的那些蕴含着阴沉而狂热思想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多吃多占复杂的很啦！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都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秘书……”。[①]

就在同年即 1964 年春节，毛泽东还对宣统皇帝作了一番评论，我们在理解毛泽东上面这段话时，不能不读读这一段落。毛泽东说：“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4]这给人们产生的印象是，在毛泽东眼里，除了“工人”、“贫农”以及“革命烈士子弟”等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成分，即统治者的成分。至于那些与毛泽东的成分以及与这位先前的皇帝的成分所不同的人，毛泽东则是不允许他们追求特权的。

在 1964 年 12 月 20 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关心多给自己增加工分的干部中的“当权派”，而是同意给他们中少数“特别恶劣的”继续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同时，毛泽东也警告不要夸大他们的数量，说应该把他们叫作分子或者集团，不要把他们叫作“阶层”，很明显．更不能把他们叫作一个完全形成了的阶级。[②]一星期以后，即 1964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宣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①] 见《中央工作会议记录》（原名《两个主席的讲话记录》）（1964 年 12 月 20 日）。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82—588 页。

至少存在着“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别，一个是资本主义派别。这两个派别具体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

自然，毛泽东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所进行的理论阐述和做出的政治决策，直接引起了他本人和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人的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注　　释

[1]我和胡华于1986年4月23日的谈话，披露了关于柯庆施的作用的信息，龚育之在1986年4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加以了肯定。

[2]读者如要了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这一倾向的最近的最权威的分析，请参阅石仲泉写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毛泽东同志对它的误解》（载于《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以及《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17页所公开发表的经过修订的这篇文章。该文如同其他许多最近发表的文章那样，明确地断言：毛泽东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在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引入中国政治讨论方面起了核心作用。　“资产阶级法权”概念通常被英译为“bourgeois right”，原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观念时，使用了这一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3页。）“权利”（Recht），在德语中，在有权获得对一个人的劳动的报酬或者人权的报酬的意义上，具有权利和法律秩序两种含义。马克思在那段我们所考究的文章中，实际上涉及上述两方面的意思。因为他在说了“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之后，继续指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时，就表明了上述的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在有权获得的意义上，权利或者诸权利是被法律制度或法律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从1979年开始，通过拒绝接受毛泽东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汉译，而主张采取“资产阶级权利”汉译，进一步使上述混乱复杂化了。“资产阶级权利”毋宁是指个人的诸权利。无论如何，毛泽东所关切的主要是下述事实：他觉得“按劳分配”这项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实施，未能考虑个人的社会需求，因而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597—598页。

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情的，正如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那样无情。

[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206、210 页。现在，人们知道这些笔记并非由毛泽东本人所写，而是由胡绳和邓力群对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与其他高层领导人对那部苏联著作详细讨论时所发表的意见加以编辑的版本。参见石仲泉所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载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48—178 页。由此，尽管那些笔记包含了某些错误，包含了实际上是其他一些会议参加者所作的一些评论，但整个说来，这些笔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胡绳和龚育之在 1988 年 1 月的一些谈话中，也肯定了这一点。

[4]毛泽东：《在关于教育的春节座谈会上的谈活》。“宣统”是清如末代皇帝的年号，这位皇帝在 1912 年退位时还是一个小孩。当他从 1932—1945 年作日本傀儡国（满洲国）的皇帝时，又叫溥仪。1967 年仍生活在北京。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着手论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之前，十分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也许是有用的。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毛泽东所作出的开展这场运动的决定与上述的“大跃进”和其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么，毛泽东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由于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偏差和扭曲呢，还是象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某些现存的问题所困扰？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表明，特别是在论述他的辩证法思想和阶级斗争思想变化时已经表明，按照我的观点，这两种成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不过，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后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来源，明显地要比他的思想中的理性的来源更为重要。

专政、造反和思想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政策刷新中，动乱初期通过各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权威的彻底非难（对主席的权威当然除外），是最引人注意的。现在回顾起来，就看得更为清楚，毛泽东对来自上层领导人员的否定并不象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彻底。然而，他的言行也确实过火了。

1960 年，毛泽东在其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作的笔记中，曾经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①]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总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才能发挥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 年 10 月，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冲突已很尖锐，他便向前迈进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是“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他还说：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少数人来治。”与此同时，他再次号召：“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②]只是到了 1966 年 3 月，即“文化大革命”实际开始时，毛泽东才发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声音，表明群众可以抛弃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说：

>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③]

两个月以后，这些“孙猴子”便使用着毛泽东本人的华丽词藻，突然登台上场了。在他们所使用的华丽词藻中，“造反有理”的口号尤为响亮，这是毛泽东于 1939 年创造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们宣称：“敢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

[①]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笔记》，《学习文选》第 219 页。
[②] 毛泽东：《对背景师范学院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 年 7 月 3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543 页。
[③] 毛泽东：《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6 年 3 月 27 日），《学习文选》第 98 页。

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①]这些红卫兵们所要打碎的这个“旧世界”，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世界，他们并不打算去纠正它，而是要把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加以彻底毁灭，而代之以一种完全崭新的秩序。

毛泽东本人却从未宣布过这样一种目标。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述评：“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②]

“几个月”这一用语也许应当从字义上来加以理解，它意味着三个月或四个月，充其量也不超过六个月。就时间本身而言，它本来应该使“文化大革命”更象一次常规的整风运动。

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当“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这一方向发展肘，威胁中国共产党生存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急迫，形势迫使毛泽东在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 年 2 月，毛泽东在召见张新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上海一些人要求把所有的“长”都取消，并对此评论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其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XX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要长，要看内容”。[③]在讨论如同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在上海所做的那样，建立公社作为政府机关问题时，毛泽东对这种

[①] 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②]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8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年版）第653页。
[③] 《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做法持有异议，他责问道：“我们把党放到哪里去？……在一个公社里不能没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①]此后九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时，变得尖锐起来的另一个矛盾是，毛泽东历来强调党应当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然而，从 1960 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却日益加强。当然，这一趋向刚刚开始出现时，毛泽东是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策略手腕来加以运用的。因为他感觉到党正在脱离他的控制，需要在林彪主管下的人民解放军中建立一种权力基地。无论毛泽东最初的意图如何，他遵循这一策略，便很快地走向具有重要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 1964 年 2 月开展的全国学习解放军的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企业、学校和其他单位都以解放军为榜样，设立了政治部门。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所要设立的组织模式，而且正如毛泽东事先决定的那样，也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政治工作干部。1963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就此问题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和肖华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的部分内容是：

>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277 页。

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奋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村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几年了……[①]

这种通过人民解放军而不是通过共产党派进其它组织的举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象征着与此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另一件事情，是人民解放军在 1964 年日益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良师益友。1964 年 5 月，这支军队还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尽管人们认为毛泽东本人没有参加这项语录的摘要和汇编工作，但他作为这些语录的原著者仍然有很大的功劳，而且该语录的序言大部分是从 1960 年 10 月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中引进的，而这项次议在那时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和批准的。[1]于是，这便为 1966 年至 1972 年期间上演的混乱状态和军事控制的辩证法戏剧布置了舞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存在青年作用问题上的种种悖论，决不是很少的。一方面，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号召红卫兵要象他自己和他同代的学生们在 1919 年登上历史舞台那样，来发挥革命先锋的作用；另一方面，1966 年以及其后的许多政策又导致这批知识精英的作用急剧地下降。其部分的解释是在于，这些红卫兵的行为缺乏纪律约束而放荡不羁。1968 年夏季，毛泽东在

[①] 毛泽东：《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1963 年 12 月 16 日），这是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肖华的一封信。《资料选编》，第 287 页。

把他们派遣到农村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运动于1968年12月开始）之前，就曾严厉地批评过这些红卫兵的行为。然而，这一自相矛盾的做法，也深深地反映出：在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中，对于专业知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以及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这些专业知识的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的理解，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照理说，所有这些矛盾本来应该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纳入一个宏大的和谐的统一关系之中。然而事实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转而过分强调把政治方向作为知识和技能的替代物，而不是作为知识和技能的补充物，正如我们所知，以致于他所承诺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基础，都遭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

这些过分行为的源头乃是毛泽东于1968年7月21日所作的指示，其内容如下：

>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①]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与几个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对上述的内容，也许是对产生上述内容的谈话，进行了说明。这时，毛泽东表露出为了实用的目的，对技术知识抱有一些关心的

[①]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载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

态度，然而，对于正规教育的价值，在某些方面却抱着更大的怀疑态度。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呀，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是讲理工科，理工科啊。”然而，毛泽东当时曾接着说过，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无论如何，毛泽东不主张高中只重复初中的课程，大学则是重复高中的课程。他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像恩格斯和他本人青年时期那样，在图书馆里进行独立的研究，或者建立一种“自修大学”（就像毛泽东于 1921 年所建立的“自修大学”那样）。他作出结论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①]

在理解这些话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泽东向那些参加会谈的红卫兵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和无情的信息，即党是高于一切的，党再不容忍红卫兵在过去的两年中的被放纵的行为。在这种场合下，毛泽东对某些问题上发表了与红卫兵相一致的看法，给药丸包上糖衣，以此来缓和他所讲的那些刺耳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毛泽东继续说道，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当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所大林呢？论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②]

学生们确实被召回了学校，尽管要废除（至少在当时）学院式的考试纪律，但是，社会纪律将被强有力地加以恢复。毛泽东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93、706、695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496 页（此段引文根据本书英文原文译出——译注）。

向红卫兵领袖们解释了他必须终止这场已使数以千计人丧生的血腥的自相残杀的战斗的原因。他指出：

> 群众就是不喜欢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采取这种方法，你们能把全国联合起来吗？[①]

毛泽东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实行军管，让林彪担任指挥。当然，毛泽东后来正是那样做的。然而，不管苏联人，以及（或者）各种派别的左翼人士可能怎么想，实行军队专政并不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诉诸军事控制，是因为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外，没有任何工具能够制止这种不仅使用砖块、弹弓，而且使用了枪，甚至是炮等重型武器的派性斗争行为。一旦情况再次允许，毛泽东就重新建立党对于“枪”的领导地位。1971 年 8 月至 9 月间，毛泽东在和军队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说他采取上述措施是必要的。他同时又说，要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力，人民解放军并不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②]实际上，毛泽东讲这些话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党的统一领导地位，并且使军队服从于党的

[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 年 7 月 28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153 页。

[②]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 年 8 月至 9 月 20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556 页。

领导。他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①]

在中国境外的人们普遍认为，1969 年 4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回顾历史，尽管“九大”具有刘少奇正式受辱的象征性意义，然而，从 1966 年到 1976 年期间的事件具有如此的连贯性，以致正如中国人从 1978 年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那样，似乎可以更加准确地把这一时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然而，由“九大”开始的那个阶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确实出现了新的重要的主题和公式。

马克思和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至此，我对“文化大革命”一词，仍然是作为说明从 1966 年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一个方便的标签来加以使用的，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继续深入分析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内容之前，现在，让我们随着这场运动在 1969 年之后的继续展开，思考一下这一表达方式是否恰当的问题。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形容词“大”是起纯粹的修辞和强调作用的，可以搁置不论，那么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吗？它是“文化的”吗？它是“革命的”吗？显然，毛泽

[①]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 年 8 月至 9 月 20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556 页。《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296 页。

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三者的综合。在我看来，这场运动在实际上并不与毛泽东的看法相符合。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认为这场运动“是”的问题，对于理解他在其最后十年期间的任何思想，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在实际上，毛泽东的理由在于，他把这三种特性都看作是他于 1966 年发动的这场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而且这三种特性相互重合、密切联系，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它们要成立就都能成立，它们要被推翻就都得被推翻。换句话说，要么这场运动是同时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性质，要么这场运动的性质不能为这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术语加以完满地刻画。

如果我们依照这三个属性通常的安排顺序，一一对它们加以思考，首先，“无产阶级的”应该表示“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系”。那么，从这个意义来看，1966 年的这场动乱毫无疑问地不是无产阶级的。在它的初始和形成阶段，担任运动突击队的不是工人，而是学生。当然，工人中的那些所谓“革命造反派”，在后来的许多政治事变中也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介入几乎没有表现出马克思所曾赋予城市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遵守纪律、趋向技术现代化等品格。

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假如这场运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并且由此扩充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及为一个由无产阶级所支配的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文化革命”也许可以合理合法地称作“无产阶级的”。然而，它也肯定地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它的含义被理解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子女将要接受农村贫农的“一种深刻的阶级教育”。[①]同时，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毛泽东也表明文化革命的政策会产生经济和技术的奇迹，然而，他却从未停止号召加速发展经济，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结果的日益担忧。

在 1958 年 8 月于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号召发扬延安精神，然而，那时他强调的中心还是实现经济目标。1969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对以往在夺取政权斗争期间大量的牺牲了的同志的深切坏念，并且继续说道：

>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进城的正确性，毕竟是深信不疑的，然而，他对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态度却是模糊的。

如果文化革命既没有表现出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没有反映出城市工人阶级的思想，那么，这里便只剩下了唯一的意义，即这场运动是通过它与由毛泽东所界定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 《北京周报》（1968 年）第 52 期，第 6—7 页。
[②]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9 年 4 月 28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337 页。《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288 页。

相符合，才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和 60 年代初期，所采用的看待阶级问题的三重框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但作为看待阶级本质的主要尺度的主观因素，则被视作具有强烈而普遍的决定性价值。

对于列宁来说，他曾经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调写道：“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①]1966 年 11 月，康生却说：列宁的阶级定义是不适当的，因为阶级差别也是属于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的。到了 1970 年，康生便更加露骨地说：

>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的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②]

对于上面引文中所谓的“表现”意义上的阶级，在那时的中国于何处、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避而不谈。那么，很明显，按照思想来定义阶级，在事实上，就把毛泽东于 1966 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带进了文化领域。这也就是说，这场“革命”也只有同时是在文化的范围内，它的性质才是无产阶级的。

在那时，某些幼稚天真的评论者宣传了这样的观点，即 1966

[①]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02 年 11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33 页。

[②]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70 年 4 月 18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 第 430 页。

年的事件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它与五四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它确实是五四运动合理合法的继续，这完全是荒谬的。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年中，中国流行着的一句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真可谓“虽不中，办不远矣”。确实，正如我们所知，这场动乱是来自毛泽东对某些文化现象的反应，而见它从始到终一直是以强调心理改造为标志的，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的思想长期以来的特征。

这里只提及几个有关这一趋势的表现。一是提出了“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口号，由此开创了一个通向一种新的政治完人的主观过程。二是提出了“斗私，批修”的口号，它概括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政策，意味着对于“资产阶级”的倾向，即使不在那位主席本人的心中去寻找，也要到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心中去寻找。三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找到了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无情斗争这一途径。这一理论是最为要害的。尽管毛泽东本人（不象阐述“不断革命”理论那样）没有详尽地阐发这一术语，但他是赞同这一理论的。

无论这场运动引起了多么激烈的战斗，也无论人们释放了怎样狂热的感情，它能恰当地被称作一场革命吗？“革命”一词有两层涵义，既指不同的阶级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也指运用一旦获得的政权体系来改造社会。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从 1949 年以来，特别是从 1955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在进行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关于大跃进的构想中，“建设社会主

义”的具体经济方面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而在他最后十年期间对许多问题所作的计划中，这一方面则显得不甚重要。甚至这种态度的改变最终发生了相对有限的作用。毛泽东首要关心的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

在这样一个被“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中，只是由于把那些将要夺回他们的权力的阶级敌人，重新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这样一项事业才有可能。所以，归根到底，文化革命仅仅是借助于它的目标的思想文化定义，乃成为一场“革命”。

在这十年中，既发生了林彪的浮沉和人民解放军影响的升降，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瘫痪和恢复，以及其光辉重新出现了部分的损蚀。

林彪垮台的原因也许是他极不情愿接受重新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是不大重要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叙述，见《剑桥中国史》第 15 卷，第 4 章）。尽管这一事件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功能具有启示作用，但对于我们阐析毛泽东的思想则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批林批扎运动”则不只是一个位北京学家感到困惑的难题，它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 1973 年和 1974 年盛行的对秦始皇的名符其实的狂热崇拜。那些“上海激进分子”本来不应该宣传这种靠一个独断专横的首领实行集权统

治的理想，然而，他们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鼓噪，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矛盾现象。其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主义本来就是同一政治机构身上两种相互产生的疾病。

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早在大跃进时期，就曾经毫不踌躇地称赞过秦始皇。这并不能确定地表明，毛泽东在那时和以后，对秦大一统帝国在历史上的作用，采取的观点同 1973 年至 1975 年间的理论家们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思想资料对此问题从未公开直率地做出过结论，但它们暗含着的意思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的比拟，可以说应该翻过来看。林彪把毛泽东比作一个秦始皇式的暴君加以非难，相反，正直的人们应当把秦始皇比作一位革命领袖。

作出这样的比拟，明显地要求人们考虑到，随着这个朝代的建立，原本应有一个“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统治阶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国家组织形式的变革。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毛泽东本人早些年曾经（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版本中）把它确定为公元前第十一世纪，然而，从上面的观点来看，应当把它提前到公元前第五世纪，甚至第三世纪。可以设想，也许毛泽东从 1939 年以来就已经在思想上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尽管如此，1972 年至 1973 年间所提出的那些观点，仍然早就为中国某些历史学家所持有。退一步说，即使公元前第三世纪末期发生了统治阶级的改变，那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那种试图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当时采纳法

家思想，把它作为指导，以自觉地重新构造中国社会，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正在所做的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历史上的谬误。这里没有任何根据能够表明毛泽东曾经采纳过这种看法。

在其他任何人面前，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了表明中国具有革命的政权和革命的思想。换句话说，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提出秦始皇的比拟理论，而林彪则抱着一种极为陈腐的中国人的政治观点，把“阶级斗争”称为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在实质上，他们的理论是如比一辙。毛泽东的观点则是微妙的，尽管他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没有多少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过，正如在上面所强调的，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两种对立的见识在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中发生了分离，在这种总趋势下，毛泽东的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倾向也进一步加剧。

我已经表明，毛泽东的哲学世界现在那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认为是起因于中国文化影响在他的头脑中的复活，特别是起因于受到某种类似道家根据潮的涨落来理解对立面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以致于他不再把历史变化的方向纳入辩证过程的结构之中。然而，毛泽东对革命前途所流露出的悲观主义，则来自于他对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的担忧。毛泽东因为实行了他

本人和周恩来仅仅在一、二年前设计的那条更为温和的行动路线，他的头脑再次凭幻想制造出了“修正主义”的幽灵。正是这种幻想的“修正主义”幽灵的作用，又导致他全神贯注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于 1975 年春季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约瑟夫·伊谢里克对列宁和毛泽东之间观点上的差别作了区分，列宁“总是把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威胁看作是‘小生产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毛泽东则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内的一个新阶级和国家官僚主义的出观。[②]毛泽东的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使约瑟夫·伊谢里克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辞”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约瑟夫·伊谢里克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于 1960 手写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关于批评干部子弟缺点的引人注目的段落。毛泽东说：

>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③]

约瑟夫·伊谢里克回顾了毛泽东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同斯诺和其他人谈话中，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缺点所作的贬低性的评论，他认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干部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 147 页。

[②] 约瑟夫·W·伊谢里克：《论“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和马克思的理论》，《当代中国》（1979 年 1 月出版）第 5 卷，第 1 期，第 57—58、71—72 页。

[③]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第 3 版）笔记》，《学习文选》第 213 页。

和特权，由此形成一个“即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还通过使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世世代代永久化，最终转化为一个阶级。[①]

提出这种见解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对这种官僚主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作出任何严肃的分析，也没有为把它称作一个阶级而提供任何真正的理由。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种把焦点聚集在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上，而不是集中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把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且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由文中定义的一种“新阶级”或者“新资产阶级”统治的观点就不能形成。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从德热拉斯到巴赫罗，相当多的人都正是这样来看待问题的。况且，根据所有可以得到和利用的证据，毛泽东本人在晚年也倾向于这一方面，并不是没有表现的。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这种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不是根据人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来划分，而是表现为“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且他确确实实在实际地赞同在 1975 年和 1976 年间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是主要地或者明确地存在于党内的。不仅如此，他还从这种前提出发逻辑地得出了一种结论，即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过程，或者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运行过程，来剥削广大工农群众。[2]

然而，纵然我们断定毛泽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持有这种观点，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论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诚

[①] 约瑟夫·W·伊谢里克：《论“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和马克思的理论》，《当代中国》（1979 年 1 月出版）第 5 卷，第 1 期，第 66—68 页。

然，也许他在那时已经没有能力这样做了。据我所知，那些已经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西方学者也没有代表毛泽东提出系统的证据来加以论证。[3]

关于老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来源于毛泽东观点的名义，很详细地论述了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自利和腐败行为，把那些“极端孤立的人物”看作是“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残余、企图复辟在字面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工具。姚文元写道，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物质刺激的作用加以限制，那么：

> 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①]

姚文元所作的这一番煞费苦心的分析，所产生的效果同样是不良的，然而，更为困难的是如何使理论同客观现实相符合，而不是大谈官僚政治的精英控制生产资料的词句。我们不禁要问：

[①]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57 年 3 月），原载《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3 期。

在中国，革命胜利二十五年之后，1949 年以前的资产阶级还真的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吗？尤其是，那些在现存的制度下，因其手中的权力和额外收入而扬扬得意的党内“新阶级分子”，怎么可能愿意去参加复辟包含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在内的现实的资本主义活动呢？想必他们一定是意识到了，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总是过于缺乏同往昔“真正的”资本家竞争的力量，很快就会丧失他们的特权地位吧！

然而，关于这种“新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所引起的两种前途，是明显地建立在毛泽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著述中表现出的趋势上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首先关心的是革命胜利以后，诸如贪图金钱、享乐和特权的“资产阶级”作风在中国复活起来。按照他的观点，这种偏向是被不公正的物质奖励所怂恿起来的，因此，无论他的态度是否有所保留，他支持了 1957 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然而，归根到底，他还是更为关心改造人们的“思想”或者“灵魂”的斗争。如果说毛泽东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身上，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人享有更多的易于腐蚀他们的特权，以及享有更多的能够使他们用来腐蚀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也应着重指出，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的根源不仅仅是权力的报酬，而且还包括权力本身。毛泽东在他的有生之年所发表的一些最后的指示中，其中一条在 1976 年 5 月被有关文章所

引用。毛泽东说：将来总还是继续进行革命的，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一指示内容的可靠性，但它听起来非常象毛泽东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声音。尽管毛泽东出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强大的需要，继续担任了领导职务，他却明显地对任何一个被赋予权力的人都加以怀疑，当然除了他本人之外。

我已经反复地强调过，在毛泽东的最后几年中，他的思想和行为所表现的那种突出的和极端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关于保证彻底而系统地实现马克思的思想原则的必要措施所做出的结论为基础的，这些结论包括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创造一个更为平均主义的社会等。然而，尽管这些源于西方的思想经过他的奇特的解释，而构成了他的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在他的思想中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占据着日益增大的地盘。

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这种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强调对他的领袖地处和思想的虔诚，这可以用一个“忠”字来加以表示。不仅诸如红卫兵之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背诵“小红书”，以便在任何一种场合都能重复一条合适的语录，由此证明他们掌握了毛泽东的思想，而且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在中国开展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活动，他们把“无限忠于毛主席”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作为区分真革命和假革

[①] 见《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人民日报》1976 年 5 月 16 日，《北京周报》1976 年第 21 期，第 9 页。

命的试金石。

记载鲁成公九年事件的《左传·晋归钟仪》说；“无私，忠也。”对这句话进行不太严格的翻译，它可以用来意指：“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忠诚（于统治者）的人。”[①]90 在毛泽东最后数年的岁月中，中国人是从前后两个方向来理解这个等式的。一方面，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一个象雷锋那样作为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和忠诚的毛主席的信徒，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另一方面，一个忠诚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才成为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才具有所有其他革命者的美德。[②]在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其风烛残年，确实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头脑中日益起重大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注　释

[1] 1960 年 10 月 20 日的决议的译文，载于由 J·切斯特·郑编的《中国红军的政治》。该书第 66—94 页刊载了人民解放军活动公报的译文。该书第 70 页出现了与《毛主席语录》的序言相对应的一段话。同上书第 33 页，指出那项决议已经“由毛主席本人”所修订过。

[2]关于毛泽东晚年主张的这种说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的负责任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也与在 1982 年 4 月和 5 月同负责的理论工作者所进行的各次谈话中通常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可以参见廖盖隆的

[①] 郑天挺主编：《左传·晋归钟仪》（鲁成公九年，公元前 582 年），中华书局，1963 年 9 月版，第 136 页。
[②] 如要讨论“忠”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日子里的更加广泛的作用，参见我的论文《是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第 223—235、233——243 页。

《历史的经验》，第 135—136 页。英译文载于《问题和研究》（1981 年 11 月出版），第 84—85 页。

[3]理查德·克劳斯所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的研究，一般说来，要比埃斯克里克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更为重要。在关于依据阶级出身进行分类和“作为政治行为的阶级”相互关系问题上，克劳斯对许多方面提供了非常细致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然而，我认为他的论证如同埃斯克里克一样，犯了如下错误：认为毛泽东在其晚年主要是根据干部从他们对国家的关系中所获得的路特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来界定阶级的。

小结　寻找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的思想”的概念，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可以用来表示毛泽东本人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所实际思考的东西，对此，他的各个时期的著述已为同时期的大量资料所证明。其次，它也可以具有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毛泽东逝世（或者一直到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时期所赋予的意义，即它可以表示在任何既定时间内的正统学说，这一点已为 1951 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以及其它公开发表的讲话和作品所规定，这些讲话和作品也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最高指示”而发布的各种语录。最后，它还可以被用作正如今天的中国人所用以表明的全部毛泽东文集令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部分，这些正确的部分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的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而不包括反映了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的那些著作。

在本书的下篇中，我已经接着在上篇中所开始的工作，继续试图勾画出了第一种意义上的毛泽东的思想从1917年到1976年的发展轮廓。我也已经论及植根于毛泽东的著述中的正统思想的模式变换问题，这个问题在 1949 年以前这一时期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没有一种官方的标准，也没有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

正统解释。现在，还需要做最后一件工作，我打算概括地谈谈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实质，然而，我是在一个与目前中国所采用的颇为不同的基础上来做这项工作的。

有人经常提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待毛泽东的思想的做法，完全是专断的、操纵的、嘲讽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把将用于证明他们在极不相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那些毛泽东的思想，规定为“正确的”。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在中国，目前正在从事规定和阐释毛泽东的思想的人，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数十年的老战士，且不说他们需要接受足够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来证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者，仅他们的革命经历就决定他们必须接受来自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并使它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内在化，在思想深处建构起来。由此说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即目前对毛泽东的思想加以重新定义的尝试，体现了中国的那些领导人所赋予这项工作的目的，在既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确定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

然而，尽管情况就是这样，但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泽东的思想重新估价的目标，以及由此而来的逻辑和判断标准，与本书的目标、逻辑和判断标准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毛泽东的思想所作的评价不能完全效仿他们。在下篇之后整个全书的结论部分，我将论述毛泽东及其思想正象其今天对我们所显示出来的那

样持久的意义。这里，我所关心的毋宁是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期间，构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实质。

在过去，我曾经把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贡献的实质，称作“毛泽东主义的主流”，并且提出，这个主流可以在 1955 年至 1965 年间，更确切地说，可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找到。[①]这也就是说，我曾经把“毛泽东主义的主流”规定为由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核心，而略去了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做法。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我发现这一用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正如我在上述中所讲到的，从 1958 年到 1966 年间的历史进程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种激进实验过程中冲击一切的“左”的潮流，比起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期所采取的和在 70 年代初期再次采取相对谨慎和现实的立场来，应当说它是毛泽东最后 25 年（即使不是他的整个一生）更具有特征的东西。

毛泽东在 1964 年 3 月说过，“凡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②]这也许是一个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所以需要对它作出结论性的说明。一方面，毛泽东从始到终的整个思想，特别是他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思想，是一种由相互各异的观念和指示构成的不稳定的组合。另一方面，毛泽东所曾设法把这些不同成分加以锻造而形成的那种暂时的和不稳固的综合

[①] 着重参见施拉姆的《毛泽东：初步再评》，第 71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477 页；《杂集》第 343 页。（此引语系对毛泽东的谈话所做的简要评论。）

性理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就崩析了。

按照我的观点，如果我们考察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所系统阐述的经济思想，我们一定会清楚地认识到，它们远不及近几年来人们通常依照基于“文化大革命”虚构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所理解的那样具有片面性和简单化。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红和专，以及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各自的两个方面，都是同等重视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的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这是一个通过“两条腿”尽可能快地走路，而不是单靠小型土法这样的一条腿独脚跳的方针。

然而，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看法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即使他从 1958 年夏季狂热的幻想状态退出来以后，仍然反映出他对待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意义，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其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曾给予极大关注的，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政治程序观念，以及领导和群众相互关系的观念。

1960 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宪法时指出，这个宪法说什么劳动者有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等等，但就是不给人民以“治理”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而这种权力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根本的权利。[①]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的相同段落中，毛泽东则用“管理”一词代替了“治理”一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第 2 页。查阅若干份原文，毛泽东的原话和廖盖隆的引语都是“管理”一词，未见“治理”一词。——译注

词。[①]尽管这两个词的使用，存在着某种重要的细微差别，但二者都是比较含糊的，它再次反映了我们已经指出的存在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管理”一词，是在红卫兵翻印过的毛泽东本人的那些话中出现的，它可能意味着“处理”、“经营”、“支配”或者“监督”(“manage”、“run”、“administer”或者“supervise”)。“治理”一词，是表示“整顿”、“清理”或者“安排”(“put in order”、“straighten out”或者“arrange”)。前一词的含义显然更加具体一些，它揭示了一种组织化的程序，而不是指一种简单的程序。对于这两个词的含义来说，至于毛泽东在实质上是欲使工人或者劳动者关心国家大事，确保政治权力的行施符合他们的意愿，还是毛泽东的本意是指工人或者劳动者应该亲自实际地管理他们的事情，它们的表达同样都是含糊的。

有一种关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的英译本，把“管理”译成“run”和“manage”，另一种英译本的译法却是“administer”和“take charge”。而我一直倾向于把它译成“supervise”，因为它并不意指所有的工人聚合起来实际地在同一程度上进行管理，这种译法比较符合我现在所理解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毛泽东的思想。虽然，我承认：这种选择是武断的，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比其他翻译家的武断性更严重。实际上，这种理解的歧义姓，是存在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之中的。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上面引述过的毛泽东在 1965 年讲过的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342—343 页。

一段话，他断言民主就是“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①]这里使用的“由”字，既可以理解为“依靠”（by）群众，它的意思是指群众是实际发生作用的力量，它也可以意指“通过”（through）群众，也就是说，遇到问题时向群众请教。我已经把“由”字译为“通过”（through），因为在毛泽东的 1965 年 12 月的同一篇文章中，关于“上面要靠党的领导”的明确说法，已进一步证明，在那时，毛泽东仍将是坚持这一观点的，而且他还反复指出，集中制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然而，到 1965 年，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大跃进”前后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集中制的强调，是采取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形式来实现的。正如在本书下篇第五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恢复了在延安时期就如此强调的党的一元化或者一体化领导的观念。

一般说来，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党的一体化或者一元化领导，不仅在全国的级别上必须加以贯彻，而且在各个地方的级别上也必须加以贯彻。此外，即使 1953 年那一韵律诗中提到的“小权”没有导致混乱，也不能把它们分散。当然，这种一体化的实际发生作用者，只能是各级党委。毛泽东在 1958 年还清楚地表明，关于党的领导，无论是中央级别的，还是各个地方级别的，都包含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检查它们的执行情况。

[①] 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报告的批示》，《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630 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临近，由于毛泽东对应当发挥“一体化”功能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正当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然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一整套理论原则便解体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逐步的，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见于注明日期为 1964 年 7 月 14 日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的一个著名的段落，其中写道：如果我们的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所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尽管毛泽东在 1967 年 2 月同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再次肯定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领导核心，而且尽管他也继续努力以某种方式，把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同反对精英主义和鼓励来自基层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其中来自基层的积极性甚至构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当理由（即使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然而，由于群众对党的领导集团和国家官员进行“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一个行使个人权威的大人物所保证的，而这种权威后来逐渐被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威加以比拟，所以，整个事业也就被这种事实所扭曲和损害了。

由此看来，人们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王洪文在中国共

[①] 毛泽东：1963 年 5 月 9 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红旗》1961 年第 13 期，第 31—32 页。

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①]和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②]，所发出的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加强党对其他一切事情的一元化领导的号召。因为到这时，无论是张春桥，还是毛泽东本人，都确实不象关心那种庄严的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那样，来关心各种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威都不再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属于毛主席这位被历史赋予教育中国人民和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使命的领导者。

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看作政治程序的两个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不可能丢开其中一方，使另一方孤立地得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与此完全不同的概念。“造反”取代了民主，“忠”即个人忠于伟大领袖和舵手取代了集中制。无疑毛泽东也把这些倾向看作是以一种辨证统一的形式密切关联着的，如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联系那样，然而，他在原则上并没有对此加以否定。不过，毛泽东也允许这样一种形势发展，他本人也承认允许这种形势发展的必要性，即所有社会和经济界的各级“头头”们，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没有权利做出决定，所以在事实上不能作为“头头”发挥作用。领导者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合，在国家层次上采取了一种非结构化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可悲地使人联想起更早时期的那些民主

[①]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9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8月28日通过），原载1973年9月2日《人民日报》。

[②] 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5年1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1月17日通过），新华社1975年1月19日讯，在1月29日《人民日报》。

样式。在国家以下的各个较低的层次上，领导和群众的联合，则由特定的委员会、军事管制机构伴随着冷漠和混乱形成了一种具有专断性质的混合体。

对于这些思想极端发展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特别是从 1963 年开始，毛泽东对他声称的“一分为二”名言，作了多次的说明。仅仅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是由一个人来作为其象征的，是由一个人来作为其化身的，那么，“一元化”或“使之一体化”的原理和“一分为二”或所有事物都具有可分性（以及它们所有的成分相互斗争的倾向）的原理，才是能够共存的。换句话说，共产党是可分的，然而它却保持了统一，而且能够一致地执行它的共同任务，这仅仅是由于这种一致和完整是毛主席光辉照耀的产物；而毛主席本人（不管以前引证他自己的评论如何）是不可分的，而且保持了永久的领导地位，即使他的思想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要阐明毛泽东的思想，还涉及它的另一个二重性的中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对此，我已经在贯穿全书的整个论述中间作了强调。在毛泽东的晚年，这位领袖终于变成了人们效忠的焦点，变成了真理的源泉，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相符合，而且与他本人在 1971 年提醒人们时讲的《国际歌》中不承认“救世主”存在的话不相符合。[①]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使他的统治成为一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甚至也并不表

[①] 《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297 页。

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就对领袖人物的崇拜现象而言，其中毕竟存在着相当多西方的或者西方化的思想来源。它既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更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原初的法西斯主义。况且，在这种复杂的思想文化积淀的过程中，如果新的西方思想能被用于为陈旧的中国目标体系和价值观念服务，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可以被引向由西方学说所规定的目标。[①]因此，这两种思想来源的最终平衡很不容易拟定，但是，这一问题是值得作最终的反思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其态度由拒绝转向了接受。毛泽东在其 1956 年 8 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采用了他从 1938 年以来曾经阐述过的那种相对平衡的观点，既中国在保持自身的优长的同时，也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基本理论就是在西方产生的”，它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说是“体”。[②]另一方面，毛泽东于 1965 年 12 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也指出：张之洞的观点在实际上是正确的。“西学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③]

即使毛泽东在上面所指出的同一次谈话中，曾经说过他本人

[①] 关于这一主题，见《是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②]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318—319 页。《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85—86 页。
[③] 毛泽东：《在杭州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588 页。《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234—235 页。

是一位“土哲学家”，我们也不应该把他的这番评论理解为，他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者从西方那里吸取任何东西。他的这种说法毋宁是一种强调方式，表明如果要想把从西方借鉴的东西加以充分利用的话，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必须扎根于中国的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然而，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按照纯粹的理智的方式，通过对毛泽东的理论叙述加以分析，就能有效地得到解决的问题，其中也倾注着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甚至他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陈述也都具有这种感情色彩。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①]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又作了如下阐述：

>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②]

毛泽东在 1970 年所作的这一番评论，再次阐明了他在其晚年所抱有的思想倾向，他把阶级斗争看作一小撮“大人物”同整个人民之间的斗争。而且，人们也强调，正如他在 1958 年所作的评论那样，他把民族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主要形式，放到根本性的重要地位。

[①] 《毛主席论国内民族问题》，第 8 页。

[②]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 12 月 28 日）（已经主席审阅）。同上书，第 6—7 页。（这段引文来自中国官方的谈话记录，据我所知，斯诺在其著作中从未使用过这一段话。）

尽管毛泽东总是理所当然地把中国看作“中心”（central place），把中国文化看作“中华”（central flower）；但我绝无此意，认为应当从毛泽东的这一特性推出一种结论，与苏联人和其附和者，以及托洛斯基分子和其他各种左翼派别所提出的观点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毕竟只是一个几乎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老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数十年来集中全力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如此。在 1976 年，他的思想中从《左传》和其他类似典籍中所博得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尺度，显得格外突出，当时，应了他对埃德加·斯诺所说的话，去“见上帝”，或者“见马克思”（也许见他们二者），在他的继承者们的领导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视线不是停留在那些最为可悲的处于低谷的岁月，而是投向毛泽东的思想中由毛泽东从 1935 年到 1965 年所发展了的那些正确和理智的成分，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其思想还是构成了一种源于西方的颇为革命的思想体系，也构成了一种西方化的传播思想感情的媒介。

这种西方思想的冲击、渗透与毛泽东的无可非议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模糊联系，在他的被称作“落后辩证法”的观点中可以得到反映。在作为“毛泽东主义”的典型文献之一的 1960 年的《读书笔记》中，专门阐述该问题的一节的题目就是“落后国

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显然，毛泽东不会对此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毛泽东说，在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毒害是很厉害的，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在内。所以，列宁说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的名言，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

> 其实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趋穷，才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了英国。[①]

另一方面，这段话也清楚反映出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政治生活中人的方面和道德的方面，我在该书中已经反复说过，这两个方面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确实，毛泽东在上面所引述的那段文章中，也断言在这些先进的和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中，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最大的困难将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话也雄辩地表达了他的意义深远的信念，即一种贫穷落后和处于劣势的局面再不会延续下去，也无需再延续下去。这一信念在中华民族于一个世纪中所蒙受耻辱的刺

[①]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笔记》，《学习文选》第 196—197 页。

激下，在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下，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坚定。

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中，当国家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并且能够适应需要来现实主义地处理所面临的国家经济问题。特别是在“大跃进”的后果面前，他表现的更是如此。然而，一旦形势似乎稍有好转，如象 1962 年秋，他就又执著于他制定的那些企图把幻想变为现实的激进政策。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的这种矛盾和多变的特点而不是简单地由于中国目前的领导层中在应该走哪条道路问题上所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分歧，而使得他的继承者们要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一种详尽的、精确的和恰当的评价，变得如此困难。与此相同的另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任何要对毛泽东的全部思想进行概括的尝试，都只能是暂时性的和受条件限制的。然而，尽管完成这项任务看来还不可能，我们又必须通过各种方法努力为之。

结　　论

在导论中，我曾经指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和最深远的贡献就是他本人的思想。反过来，这他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能概括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就不能概括毛泽东的思想。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毛泽东的主要功绩是设计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从而推翻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模式。联系到中国社会革命前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和因外国列强的瓜分而使中国人民蒙受的屈辱，这些成就是决不可以被低估的。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声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将会永世铭记。

1949 年以后毛泽东的经历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官方认为，直到 1957 年夏季，毛泽东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那时以后他屡犯错误，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他也是含糊不清的。无可争辩，毛泽东后期的两个主要改革政策，也是他的两个主要改革思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不合时宜的构想，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反对官僚主义、鼓励民众参与和强调中国自力更生的目标总体上看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毛泽东实施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尽管具有探索性和想象力，其结果却是完全事与愿违的。

人们也许会说，毛泽东善于夺取政权，而不善于治理国家和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也许不无道理，但作为一种判断，则是不公允的或不恰当的。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后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是改造中国文化和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这些问题较之他前期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和更加复杂。在井冈山或延安，面临的问题是生或死、胜或败的抉择，而 1949 年以后需要作出的各种抉择，却没有明显的捷径，仅靠斗争是不可能在一天甚或十年之内最终解决问题的。

同时必须承认，毛泽东在夺取政权时期所具有的成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也包含着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所固有的种种局限。早在 1949 年前，毛泽东作为领导者，他的自我形象已经溶合了列宁主义者和中国百姓的双重特色，既“伟大”又“平凡”。这样的人物，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是一种很有号召力的象征。但是，它对于推进 1949 年以后中国面临的经济、文化和技术革命却不那么适宜了。

同样，毛泽东与农民的血肉联系使他易于体察民情，但这也使他难以摆脱农民的观念和价值。无论如何，毛泽东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透彻地了解，这为他解决以后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指导。此外，在别的一些基本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也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亦如此。他矢志不移地谋求中国的繁荣，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无疑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革命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最后举动就是同美国总统在紫禁城的会晤。要实现同其他国家在地位上的真正平等，还要经历

漫长的道路。然而，中国应当谋求平等，并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谋求平等，毛泽东的这种决心依然是值得称道的。今天革命仍然被看作是一个不断继续的过程，关键在于政策。

尽管本书叙述了毛泽东一生中的所思所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问题今天仍可以从一种新的视野加以理解。一方面。他的思想和策略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更加明显，另一方面，60 年代和 80 年代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运用的种种可能范围，从而有助于我们弄清在毛泽东指导下所进行的各种试验，哪些是有特殊意义的，哪些是有长远意义的。

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 20 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毛泽东谈到过制定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而邓小平则宁愿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项事业的思路在某些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涉及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要适应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

粗略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被运用的方式，与毛泽东在过去运用的方式已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毛泽东是首先考虑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辩证法，而现在，邓小平则是把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其政策的核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开展持续不断的斗争才能确保人们沿着正确

的轨道进入一个大公无私的新社会。他还相信，在这一目标未达到之前，如果放松了警惕，经过艰苦的农村游击战所获得的革命果实就会被断送。相反，邓小平则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他多次指出，这种必要的经济基础至到下世纪中叶才能建立起来。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是，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天堂，财富就会接踵而至，而邓小平的思想则是，仅仅立足于观念之上的人面对的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上述两方面中无论哪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深深植根于欧洲。在马克思看来，欧洲是发达世界，站在人类进步的最前列。19 世纪，当马克思首先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表示欢呼时，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亚洲的看法就很不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亚洲需要欧洲的监护。如果说亚洲过去曾沉睡不醒，那么她现在已积极地参与到世界历史中来。欧洲的舵手作用可以通过殖民征服来实现，社会主义一旦在欧洲取得胜利，它也可以通过欧洲革命者对他们的亚洲兄弟的同志式劝导来实现。然而，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赫鲁晓夫，他们的这种劝导往往是采用长辈的口吻，从上面发号施令，而不是双方平等的忠告。

尽管中国人只是在 50 年代后期才明显地拒绝欧洲人或苏联人的监护，但在实际上，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要确保中国革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毛泽东丝毫也没有需要外国监护的意向，但是，他决不否认欧洲人在发动中国人也渴望参与的两次大革命——

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是居于前列的。毛泽东的思想勿宁是，当整个欧洲首先实现工业化，科学社会主义由马克思创立并首次由列宁和斯大林实施的时候，中国人能够在这两个领域超越他们的先生，无需欧洲人所花费的三个世纪，在五十年到一百年之内就能够实现工业化，同时能够比苏联更迅速、更彻底地完成社会革命。

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与中国文化全然不同的背景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进行革命同时又要保持民族尊严，就必须对过去的遗产作一番改造。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这一课题。他在 1938 年 10 月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的号召，至今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在本书的《第一篇》中，我详尽地分析了毛泽东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之而来的发展具体地揭示了毛泽东最初表述的含义，这点在本书《第二篇》作了回顾。

实质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涉及三个范围或方面：传播、环境和文化。在这三者中，传播是最为清楚的，因而极少引起争论。毛泽东在提倡“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②]提出了一个以前曾被忽视的有效论点，即要使马克思主义为欧洲以外的人民所理解、接受，就必须用易于他们理解的语言和与他们自己的问题相关的术语来表达。然而，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会受到怎样的精

[①] 《毛泽东选集》1948 年晋冀鲁豫版本第 5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00 页。

神（或文化）和经验（或具体环境）两方面的制约？最重要的是，1949 年建立的新政权将会以何种方式改变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正如我们在下篇中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新环境中，感到有必要借鉴苏联人的许多经验，当然，即使在 50 年代初期，他们对苏联人的东西也没有盲目地模仿。不过，苏联人的思想和方法却对他们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中国在 50 年代出版的教材和理论著作中，有相当一部译自于俄文本。

毛泽东从 1955 年发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到 1976 年他与世长辞，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探索。他在追求这个目标时，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尽管有时他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种发挥，就像他在 1938 年所提倡的那样，从中国历史的典籍和价值中吸取灵感。长期以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主要贡献，通常被认为是 1955 年开始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由于 1958 年的大跃进而确立起来，并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而延续到 1978 年。

当我说大跃进的经验一定与以前的时期有联系时，这并不意味它们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我在第一篇中曾经指出，我的观点与那些主张“毛式经济”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人是很不一致的。我特别指出，在延安时期根本不存在所谓“两条腿走路”，大小结合，土洋结合，而这些思想正是大跃进策略的核心。

另一方面，延安的思想遗产在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中又表现得非常鲜明。“群众路线”，由于它强调倾听基层群众的呼声，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尽管不一定凡事都按群众的意见去做。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强调奋斗、牺牲和朴实为最高的道德价值。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在 50 年代重返故里，并在 1955 年 12 月声称：“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①]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思想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存在着连续性，这一点，在毛泽东于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毛泽东再三要求废除工资制，恢复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断言，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②]毛泽东在道德价值上的这种偏好，显然与过去的武装斗争有联系。他宣称：“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③]毛泽东把公社与城市加以对比，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而“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④]

然而，我们也看到，事隔半年，毛泽东在 1958 年 11 月的郑州会议上，承认农民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他说：“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还是农民”。[⑤]在现阶段上，在工农关系中仍起着“老大哥”的作用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或许，就

[①]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96 页。
[②]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06 页。
[③]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318 页。
[④] 《学习文选》1967 年版第 1306 页。
[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44 页。

象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农民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兄弟”这一二难问题，并使之统一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中。

我曾说过，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渊源于延安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两次根本性的大变动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差别，其最重要的差别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58 年党处于领导地位，而 1966 年党陷入了瘫痪。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58 年至 1959 年间出现的两种倾向：即对毛泽东本人崇拜的新高潮以及首先表现为空前尖锐地强调阶级斗争的极左的政治和思想气候。

如果对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不加区别地看待，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似乎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任何时候，都把马克思主义整个地理解为使经济基础的作用服从于上层建筑。的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曾经两次把 19 世纪末张之洞制定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方案视为中国现代化和变革的开端。然而，甚至在斯大林表述类似思想之前，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就提出了政治和文化优先于经济基础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晚年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仅认为动员全国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是非常迫切的，而且认为革命人民具有改造自身及其环境的无限能力。

从 1966 年以来，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这一奇特现象是不是毛泽东以往思想和行动的必然归宿。一些人尤其在开始时，倾向于把“文化大革命”仅当作一种由于年老昏聩引起的错乱，而避而不谈。另一些人，自然包括那些想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中寻求鼓舞的西方人，把“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不仅视为毛泽东一生经历中的最高成就，而且视为他所有前期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看来，上述这两种判断都是错误的。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中不可避免的必然归宿，也不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能的逻辑结果。毛泽东的那种容易激动、不易抑制的性情，以及他的思想好走极端的倾向，都推动他朝向这一方向。毛泽东意识到自己不免一死，决心在有生之年给中国带来决定性的变化，这种心境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种种因素。毛泽东也曾受到限制——或本该受到限制——他长期以来要求人们注重客观现实，这种承诺限制了他。他作为一位领导者，就象附件从属于机器一样也受到党的集体的制约，尽管他不会因此而象刘少奇这样更正统的列宁主义者对党的作用十分尊重。换言之，毛泽东并非注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既然他已经这样做了，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全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许多方面明显地不同于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十年或二十年前，人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今天，毛泽东的继承者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承认

他在贡献上的历史局限性。

自然，国外的许多人认为，对毛泽东过去十年的经历和思想重新作出考察和评价，实际上是“非毛化”，或者认为至少是在表面上尊重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思想，实则抽去它们的实质内容，使之成为空洞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不是否定毛泽东本人，而是否定对他的偶像化”。[①]我认为，这个估价是公允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试图阐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积极因素是什么，消极因素又是什么。1981年6月27日的决议及前后发表的许多文章、评论，都已经指出了毛泽东的功绩有三个主要方面，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表明了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作用持肯定态度。当然，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实事求是”命题（他依据了中国的古典文献——班固所著《汉书》）。这个命题今天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新的阐释，如写出了《实践论》。邓小平从1978年以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今天，中国人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不再是通过闭关自守，而是通过对外开放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尽管这样，“自力更生”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群众路线”仍然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传统的象征，但是，

[①] 见董太：《对待‘外论’的经验教训》一文，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9日版。

与毛泽东的时代不同，民主今天很少被视为一种“工作作风”，被更多地理解为有关制度化的东西。

至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消极因素，人们已经清醒地看到，其最主要的是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①]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被归结为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助长个人崇拜，然而，唯意志论问题被认为是最根本的错误。按照事物的逻辑和邓小平的看法，以上四点错误是密切地联系着的。也许，最突出的是“实事求是”与夸大人靠意志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两者正好是相反的。

毛泽东所以能够取得 1949 年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早就认识到，根据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各种真实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只能是一种持久的革命，企图通过城市无产阶级暴动而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令人费解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曾经以其极大的耐心和现实主义反对了党内“正统派”的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幻想，现在，正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等待生产力的发展，试图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想迅速跨进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在“大跃进”期间和其后都发展得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今天在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对自己主张的从实践中学习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的背离。同样，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标志的“群众路线”，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民主传统的精华，视为毛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754 页。

泽东的独创性的伟大贡献之一。然而，就是在“大跃进”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期间当毛泽东的大批崇拜者卷入群众性的无休止的和人为制造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的时候，那种对民主的欲求在今天看来就是被滥用了。

肯定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的伟大贡献，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及其思想的解释者，认为毛泽东在各个方面都差不多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我曾在下篇中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其晚年很少顾及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邓小平从1978年以来曾经发表过多次重要的讲话，他在1980年8月（也许是他1978年以来最著名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许多领导者个人，特别是在毛泽东身上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事务过重诸如此类的消极现象，这既同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邓小平认为，这些消极的影响造成了制度的弊端，而当制度不好时，即使是伟人也难免受人怂恿而做蠢事，而不是相反：

>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①]

邓小平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即“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6—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①]这清楚地表明，尽管毛泽东在 60 年代就多次谈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问题，但其政治领导方式最终仍保留了列宁主义者的集权主义印记。

至于中国完成其革命的速度问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毛泽东是否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但他肯定地认为，中国在 1949 年以后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已经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另一方面，从 1978 年以来，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更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了。1979 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一词被引进用以规定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概念曾被广泛地使用了一二年，其后被领导者放弃了，因为它有引起人们怀疑社会主义是否已在中国扎根之嫌。自从 1981 年 6 月以来，人们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在 1987 年 10 月至 11 月之交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这一理论就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②]

这一论断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意义。它认为社会主义在适当的时候不仅将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水平的民主类型。但是，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尚未达到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在许多方面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6—1982 年），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3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84 页。参见施拉姆所著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第 12—13、35 页。

显得优越，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将是一种威胁。邓小平在 1987 年 4 月的一次讲话中，揭示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了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而且重申要到下世纪中叶才能取得这一成就。[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现行路线的参照系规定如下：

> 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公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②]

这个报告指出，要创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以取代那种“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和“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行政治体制。换言之，这个报告希望所建立的政治体制要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时代的需要。与此同时，这个报告也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这样，就颠倒了列宁的一个著名公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种颠倒在实际上是毛泽东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然而，如果理论确实是依据实践形成的，用它来制定目标和形成价值观念，这种目标和价值观念在事实上就不是纯粹先验的东西。

[①]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这是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什特劳加尔时谈话的一部分。）在邓小平最近的一些讲话中，关于这一思想路线更详细的讨论，见我的《十三大之后的中国》，《中国季刊》（114）1988 年 6 月，第 177—179 页。

[②]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7 页。

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二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了改革、开放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①]这清楚地表明，当代的领导者正在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949年最初取得成功之后没能再进行下去的“中国化”运动。该报告把这种通常讲的原由表述如下：

>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②]

该报告的整个理论体系，设想要构造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既能形成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同时又能以某种方式在本质上保持社会主义，这可能被看作退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又在1953年放弃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思想。与此同时，该报告中所阐述的理论和政策显然仍是直接指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

一位作者最近断言，如今，中国革命不再象毛泽东主义时代那样是“继续”的了。[③]事实上，虽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58页。

[②]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页。

[③] 见洛厄尔·迪特默：《中国的继续革命》第257—269页。

及其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实行彻底变革的这种持续的过程仍然是可以设想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样把政治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但是，他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指导和形成经济基础，而不是高于一切并取消经济规律。中国今天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目标总是一样的，就是使中国富强，建设一个既是社会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

我曾在上篇中谈到过毛泽东所已经发明的“主要矛盾”的概念，因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从来不怀疑他当时所在的西方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毛泽东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则是以在急速变化的一百年间一层一层积淀下来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阶层为特征的。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不可能变得比原来更加单纯，各国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变得比原来更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对于描绘改变现实的蓝图，提供的如果不是一幅地图的话，也是一个指南针。

与此同时，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那样，也正如毛泽东自己多次谈及的那样，他本人就是一位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为了对所有这些加以概括，让我用看来更象一些民间传说的东西作为我的结束语，它们也许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我在前面曾援引了毛泽东和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于他们尊崇猴王孙悟空的声明。毛泽东在其早年，曾经多次把孙悟空的形象作为

一种政治象征，在“大跃进”以前，所有提到的这种比喻实际上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的确，毛泽东在 1938 年 5 月，甚至把孙悟空与“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联系起来，说这些“法西斯侵略主义者”将永世被和平统一战线埋葬在“五行山”下。[①]然而到 1958 年，他的调子突然改变了，说：

>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②]

也许，这比任何其它一个形象都更巧妙地概括了毛泽东的政治作用的本质及其深刻的二重性。他是一位不朽的造反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他 30 年来领导他的人民追求一种最初是崇高的理想，但这种理想逐步变成一种幻想，而最后变成一场恶梦。迄今为止，对毛泽东的人格和其思想的最后判定，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41 页。
[②]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传达》（1958 年 4 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29 页。

后　记

本书是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首次出版的英文原著翻译的。1990 年 9 月，当本书的英文原本刚在北京图书馆上架时，我们便立即着手对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我们在完成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有关课程的同时，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译出了初稿。之后又几经审阅和修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及其他论著，以及国内外评介施拉姆著述的文章。我们根据最新公开出版的中文原件对该书全部引文进行了核对，还对原著中的错漏和不清楚之处作了一些注释。我们的编译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我们的导师崔自锋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得益于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提供的藏书和哲学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几位教授提供的私人多年珍藏的资料，得益于丘成教授和赵伯英先生对我们翻译中某些问题的热情帮助。在此，特向他们一并致谢！

本书“导论”、“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党、军队和民众”、“中苏分裂的原因和后果”中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日益热衷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寻找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结论”的后半部分由刘李胜译；“绪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能吗？”、“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苏分裂的原因及结果”中的“非斯大林化和修

正主义”及“结论”的前半部分由陈建涛译。尽管我们对本书的译文作了很多努力，然而难免有疏漏和错误存在，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对本书译文进一步修正。

刘李胜　陈建涛

1990 年 12 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后记二

本书系根据刘李胜、陈建涛 1990 年所译施拉姆原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 年）整理。

出于尊重原译者及本人能力所限，对原文几乎无修改处，凡所修改，均属用词习惯变化而作，仅三两处，故未标明。且限于时间、精力等因素，对本书的审阅工作并非十分全面，错漏处还望读者不吝指出。此外，因本书出版年份较早，以及不同译者翻译风格水平不同，相对其他译本难免存有差异，读者明鉴。

本书限四川大学哲学系内部交流学习之用。

2015 年 4 月

于四川大学